

人流重现香港
万亿个贷不良处置蓝海

16
28

财务再保险需求增长背后
卡位智能驾驶供应链

34
52

高通竞逐未来市场
以病毒攻癌症

60
66

财新周刊

Caixin Weekly

蓝天保卫战之后

疫情之后抓经济，空气质量如何得到保障？
如何释放更明确的信号？

P.42



2023年 第17期 5月1日出版
总第1053期
邮发代号：32-235

ISSN 2096-1251



9 772096 125233

17

最新封面报道 | 蓝天保卫战之后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第17期 出版日期 2023年05月01日

疫情之后抓经济，空气质量如何得到保障？如何释放更明确的信号？

文 财新周刊 杨玉琪

2023年春天，人们再次感受到蓝天可贵。近年来空气质量显著改善的北京，今年3月份出现14天污染天气，PM2.5（细颗粒物）浓度同比上升超过40%，AQI（空气质量指数）优良天数减少约四分之一。整个京津冀及周边地区，PM2.5浓度同比上升约4%，AQI优良天数下降8%左右。而这两项指标在2月份已分别同比增加了约48%和下降了28%。进入4月，受今年第8次大范围沙尘天气过程影响，华北等地在4月9日-14日再次遭遇重污染天气的来回侵袭，PM10（可吸入颗粒物）浓度持续多日破千“爆表”的同时，PM2.5指数也水涨船高。

一个疑问交织着担忧在社交媒体上被提出：我们的空气质量会回到糟糕的过去吗？尽管目前沙尘暴源头主要在境外，但除了沙尘暴，各地重新力拼经济的情境下，污染排放会不会卷土重来，事关每个人基本福祉的公共物品空气质量如何得到保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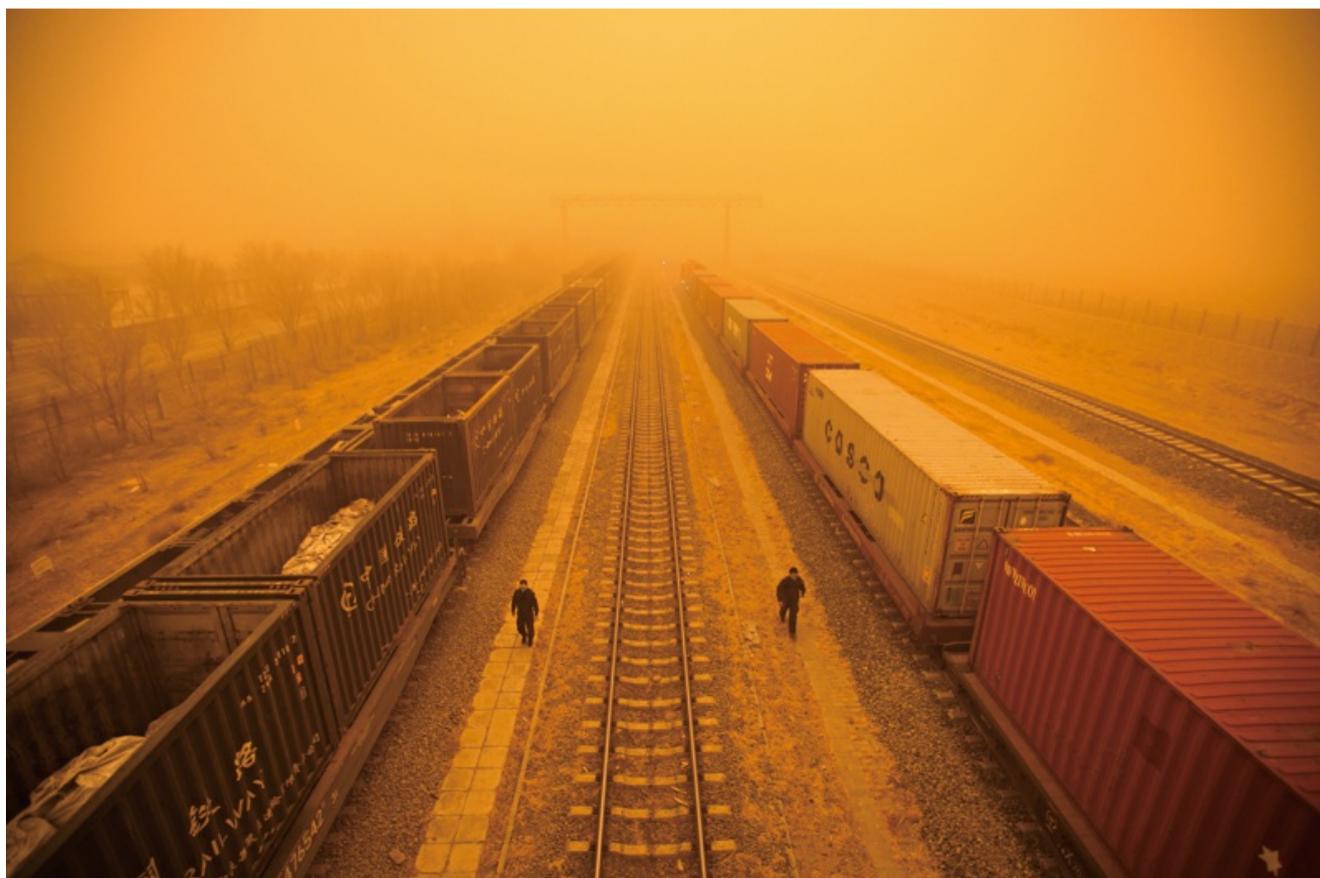
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全面成功治理PM2.5污染的发展中国家，也是空气质量改善最快的国家。从2013年到2022年，全国PM2.5浓度下降了57%，重污染天数减少了92%。北京的PM2.5浓度也从89.5（微克/立方米，下同）降至30。

“取得这些成绩的关键是卓有成效的顶层设计。”生态环境部大气环境司司长刘炳江3月28日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总结道。2013年和2018年，国务院相继发布《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下称“大气十条”）和《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下称“蓝天保卫战”），提出到2017年，全国PM10浓度比2012年下降10%以上，京津冀等区域PM2.5浓度下降25%左右；到2020年，二氧化硫（SO₂）、氮氧化物（NO_x）排放总量分别比2015年下降15%以上，PM2.5未达标城市浓度比2015年下降18%以上等目标。同时，2015年起实行的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制度，先后问责32名地市政府主要负责人；2017年起，国务院多部委每年都印发“重点区域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方案”。

一套行之有效的大气污染治理“组合拳”得以形成。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局长陈添2019年总结大气治理“北京经验”时称：“实现地方环境质量改善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政府坚定的决心，清晰的目标，制定有力的法规、计划和政策，有效的落实，以及执法监察。”联合国也评价北京空气质量改善，“并非偶然发生，这是投入了大量的时间、资源和政治意愿的结果”。

2021年2月，刘炳江表示，已全面完成各项治理任务，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圆满收官。当年11月，国务院又提出到2025年的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多项目标，其中要求地级及以上城市PM2.5浓度比2020年再下降10%，优良天数比达87.5%。

进入到“后蓝天保卫战”的“十四五”时期，臭氧污染逐渐凸显、减排空间日益缩减。业内普遍认为，大气治理随之将发生两个转变：从末端治理向源头控制转变；从过去的单因子控制向协同控制转变。



2023年3月21日，内蒙古二连浩特遭遇强沙尘暴天气，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民警正在对车辆进行检查。

新冠疫情期间，管控措施放缓经济社会运行，排放水平下降，空气质量获得持续改善。但随着经济增速下行，政策面似有踌躇。业内注意到，2021年前后筹划的第三个国家级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十四五”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至今尚未出台；国务院多部委每年都会联合发布的重点区域秋冬季攻坚方案，在刚刚过去的2022年秋季罕见缺席；有的地方政府也不再对2023年度空气改善幅度作量化要求。

或多或少，这给了一些企业主体“大气治理有所放松”的信号。2023年伊始，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汾渭平原等地连续出现污染天气，生态环境部突击检查多家涉气企业造假。刘炳江称，经济全面恢复，“两高”（高能耗、高污染）产品产量和汽油消费量增长，有地方和企业极力追求经济增长而违规。“今年经济发展确实带来污染物排放量增加，空气质量反弹压力很大。”他说。

今年是“大气十条”颁布十周年。2013年至今，围绕着大气治理，中国政府已将长效减排和短时应对的各种工具和方法论都握在手中，各项法规政策趋于健全，技术不断更新迭代，对大气污染的科学认识也更加深入。但如何运用这些工具，取决于决策者对社会经济成本的总体考量，地方、企业和公众也有待更明确的信号。

雾霾再来

2023年3月5日，邹毅照常早早来到位于北京国贸中央商务区东头的大望桥附近，对准西边按下快门。斜顶的北京电视台屹立正中，远处两幢并肩高楼看不真切。空气好时，人们能一眼认出它们——国贸桥西的双子座大厦，两地相距2公里。

他随后发布微博：7点41分，北京市，晴，空气质量中度至重度污染。空气质量实况图中，象征AQI超过150（即轻度污染以上）的红点遍布全城各区。

这是邹毅每日拍摄天空的第11年。2013年1月至今，他把同一位置和角度的3600多张照片以年为单位拼接在一起，让人一目了然——清澈的蓝越来越多，灰白的霾越来越少。

但今年情况有所变化。“过去三年里，雾霾大概都是一天两天，基本不会超过3天。”而今年3月初污染天气持续，“一个是大概前前后后持续长达10天，还有一个就是雾霾和沙尘交替”。邹毅心里犯嘀咕：怎么会这样呢？

3月5日晚，国家大气污染防治联合攻关中心（下称“攻关中心”）发文解释该次区域性污染过程：3月3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部分城市出现PM2.5超标，4至5日逐步加重，多个城市达到中度污染。5日白天，太行山沿线及环渤海多个城市短时中至重度污染。

空气质量由污染物排放量和环境容量决定，环境容量受气象条件、地形、产业结构和布局影响。攻关中心研判认为，区域排放处于高位和扩散不利的气象条件，共同造成了这次污染，而前者为根本原因。攻关中心称，2月份起，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钢铁、焦化、玻璃等不可中断工序行业维持高位运行，水泥、石灰、砖瓦、陶瓷等可中断工序行业开工率快速上升，机动车等活动水平也快速增长。春节以来，京津冀及周边工业用电量和柴油货车交通流量、柴油销售量、工程机械开工时长等指标均处于今年以来最高水平。从气象上看，3月3日，华北地区近地面风速下降，局地出现风场辐合现象；北京、天津、唐山等城市出现强烈贴地逆温，相对湿度迅速上升且大范围轻雾，容易导致污染物持续累积与转化。



2023年4月11日，北京，市民戴着围巾和 罩在沙尘中等公交车。

对此，邹毅也有直观感受。“今年2月份空气比1月份差，3月份比2月份差。4月刚中上旬，也是不太好。”通过照片对比，他推断2023年一季度空气质量比2021年和2022年都差，“过去三年里，今年3月可能是空气质量最差的一个月，整个一季度可能是最差的一个季度，雾霾和沙尘暴都更频繁了”。

实时空气质量数据平台“蔚蓝地图”梳理的数据显示，截至3月15日，2023年全国168个重点城市PM2.5、PM10平均浓度同比上升，优良天数同比下降；京津冀及周边“2+26”城市前两项指数同比分别上升9%、21%，优良天数则下降8%。

“有些地区PM2.5的上升还是很多的，像北京就在比较显著的一个升高层，37到47。天津、廊坊这样华北平原中间偏北的区域上升幅度会显得高一些。”“蔚蓝地图”开发方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创始人马军表示。

经济复苏带来的排放增量从统计数据上也可见一斑。马军称，表征经济变化趋势的采购经理指数（PMI）反映今年制造业景气度回暖，且更多集中在一些大的、重的工业和能源方面。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月制造业PMI为52.6%，上升2.5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高于荣枯线，显示制造业景气持续上升；与此一致，2月份财新制造业PMI录得51.6，较1月上升2.4个百分点，2022年8月以来首次高于临界点，为2022年7月以来最高。

国家统计局PMI调研以大中型企业为主，财新PMI则更多反映中小企业情况。“统计局PMI高于财新PMI，意味着还是一些大型企业更景气，它们通常都比较偏重工业，排放能耗也较高。”马军认为，除经济复苏致排放高位

外，还应警惕监管放松。

2023年2月，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副部长赵英民分别赴河南、陕西实地检查，发现平顶山、许昌市重点行业企业普遍存在不正常运行污染治理设施、超标排放、不落实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措施和数据造假；咸阳、渭南和韩城市则有干扰监测、编造虚假台账、超标排放等问题。

马军称，企业有没有应急减排，通过自动监测等技术手段并不难识别。例如，应减排时用电量不减少，或白天减少晚上增加。“但是这样显而易见的问题，地方环保部门为什么发现不了？地方在拼经济的压力之下，是否有所松懈，对环境污染有可能网开一面？这是值得高度警惕的。”据“蔚蓝地图”统计，2023年一季度全国共计发现2.8万余例环境违规问题，涉气违规占41.7%。

3月28日的大气污染防治发布会上，刘炳江坦言，经济恢复给大气治理带来压力。他称，2022年汽油和柴油消费量比2019年均有所下降，今年以来基本恢复；目前钢铁、有色、焦炭等高能耗、高污染产品产量自然增长；过去重点行业通过产能置换，合法合规新建的重大项目逐步投产，带来的污染物排放量也在增加。同时，一些地方极力追求经济增长，盲目上一些“两高”项目。还有一些企业为了追求经济利润，违法违规排污。他表示，生态环境部将通过工程减排和向企业达标排放要更多确定性的减排量，冲抵经济发展带来的排放量和不利气象条件的不确定性影响。

从“大气十条”到“蓝天保卫战”

需要指出的是，一季度空气质量的下降和“反弹”，是相对2020年至2022年三年疫情期间而言。与2019年同期相比，2023年的空气质量仍有明显改善。大气治理参与者的一个共识是，近年来大气治理工作的成效毋庸置疑。

黄润秋在2023年全国“两会”首场“部长通道”中介绍说，2013年至今，中国重点城市PM2.5浓度已累计下降了57%，单位GDP（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降低了34.4%，是全球空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清洁能源利用规模最大的国家。

2013年至2022年，中国PM2.5浓度“十连降”，重污染天数减少92%，二氧化硫浓度降至个位数。全国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量由2000多万吨，分别下降到300万吨和900万吨左右。“取得这些成绩的关键是卓有成效的顶层设计。”刘炳江称，“大气十条”和“蓝天保卫战”两部纲领性文件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大气十条’的制定过程是多年来调研耗时最长、争论最激烈，也是修改最多的一次”。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下称“环规院”）大气环境规划研究所薛文博等人回顾中国大气环境管理历程时指出，“大气十条”确立了以大气颗粒物浓度为核心控制目标的污染防治模式，将PM10、PM2.5浓度下降比例作为控制指标，提出了减少污染物排放、调整产业结构、加快企业技术改造、建立监测预警应急体系等十项措施。

“蓝天保卫战”则延续了以PM2.5污染为核心的管控思路，将SO₂、NO_x排放总量和PM2.5年均浓度、优良天数比率作为核心指标，提出产业、能源、运输、用地四项结构调整，并分解落实到相关部门，明确量化了指标和完成时限。四项结构至今仍是大气治理的重要抓手。

这两大行动计划的实施引来海内外广泛关注。北京大学环境管理系教授张世秋表示，中国的大气治理难度世所罕见，外界一方面质疑其目标能不能达到，另一方面也担心环保的强势推动对经济和社会有影响。“我想可能还有一个特殊性在于，面临这么重大问题的时候，当我们有这么强的政治意愿和那么详实的规划和计划，它真的在现实当中发生了吗？”

最终，“理想照进了现实”。2017年全国可比城市的PM2.5年均浓度相比2013年降低35%，是世界上首次实现如此大地域范围内的大气环境快速改善。2020年，全国PM2.5年均浓度比2017年再下降20%。

曾参与“大气十条”和“蓝天保卫战”制定和后评估工作的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王书肖向财新介绍，两份行动计划措施类别基本一致，包括燃煤电厂与非电的工业行业、工业锅炉，农村的清洁取暖，移动源的排放管控，扬尘等方面。但具体措施上，后者更强调源头治理。“应该说‘大气十条’一开始的时候，有很多污染源的末端管控都不到位。2013年到2017年很多行业提升末端治理，同时治理了大量‘散乱污’。”

主要污染物方面，“大气十条”更侧重SO₂、NO_x和一次PM2.5减排，2018年至2020年的“蓝天保卫战”则增强了对挥发性有机物（VOCs）和氨的控制，“这也和我们PM2.5和臭氧协同控制的目标相关联”。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减排成效最显著。环规院和能源基金会2021年发布的《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十四五”大气污染防治策略研究》显示，“大气十条”的实施使京津冀地区减排约143万吨SO₂、95万吨NO_x和68万吨一次PM2.5。“蓝天保卫战”中，这组数据则分别为55万吨、50万吨和43万吨，并同时减排56万吨VOCs。与“大气十条”相比，后一阶段主要污染物减排幅度收窄。

王书肖解释称，技术可得性、减排成本效益和管控难度等，均会影响污染物控制的优先级。首先是最佳可行技术，“大气十条”主攻的SO₂、NO_x和一次PM2.5，相关减排技术最成熟，当时减排的环境效果也最显著。“简单来说，就像PM2.5的一次排放减了，直接浓度就降这么多，但减气态前体物还要受二次反应的影响”；其次，VOCs和氨等前体物来源更广、面源更多，而SO₂、NO_x和PM2.5的有组织排放源则更多，如SO₂主要来自燃煤电厂和工业

锅炉，“点源相对容易管控，面源则更难”。

刘炳江回顾称，2013年至2020年是中国空气质量改善的黄金时期，能源结构调整是最主要措施。2013年和2021年，中国煤炭消费量均为42.4亿吨，2022年比2021年增长4.3%。与之形成对比的是，2003年至2012年中国煤炭消费量增长了128%。刘炳江称，近十年能源发展是典型的“绿肥黑瘦”，成为控制排放增量转向以削减存量为主的机遇。

污染排放不仅取决于能源类型，还与使用方式相关。刘炳江表示，煤炭消费量下降的同时，结构变化更为关键，“把原煤散烧、低端设施替代掉”。全国燃煤锅炉由2013年46.5万台下降至不到10万台，窑炉被天然气替代，锅炉窑炉清洁能源替代取得突破性进展。

作为煤炭的主要用户之一，燃煤发电行业在大气治理中首当其冲。以超低排放标准倒逼，2020年全国具备条件的煤电机组全面完成改造，达到天然气排放水平。刘炳江介绍称，截至2022年底，全国10.8亿千瓦煤电机组完成超低排放改造，中国已建成世界最大的清洁煤电体系。但他也提到，发达国家煤炭使用90%以上在电厂，“咱们国家现在电厂才55%，量大面广的还是非电行业的消耗，非电是减排最难的地方”。

电厂排放大幅下降，使钢铁行业成为排放巨头。2013年以来，全国粗钢产量增加，企业数量减少约20%，平均规模由160万吨提升到250万吨。焦化、玻璃企业也是数量减少、平均规模提升。截至2022年底，产业结构调整结合供给侧改革，全国淘汰钢铁产能约3亿吨、煤炭10亿吨、水泥3亿吨，打击“散乱污”企业及集群6万余家。

“2013年制定‘大气十条’的时候，（外界）一直在追着问，甚至怀疑路径对不对，但是坚持走下来了。刚开始排放量那么高，不可能陡然降，只能一点一点降，降到一定程度必然有效果。”刘炳江总结说。

污染再认识

2020年新冠疫情的暴发打乱了全社会的节奏，但大气治理的科学研究并未因此止步，学界对大气污染的科学认识也更加深入、全面。“学界的关注从来没有削弱过，原因是大气污染治理问题本身高度复杂，本质上是一个特别漫长和艰辛的过程，它不会因为我们做了一个‘大气十条’就可以一劳永逸，依然还是有很多值得关注的底层学术问题。”张世秋说。

二次污染物及其背后的“非线性响应”问题，便是其中之一，疫情期间的“特殊排放情景”也深化了科学界对它们的认知。北京大学环境科学系副教授郭松表示，2020年后全国人为活动水平降低，城市地区机动车和餐饮排放显著减少，其间的空气污染和源排放为“非正常状态”，“我们提前享受了几年未来的空气质量”。而从基础研究的角度来看，研究者相当于在研究未来情景，“有一天一定会减到这个程度，那么它可能是怎样的机制，污染状况是什么？”

王书肖以北京为例介绍称，2020年全市餐饮排放显著减少，交通排放下降40% 60%，“在这两者大家肉眼可见下降的情况下，污染时PM2.5浓度仍很高，尤其是二次的颗粒物浓度，反而比疫情前的污染过程增加更快了”。

进一步的分析和模型模拟发现，氮氧化物等前体物减排带来了大气氧化性的增加，反而提供了更多促进二次污染物生成的条件。王书肖介绍，SO₂和一次PM_{2.5}减少排放后，其浓度几乎是线性下降，但二次PM_{2.5}和臭氧则与前体物排放之间存在非线性响应，臭氧尤其显著，减少NO_x或VOCs还可能带来它浓度的上升。“那就相当于我们这个活儿白干了，帮倒忙了。”

“非线性响应意味着，不是我们努力一分，就一定能得到一分的收获。”郭松称。

事实上，学界和政府对上述非线性响应的认识可以追溯到更早。郭松介绍说，早在2016年左右，研究者就包括非线性响应在内的许多科学问题作了汇报，提出“用最小的消耗和代价换来最大的环境收益”，“所以在那个时候相当于就开始两手抓了，一方面减污，另一方面开始污染物生成的机理研究”。

减污过程中，PM_{2.5}等多项污染物浓度下降，但臭氧浓度同时上升。科学家们发现，臭氧本身是一种污染物，同时也是一种氧化剂，可增强大气的氧化性，从而增加二次PM_{2.5}浓度。“也就是说会抵消一部分一次减排的效果。”王书肖解释道。疫情是一场被动减排，但反过来启示我们主动减排时应避免这一情形，实现PM_{2.5}和臭氧浓度都下降的目标。“大家进一步认识到，大气是‘一个大气’，污染物之间不是各自独立存在的，能够同时解决这些问题比一个一个解决更有效。”

王书肖同时提示，臭氧污染凸显并不意味着PM_{2.5}污染已经解决。中国仍有超过30%的城市PM_{2.5}年均浓度达不到35的国家标准，而这一数值是世界卫生组织（WHO）指导值的7倍。PM_{2.5}显著改善，但其健康不利效应仍然最大，治理也进入“深水区”，电厂减排逼近极限，而交通需求未来还将增长，“挑战是没有减的”。

协同治理是主流解决方式。王书肖称，不同地区、时间的非线性响应有差异，应根据PM_{2.5}和臭氧浓度对前体物的响应关系，提出更有效的多污染物协同控制措施，以及多污染源治理的协调。

移动污染源对二次PM_{2.5}和臭氧前体物的排放贡献显著。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副教授张少君对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社会经济活动变化导致的污染物浓度，进行了4个月跟踪分析，其结论为：在较长周期内，交通活动下降会导致PM_{2.5}总体浓度下降，但在一些极个别时段，例如2020年1月底和2月上旬，出现静稳、高湿现象，交通活动下降反

而会导致臭氧浓度增加，促进了二次PM2.5的生成。“实际上就是前体物减排比拼二次转化，大部分时间前体物减排对PM2.5改善效果显著，个别时段二次转化作用更突出。”

2013年以来，国家对移动污染源遵循“车 油 路”的治理框架，机动车排放标准不断提高，车更重视在用监管；油则是交通能源的低碳化转型，大力推广新能源；路包括城市绿色和公共出行推进和大宗货物的运输结构调整。张少君称，从技术成熟度考虑，目前汽车行业已经具备满足“国六”排放的技术能力，针对重型柴油车的OBD（车载自动诊断系统）在线监控已在北京率先实践，效果显著。

他表示，移动污染源治理有其特殊性，一方面中国机动车千人保有量刚刚达到200辆，远低于日、韩等国，还处在快速上升期；部分大城市保有量密集，污染贡献相对突出。另一方面，涉及小客车车主、卡车司机等群体，很多政策需要考虑经济可行性，不宜激化社会矛盾。

“车辆高速增长、高度聚集、高频使用，意味着移动污染源今后将成为大气污染治理领域长期的焦点。”张少君介绍说，由于发动机燃烧技术差异，柴油车PM2.5排放量高于汽油车，其中柴油货车是目前贡献较突出的污染源。同时，柴油货车治理对PM2.5和臭氧污染控制都有直接联动性。

2022年11月，生态环境部等部委联合印发《深入打好重污染天气消除、臭氧污染防治和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方案》，提出到2025年，全国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气基本消除；PM2.5和臭氧协同控制取得积极成效，臭氧浓度增长趋势得到有效遏制；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水平显著提高，移动源大气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明显下降。

“我们现在有很多提前的认知，这些认知都是可以应用到技术和控制当中去的。”郭松称，基础研究厘清机制规律，环境管理和公共政策翻译成可操作措施，真正意义上形成全链条，才能达到治理目的。当认知更进一步，推动作用将更大，效果也将优于原定减排路径。

短时污染天气的预测与应对领域也有新进展。刘炳江称，经过2000多名科研工作者联合攻关，现已厘清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重污染成因、传输规律和消散机制。随着预测预报能力不断提升，已能预测到10天以内有没有雾霾、程度有多高，“而且污染过程的预测准确率接近百分之百”。

同时，王书肖等人建立的排放浓度响应模型能够和空气质量预报结合，预测污染过程来源、评估应急减排措施的有效性，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期间得到了证明。她介绍说，过去的活动保障大多针对PM2.5，较少针对臭氧污染，模型对臭氧的模拟还存在问题，会出现“高值低估”，即臭氧污染很重但模拟不出实际浓度高值，一定程度上会带来措施评估的偏差。

“2022年的冬奥会相比于2008年夏奥会，污染预测效果是突飞猛进、非常大的一个进步，但你要说完备，还不行。”但王书肖始终认为，污染控制不能等着科学做到完美再开展，在一些大方面相对清楚时就应先去支撑调控，靠实践检验措施是否有效。

河北城市集体“退出后十”

三年“蓝天保卫战”中，三大重点区域——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长三角地区和汾渭平原的空气质量均得到显著改善，其中河北城市集体“退出后十”的表现尤其亮眼。比对全国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排名可以发现，曾经名列倒数的河北城市如石家庄、唐山、邢台、邯郸等，纷纷退出了“后十名”。2022年，河北省PM2.5平均浓度36.8，为2013年来最好水平。

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李晋宇表示，全省11市全部退出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排名“后十”，实现历史性突破。他称，省厅把巩固拓展“退出后十”成果作为环境系统2022年工作的首要任务强力推进，11名厅级领导带队11个驻市帮扶组，推动石家庄、唐山、邢台、邯郸等市退出空气质量排名后十位。

邢台市生态环境局向财新介绍称，2020年初该市就自我加压，首次提出“PM2.5退倒十”目标，并大幅调整了市生态环境局领导班子，新班子称“不退倒十、集体辞职”。最终当年其PM2.5全国排倒数第18名。2021年该市再加压力，率先提出综合指数“退后十”，以全国倒数第23名，在河北4个“退出后十”城市中成绩最好。2022年，河北提出全省所有地市综合指数“退后十”目标，邢台倒排第12名，“较好地完成了‘一天也不能进后十’的政治任务”。

该局大气科科长李艳华称，2022年开年气象条件不利，邢台综合指数久久在“倒十”徘徊，“我们最害怕的时候是到11月，就剩最后那么几天了。疫情正好是我们最吃紧的时候，只要是没有阳过的都没休息，每天在单位统计、督促”。提心吊胆直至最后，“到12月31号下午6点心里才踏实”。

他介绍说，邢台已完成平原地区140多万户散煤治理，仅剩山区等8万余户“改不了的”；完成钢铁、水泥、炭黑等行业深度减排项目400余个；全域控尘，市区开展“全民洗城”活动；全面停止销售低于“国六”标准的汽油、柴油，推动城市保洁、公交等车辆新能源化。

工业企业是河北减排的主要对象，包括关停落后设备、淘汰产能、砖瓦窑退出等措施。刘炳江披露，2013年以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钢铁企业数量减少一半，规模提升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河北省钢铁企业数量减少60%，平均规模达到440万吨，为全国最高。截至2023年3月底，全国完成超低排放改造的粗钢产能，90%集中在京津冀及周边；淘汰的钢铁产能中，河北占近三分之一，超过20家钢铁企业关闭。

“为什么河北现在退出来‘倒十’，原来七八个城市空气质量排名倒数第一到第七，但现在退出来，这是下了大功夫。”刘炳江说。

邯郸市生态环境局大气科人士告诉财新，2021年邯郸关停钢铁企业20座高炉、19座转炉，焦炉全部退出；2022年邯钢老区主要装备全部关停，累计退出砖瓦窑企业超过160家。截至2022年底，邢台淘汰炼钢产能70万吨、玻璃生产线10余条，退出砖瓦企业近50家。



2023年4月11日，山东日照，沙尘天气下的港区铁路。2013年和2021年，中国煤炭消费量均为42.4亿吨，2022年比2021年增长4.3%。

关停退出后，留存企业则实行绩效分级分类管理。2019年生态环境部印发《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应急减排措施制定技术指南》，根据企业生产工艺、管理水平、治污水平等，对钢铁、焦化等15个行业明确了绩效分级指标，水平好的A类企业在重污染天气应急期间免于停限产，自主减排。

“这里其实体现了中央强调精细化治污的要求，更科学了，也更加考验我们的管理能力。”马军称，首先要保证地方制定绩效名单科学、合理，其次是实际执行过程中，“有些需要停，有些不需要停”，外部更难有效分辨和监督，可能产生地方保护、寻租等不正常情形。

2023年4月，河北省出台《支持重点行业环保绩效创A的若干政策措施》，从税收减免、财政补贴、中央大气资金支持等方面，调动企业创A积极性，并拓展A级企业减少错峰时间、重污染天气期间自主减排、减少现场执法检查等政策优惠。邯郸市生态环境局称，全市有42家企业列入重点行业绩效全面创A范围，其中5家企业已成功创A，未来3年将完成剩余37家企业环保绩效创A。



2018年11月24日，山东荣成推行“空气能+太阳能”新型清洁供暖方式，代替古老的燃煤锅炉供暖。

作为减排主体，企业的环保观念也逐渐由被动转向主动。有唐山钢铁行业人士向财新表示，2022年河北A级钢铁企业21家，占全国比例近十分之一。由于排放标准提升、监管趋严和违法成本增加，2015年前企业还抱着“有治理设施就行”的侥幸心理应对检查，但现在普遍以“超前意识”投资环保设施。

“一是能力超前，二是技术超前。”他举例说，生产装备设计100万吨规模，但环保设计可能要超出10%甚至20%，以确保排放标准再提高，设备也能处理达标，无需更换。超高温发电等新技术应用后可以降低企业能耗，节省成本。

张世秋认为，企业观念转变和技术创新能力尤为关键。在她看来，过去中国污染治理的成绩固然值得肯定，但持续和稳定的政策信号释放以及因此形成的长期预期则更加重要。通过此前与钢铁、化工、水泥等传统意义上的污染行业访谈，张世秋对企业和行业里的技术变迁和行为转变感到欣喜，“这是过去这五六年一个更为重要的成果”。



2023年4月19日，银川市被沙尘笼罩。2013年以来，移动污染源遵循“车—油—路”的治理框架，机动车排放标准不断提高，车更重视在用监管；油则是交通能源的低碳化转型，大力推广新能源。

“当全社会在基本面形成了一个共识：污染是要治理的，陈旧的技术和不恰当的生产方式和生产流程等早晚都是要被市场所淘汰的。”张世秋说，当企业有了这样的预期，短暂因素会干扰但不会影响它们的长期决策，好的企业会清楚面向未来市场，重视研发与绿色相关的新技术，并逐步规模化、降低成本，比如这些年已经可以看到的可再生能源与燃煤发电成本差距的缩小；如果政策信号稳定，长期预期不变，企业不太可能再倒退回“应对政策”，因为那变得非常昂贵。“这个进步不仅仅带来环境改善，最重要的是我们能看到影响、塑造环境形势的驱动力在发生根本性变化。”她称，这样的认识，对决策者和政策制定者也非常重要。

未来方向

随着“大气十条”和“蓝天保卫战”的圆满收官，一些末端治理措施也已趋近效用极限。2020年9月，中国宣布“双碳”目标——力争在2030年前达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由于能源活动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和大气污染物排放“同根同源同过程”，“减污降碳”越来越被各方强调。

刘炳江表示，之前十年减污降碳行之有效的措施，“十四五”期间会继续应用。中央作出“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重大战略部署，生态环境部将会同相关部门出台工业、能源、交通运输领域，以及钢铁、石化、建材、有色金属等行业碳达峰实施方案，统筹大气污染防治与“双碳”目标，从源头减少大气污染物和碳排放。

未来的大气治理需要更多从能源、产业、交通运输等结构调整着手。“光靠治理大气污染带不动，需要和‘双碳’这样大的战略结合，才有可能形成强大的动能去推进。”马军称。

但IPE也发现，过去行之有效的措施，后期曾出现松动。一方面，在线监测平台重叠，导致企业披露数据减少。马军介绍说，2014年中国首次启用在线监测数据实施公开，数以万计的企业联网，涉及大气的重点排污单位每小时披露数据。到了2019年前后，陆续有省份以数据发布在国家平台为由，不再充分运行原有平台，以及不同平台间存在数据联通等问题，导致对外公布的企业和数据越来越少。据IPE梳理，目前信息披露平台分成三类：原有由省级环境部门管理的自动数据平台、国家监测平台和排污许可平台。

同时，一些地区给遭受行政处罚的企业名称打上了“马赛克”。马军称，“XXX企业”现象原常见于2008年前后，后续因法规完善基本得到解决。但2021年至2022年又再次出现，“而且一些地方还比较坚决，你即使去申请，他们也不公开（企业名称）”。他表示，在线监测数据公开滑坡较多，“马赛克”的情况因明确违反法规还不多见，但应特别警惕“破窗效应”——有地区这样做，其他地区或许效仿，最终导致滥用环境容量的“公地悲剧”。

马军认为，治理雾霾最初始于PM2.5等污染物全国监测网络的建设和发布，即始于监测和公开，现在依然要借助这样的方式，而且应该更加充分，以达成“十四五”规划要求的基本消除重污染的空气质量目标。

此外，环境执法也有转变。作为中央环保督察的主要队伍，环境部门在治理之初大力查处，后期更多强调帮扶、协助，找到相关通道解决企业问题。多地提倡服务型执法，有地方环境部门称日常“无线索不检查”、合并检查事项，实现“一次执法、全面检查”“进一次门、查多项事”，解决重复执法、多头执法问题，减少对企业的打扰，并倡导“柔性执法”，轻微违法、首次违法等免于处罚情形。

“现在是各地都在铆足了劲拼经济的状态。”马军呼吁大气治理借力“双碳”，除环境部门外，发改部门应为只剩不到七年的碳达峰时限做充分考虑，让地方根据自己的发展阶段和资源禀赋，差异化设定更符合实际情况的碳达峰目标和峰值，形成全国一盘棋，以确保梯次有序达峰。

“如果我们能够在‘双碳’的这个方向上有所突破，可以进一步带动大气污染防治。”他说。

中国已有的产业结构变化和技术进步也令“减污降碳”面临不确定性。张世秋表示，近年来环境保护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使得绿色经济组分在产业结构中已经呈现持续增加的态势，并在成本和市场份额上具有了相当强的竞争力。

过程中也存在着哪些产业或者生产流程被淘汰等诸多不确定。“逐步淘汰的部分是什么？基于什么？假设能够识别，针对不可能长期存在的某些类型生产流程或产业，是强制性地要求企业不断升级更先进的治理措施，还是引导它们逐步退出市场？这是未来结构性调整对环保政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她称，过去风能和太阳能不太可能快速替代传统能源，现在其成本已降下来。或许还要解决电力的安全供给等问题，但总的来说，新技术替代老技术的可能性增强，“机会更多，选择更多”。

新技术并不必然昂贵。张世秋表示，风力、太阳能发电，包括如今火热的第四代核能、氢能等有很多技术的不确定性，但储能等关键技术一旦突破，可能会有新的普惠式变化，市场容量扩大、规模经济形成，平均成本随之降低。新能源汽车发展已是有力证明。

更为各界关注的是疫情对经济影响的不确定性。“疫情对中国经济到底影响有多大，可能谁都不能给出确切的答案，但这种影响是否大到让大家放弃或放松一些环保方面的努力？”张世秋认为，在经济影响不甚明了时，至少不能放松环境改善的努力和长期的政策要求。她表示，企业决策和技术研发受市场和预期驱动，其中包括环境政策和要求的预期，只要环境政策的一致性信号存在，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就不会停止。“对于关乎长期发展的政策，最怕的就是朝令夕改，不仅于事无补，更可能带来混乱和更大的长期社会发展成本。”

上述钢铁行业人士诧异于2022年至2023年未像往年一样发布秋冬季错峰限产文件，“现在我们也迷糊了，原来都有秋冬季限产，今年怎么还松了呢？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标志阶段，如果今年开始比如连续三年都不限产，那我们就进入一个自觉状态了？”

受国内钢铁市场供需不平衡影响，他并不认为不限产利好钢铁企业。“我们希望限产，现在的产能是绝对过剩。即使我们限一些，也想把利润提高起来。”他称，过往秋冬季大气攻坚或其他原因限制一部分钢铁产能，2021年和2022年行业利润上升，“今年不限产，1、2月份亏损了”。

也有企业对未来有稳定预期。邢台A级企业德龙钢铁环保部门负责人称，2023年3月发布的《美丽河北建设行动方案（2023—2027年）》要求，空气质量不能进“后十”，“去年一直在提‘退后十’，今年要巩固成果，所以说大环境的压力还是有，发展经济的同时还要提倡绿水青山”。他认为，德龙通过治理投资，也享受政策带来的好处，如可以通过控制排放浓度自主减排。不过他坦言，“‘双碳’具体怎么操作现在还很迷茫”。

张世秋认为，减污降碳推进的核心是治理模式中得有抓手，空气质量标准或许可以纲举目张。通过严格空气质量标准，地方只能严于国家统一标准，起到杠杆作用。她表示，如果空气质量标准得以修订并且实施，或许可以成为一个核心的政策，使得地方政府在考虑空气质量达标过程中，同时兼顾“双碳”目标的实现和污染控制措施。“因为实现空气质量目标，这些东西你都要拎着，不拎着达不到。”

2021年9月，WHO继2005年后再次更新了空气质量指南（AQG），基于健康影响收紧了PM2.5、PM10的年均目标值，其中PM2.5年均目标值由10下调到5。张世秋和中国科学院院士朱彤等在解读中提及，中国《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中PM2.5和臭氧标准曾参考2005版AQG，在大气污染防治中发挥了关键引领作用。现行标准对大部分已达标城市不再具有强有力的引领和驱动作用，是否要启动新一轮空气质量标准的修订、如何缩小现实可行的环境质量标准与AQG之间的差距，需要更深入的研究与决策权衡。

王书肖称，趋势上要加严，但目前还有一些其他问题。例如，如果标准仍然仅限制浓度，但相同浓度的不同组分的健康效应可能不同，各方对优先控制哪些组分还未达成共识。

她参与制定了《“十四五”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称设计时曾有粗略经济变量考虑，但因为关于未来都是情景分析，一般设定会面临实际情况的不确定因素。她表示，“大气十条”做出过很好的实践，在2015年做了计划的中期评估，给了非常重要的结论：如果按照现有措施继续实施，实现目标很有难度。彼时中国工程院院士贺克斌曾建议采取一些“非常规”的强化措施来保证目标实现。她认为，“十四五”也应有此评估，回顾前两年变化带来的影响，调整后两年的一些措施，以确保目标实现。“今年就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时间节点。”王书肖说。

周泰来、罗国平对此文亦有贡献

版面编辑：刘潇

社论 | 让民企在科技创新中放手一搏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第17期 出版日期 2023年05月01日

民企能在科技创新中担当大任，根本原因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在强有力的利润导向下，没有科技创新，民企便无法生存



重庆，智能数字化工厂。推动形成企业为主体、产学研高效协同深度融合的创新体系，必须协调发挥好政府、高校、科研院所和各类所有制企业的作用。图：视觉中国

如何发挥企业，尤其是民企在科技创新中的作用，事关创新型国家建设、高质量发展全局。近日，中央深改委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意见》《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等文件。会议特别提到“积极鼓励、有效引导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创新”。这表明，决策层对民企寄予厚望，在科技创新上也视民企为“自己人”。

这一厚望是有事实依据的。民营经济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常被总结为“五六七八九”，其中的“七”，即指民营经济贡献了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此外，民企集中了全社会80%的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和90%的高新技术企业。根据全国工商联发布的《2022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企的研发费用总额1.08万亿元，占全国研发经费投入的38.58%，占全国企业研发经费支出的50.16%；同比增长23.14%，增速比全国高8.5个百分点。同时，研发人员总数165.38万人，占员工总数的比例为12.98%，占全社会研发人员的28.93%。由此可见，民企科技创新不仅成果丰硕，而且效率占优。

同时，一大批依靠自主创新的民企强势崛起，有力推动了中国产业升级。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民营企业发明专利授权量TOP10(2021)”，[华为](#)居于首位。截至报告发布时，全球声明的5G标准必要专利共21万余件，涉及4.7万项专利族，华为声明5G标准必要专利族就达到6500余项，占14%。在新能源汽车、移动互联网、光伏、新材料、装备制造等领域，也涌现了一大批领军民企。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技术方兴未艾，民企同样担当了“领头羊”角色。

这里之所以不厌其详列举民企在科技创新中的业绩，意在以不可辩驳的事实说明，民企已然成为中国科技创新的主体。离开民企，创新型国家建设就无从谈起。在科技创新上，民企用得上、离不开，自然也应当信得过。中央多次强调“创新不问出身”，显系力图消除门第观念，让民企在科技创新中放手一搏。

民企能在科技创新中担当大任，根本原因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在强有力的利润导向下，没有科技创新，民企便无法生存。它们对“为谁创新、谁来创新、创新什么、如何创新”有着清晰意识，在科技创新上嗅觉灵敏、机制灵活、决策效率高。

创新不问出身，积极鼓励、有效引导民企参与国家重大创新，前提是公平对待。科技部负责人曾明确表示，不管是国有还是民营企业，大家在创新方面都是一视同仁的，都有同样的机会公平、规则公平、权利公平。科技部和财政部印发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升行动方案（2022—2023年）》提出，健全民企获得创新资源的公平性和便利性措施，形成各类企业“创新不问出身”的政策环境。这一姿态值得赞赏，现实中也有一些可喜进展。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企中，有236家企业参与了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国家重点实验室等创新基地的建设。这是一个良好开端。

然而，民企参与国家重大创新还远远不够，掣肘颇多，话语权偏弱，尤其是限制其创新的体制障碍依然有待清除。民企与科技主管等政府部门的关系相当敏感微妙。即便有一些资金和项目投入企业，在同等条件下也往往是国有企业更具优势，这一问题并非今日才出现，但是，今天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做出改变。这已经成为中国科技创新最为突出的矛盾，务必尽快解决。实现各类所有制企业在创新上的平等，涉及观念、利益、体制等一系列问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民企的科技创新投入，与其自身的发展信心和稳定预期有莫大关系。对它们来说，科技创新是一项风险投资。

当企业对未来发展前景较为乐观，自然会在科技创新上积极布局，甚至超前投入；反之，企业则会减少投入，即便是明知该投，也会畏手畏脚。前几年，收缩性政策较多，不少民企徘徊观望，甚至明言“过冬”。若要激发民企的创新动力，就必须首先纾解民企的焦虑，激发民企的发展信心。近来，决策层对此高度重视，各级政府闻风而动。倘若民企信心得以重振，中国科技创新自会提速加力。

强调民企在科技创新中的重大作用，并不是说它可以包打天下。身处市场，以利润为导向，既是其优势，也是其局限。这一点突出体现在正外部性极强的基础研究中。因此，推动形成企业为主体、产学研高效协同深度融合的创新体系，必须协调发挥好政府、高校、科研院所和各类所有制企业的作用，这需要一套完善顺畅的机制，除了自主探索，还须借鉴国际最佳实践。

与中国当下的产业升级相适应，中国民企科技创新进步迅速，却潜力待掘，不容自满；前景光明，却路途艰险，不进则退。民企对创新突破的渴望空前强烈。我们期待，民企能够常态化地参与国家科技创新规划和政策制定；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中，让民企参与不是“不得已”，而是“必须有”。当务之急是，借助组建中央科技委员会、重组科技部等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东风](#)，为“创新不问出身”塑造良好的体制机制。

（本文为即将于**2023年5月1日**出版的《财新周刊》第17期[社评](#)）

版面编辑：刘春辉

最新财新周刊 | 万亿个贷不良处置蓝海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第17期 出版日期 2023年05月01日

随着卖方供给增多，个人贷款不良资产批量转让的一级市场将全面启动；多家地方AMC加码布局，希望通过科技手段解决定价难、处置效率低等痛点



江苏省淮安，市民从一家银行个贷中心门前经过。与前两年的第一批试点类似，目前个人不良资产转让仍然面临定价难、处置不易等问题。图：视觉中国

文 财新周刊 张宇哲

2023年4月18日至25日的一周内，三场关于个人不良贷款处置的专题会议在成都、杭州、南京密集召开。据财新了解，成都、南京的两场专题会，均由[银行业信贷资产登记流转中心有限公司](#)（下称“银登中心”）召集，主题为如何围绕个人不良贷款批量处置业务构建业务生态。多家股份制行、城商行、农商行、消费金融公司（下称“消金公司”）、信托公司以及地方金融资产管理部门（AMC）等个贷不良市场的参与者参加了会议。

“今年的新政开的口子比较大，地方AMC和中小银行都跃跃欲试。”杭州“2023个贷不良西湖峰会”主办方之一浙江省投融资协会个贷专委会秘书长甘小虎告诉财新。

甘小虎所称的新政是指，在为期两年的首批个人不良贷款批量转让试点即将到期之际，银保监会办公厅于2022年12月30日发布的[《关于开展第二批不良贷款转让试点工作的通知》](#)（下称“1191号文”），将试点期限延长至2025年12月31日。

更重要的是，参与试点的资产出让方大幅扩容：在国有六大行和12家全国性股份制银行的基础上，将政策性银行、信托公司、消金公司、汽车金融公司、金融租赁公司，以及北京、河北、内蒙古、辽宁、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河南、广东、甘肃11个省份的城商行和农村中小银行纳入试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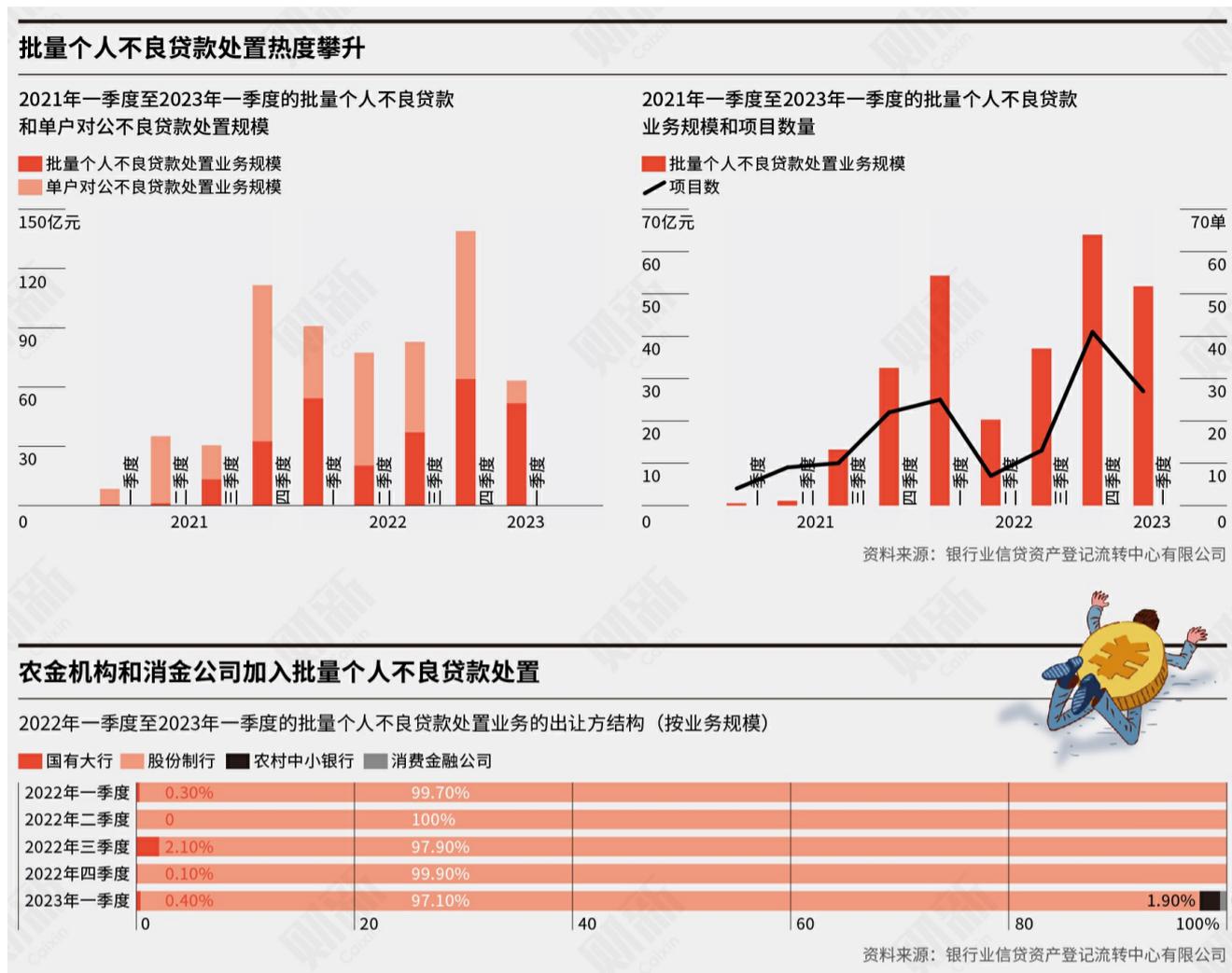
据银登中心数据统计，截至2022年末，不良贷款转让试点业务累计成交413单，本息合计575.62亿元；其中，个人不良贷款批量转让131单、223亿元，单户对公不良贷款转让282单、352.6亿元。

由于大量个人不良贷款主要集中在地方中小银行和消金公司，多位业内人士认为，随着试点范围扩大，卖方供给增多，个贷不良资产批量转让的一级市场将全面启动；未来个人不良贷款处置市场将是超过万亿元规模的“蓝海”。

专注不良资产处置的A股上市公司[海德股份](#)（000567.SZ），在近期发布的2022年年报中测算：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9）》](#)，2018年年末个人不良贷款余额为7103亿元，占当年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的25%；2022年年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合计约3万亿元，按25%的占比，预计2022年银行个人不良贷款余额为7500亿元；再根据《2022年中国不良资产管理行业改革与发展白皮书》推算，2022年非银机构个贷不良资产规模为7500亿元；此外，考虑到银行和非银机构会通过核销、处置等方式降低自身的不良资产余额，预计每年滚动新增的个贷不良资产规模为1.6万亿元。

试点扩容后，多家机构跃跃欲试。根据银登中心近日更新统计数据的[《已开立不良贷款转让业务账户机构统计表》](#)，截至2023年4月28日，已有726家机构开立了不良贷款转让业务账户，与2022年相比，新增的资产出让方有18家股份制银行分支机构、44家城商行及其分支机构、45家农村中小银行、11家消金公司、1家汽车金融公司、4家金融租赁公司和1家信托公司。从资产受让方看，目前已有118家全国性AMC及分支机构、51家地方AMC、5家金融资产投资公司注册。

“关键是银行要更多地放出个贷不良资产包，才能润滑整个个贷不良处置一级市场的生态链。”甘小虎认为，这个市场真正发展起来可能需要三五年，因为很多地方中小银行和地方AMC都是第一次做，特别是很多地方中小银行的IT系统要跟上。“一些中小银行的个贷不良账本还趴在柜子里，数据没有梳理，甚至还是手工记账，这会严重影响处置效率和估值。”



与前两年的第一批试点类似，目前个人不良资产转让仍然面临定价难、处置不易等问题。此前由于卖资产的银行不多，市场处于卖方主导，资产包价格非理性偏高，出手收购资产的地方AMC并不多，多数机构以观望为主；只有少部分地方AMC出于打通业务链条、提高曝光度的考虑入场，很多交易是高价成交的，收购机构属于“赔本赚吆喝”（参见本刊2021年第11期《求解个贷不良批量转让》）。

大熵（杭州）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大熵数科](#)”）相关专业人士认为：“今年资产估值从非理性的道路上慢慢回归，现在水龙头已经打开了，下半年可能还会有一些规模大的资产包出来，包括信托公司、城商行等，预计市场要回归理性。”大熵数科是地方AMC巨头[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浙商资产”）的参股子公司。

“个贷不良资产包从前期抢得挺火到今年价格逐渐趋于理性，主要原因在于：一是从供给端来看，随着试点政策进一步放开，转让机构数量增加，供应量也将进一步增加，同时去年出包的实际处置效果对市场价格的高估进行了校正；二是从需求方看，一级市场参与方AMC虽然逐步进场，但面对海量的资产包，管理工作面临挑战，资金端、处置端、技术端的一系列优化调整有一个过程。随着未来个贷资产包不断推出，预计价格还会在短期内有所波动，但随着科技和市场的发展，长远价格应该看涨。”[安徽国厚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国厚资产”）个贷业务负责人余宙告诉财新。

中小银行和消金公司入场

个贷不良资产批量转让机构扩容，对于地方中小银行和消金公司有重要意义。

在中小银行方面，第二批试点纳入的辽宁、甘肃、内蒙古、河南、黑龙江等，都属于央行《[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21）](#)》中高风险机构数量较多的省份。

在疫情之前借助网络平台获客的消金公司，因为主要服务于银行不愿意进入的下沉市场和长尾客户，故而不良率普遍高于银行，也急需处置不良。公开信息显示，近年全国因个人金融纠纷产生的诉讼案件迅猛增长，2021年全年持牌消金公司的诉讼量就达到了10万余件，比上年增长35%。

此前，银行和消金公司处置个贷不良资产主要有三种方式：自主核销、自行催收和资产证券化（ABS）。业内普遍预期，银登中心批量转让将成为未来中小银行和消金公司处置个人不良贷款的主要渠道。

2023年以来，已有三家新纳入的机构在银登中心发布个贷不良资产包转让公告，分别是[江苏江南农商行](#)、中邮

消费金融公司（下称“[中邮消金](#)”）和捷信消费金融公司（下称“[捷信消金](#)”）。据财新了解，这三家的资产包都已成功转让。

银登中心统计显示，按业务规模算，一季度批量个人不良贷款处置业务规模中，农村中小银行占1.9%，消金公司占0.6%。

3月2日，中邮消金发布“关于2023年第1期个人消费信用不良贷款转让公告”，成为持牌消金公司挂牌的首单个贷不良资产包。该资产包共计1280户、3046笔个贷不良债权，本金1668万元，本息合计3154万元；起拍价102.5万元，为本金的6.15%、本息的3.25%。据财新了解，经过多轮竞价，该资产包最终成交价不到一折，为本金的6.86%、本息的3.63%。

4月6日，昔日消金公司龙头、首家外商独资消费公司捷信消金也发布“关于2023年第1期个人消费信用不良贷款（广东包）转让项目转让公告”，拟转让1388户、1474笔个人消费信用贷不良贷款，未偿本金合计2576.6万元，本息合计2754.5万元。

过去两年，捷信消金经历了资产规模大幅萎缩和不良攀升，资产规模从2019年高峰时的逾千亿元降至2022年初的不到500亿元，处置不良、回收资金的需求迫切。2023年1月11日，捷信消金成为首家在银登中心开立不良贷款转让业务账户的消金公司。

早在2021年消金公司尚未纳入银登中心试点时，捷信消金就将几十亿元本金的个贷不良资产包，通过以租代售的方式卖给了浙商资产，可见其不良个贷的压力。

江苏江南农商行成为首家在银登中心成功卖出不良资产包的农商行。江南农商行3月初公告的信用卡不良贷款资产包，共包括360户、419笔债权，未偿本金合计7168万元，本息合计9815万元，起拍价500万元。据《新华日报》报道，该资产包有三家资产管理公司参与竞拍，经26轮竞价，最终由[苏州资产管理公司](#)竞得，并溢价成交。

目前看，中小银行和消金公司不良个贷批量转让还处于起步、酝酿阶段。过去两年试点中不良个贷批量转让市场的绝对主角 [平安银行](#)，或可为后来者提供镜鉴。

[东方金诚信用管理（北京）有限公司](#)根据银登中心信息整理的数据显示，2022年共有12家银行在银登中心发布批量转让个贷不良资产包，合计104个，本金合计69.3亿元、本息合计208.7亿元；其中平安银行发布的资产包有79个，本金合计63.9亿元、本息合计201.1亿元。可以看出，平安银行的资产包规模占比超过90%。

为何首批试点的18家银行中，出包最积极、最顺畅的是平安银行？平安银行在资产组包、与投资人对接、转让成交等方面有何经验？

在资产包的买方天津滨海正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下称“[滨海正信](#)”）董事总经理柴娇梅看来，“同样的组包，少数银行会提供产品规则、用户画像，提供相对多的财产线索，可以把系统开放给买方，投资人可以进行有价值的评估分析，这对未来的清收很有帮助，也降低了后期投入的人力物力成本”。

平安银行结构化融资部总监唐海澄向财新介绍，平安银行搭建了不良个贷的整个业务链条，也建立了自己的定价模型。目前平安银行的资产包主要是无抵押的个人消费贷，主要是其“新一贷”产品，面向有稳定连续工资收入的个人；今年也考虑将信用卡和小额线上个人贷款的不良贷款拿出来批量转让。

据唐海澄介绍，“新一贷”个贷不良资产包的底层资产如何组包，从2009年发行ABS时就着手开展了，相较于其他地方银行，积累的经验已非常多，主要的特点是，非常重视合规化，财产线索挖掘充分、全面，催收记录完整，资产种类丰富。

“我们希望前期就能和投资人达成互动，把投资人的诉求和银行内部的诉求结合起来，在前期组包时就能够找到双方比较满意的资产包，也希望给投资人一定的盈利空间；方方面面做了相应的考量和约定，转让后衔接工作配合度比较高。”唐海澄说。

在唐海澄看来，对于大量长账期形成的个人不良贷款，通过批量转让直接形成会计上和税务上的双核销，可以压降递延所得税资产、优化资产结构、较快释放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对于银行提前回收现金和降低管理成本都有积极意义。

除了开放的心态，在甘小虎看来，更重要的是平安银行已搭建相对完备的IT系统和大数据模型。“直接一拉数据，就能评估出资产的价值。但大部分中小银行IT系统还很薄弱，很多组包卖包的地方银行连用户资料都不全，还有很多都是纸质资料。怎么定价？”

甘小虎举例说，有些中小银行的用户资料是一大沓子纸，从柜子里翻出来打印或扫描的有几百页，“还停留在手工处理的阶段，没有信息化。这种资产的估值就会比较低，因为后期投资人要投入更多成本”。

过去十年，多数地方中小银行信息化水平进展缓慢。“只有跑得快的银行才能更好地参与到这个市场中。”一位熟悉不良资产处置的资深人士表示。

地方AMC加码布局

从个贷不良资产包批量转让的受让方看，地方AMC成为主力。银登中心数据显示，2022年一季度至2023年一季度，按业务规模算，约96%的个贷不良资产包由地方AMC收购。

过去两年，多家地方AMC加码布局个贷不良资产处置市场。例如，浙商资产就收了不少不良资产包。多位业内人士告诉财新，浙商资产是地方AMC中收资产包最多的，目前收了300亿元左右的个贷不良资产包，其中捷信消金的个贷不良资产包约165亿元。

一位了解浙商资产的人士介绍，浙商资产是“与时间做朋友”的模式，直接“吃包”，即直接持有资产包，然后自己定价、评估、处置，赚的是个贷资产价格上涨的钱。

在甘小虎看来，“有资金实力的投资人投资的是债务人的生命周期”，因为这一波个贷不良资产的借款人以年轻人居多，人生总有起落，年轻人从债务陷阱里走出来的概率肯定大于10%；而目前个贷不良资产包的价格不到一折，未来五年至十年资产价格可能上涨几倍。

浙商资产成立于2013年8月，为全国首批五家、浙江省第一家具有批量转让金融不良资产资质的省级AMC，公司注册资本近71亿元，是地方AMC中注册资本最高的。

浙商资产的大股东为国资背景的[浙江省国贸集团](#)，持股58.64%。2021年，浙商资产开始布局不良个贷市场；当年3月启动了个人类金融不良业务清收处置外部服务商的招募。截至2022年7月已完成377家合作机构的入库；浙商资产官网显示，彼时已收购、长期受托处置个人类金融不良资产合计224.48亿元。

不过，浙商资产这种直接持有资产包的模式需要资本实力支撑。对大多数还在探索盈利模式、资本实力薄弱的地方AMC来说，过去两年的试点中，通道业务仍是主业。“就是帮非持牌的民营企业买资产包，出资和处置都是别的企业做，地方AMC赚点通道费，一个资产包也就收一二十万元的通道费。”前述熟悉不良资产处置的资深人士说。

业内人士认为，随着个贷不良资产处置的卖方扩容、市场规模的扩大，有望为以通道业务为主、生存空间狭窄的地方AMC打开空间。

据财新了解，近来市场上已出现地方AMC的新锐力量，包括[辽宁富安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下称“富安资产”）、滨海正信、国厚资产等，在通道业务之外，也在探索处置不良个贷的多元化服务。这类地方AMC的管理团队通常此前已深入个贷领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比如“1191号文”之后首单消金公司个贷不良包——中邮消金的个贷资产包，最终成交价114.5万元，中标者是富安资产。持有富安资产40%股权的大股东[瀚华金控](#)（03903.HK），是一家成立于2004年的民营普惠金融集团，已经深耕小贷领域多年。

成立于2016年的滨海正信，亦开始发力个贷不良资产处置业务，包括制定三年中长期发展规划；集中资金、人力资源，设立个贷事业部，独立运营个贷不良业务；建设大数据处理中心，构建资产评估、数据管理能力等。

截至2022年底，滨海正信已收购了十几个个贷不良资产包。“当然和同业几家大型AMC相比，我们收购的规模不算很大，但收购的资产包数量还算不少，资产包的类型和处置方式也比较多样化。”柴娇梅说。

“滨海正信已经把个贷不良资产业务提升到了战略高度。”柴娇梅告诉财新，滨海正信多年前开始深耕零售类业务领域，有多年的业务实操经验，且在2021年个贷不良资产批量转让政策开闸后，专门组建了相关团队，从业人员大部分都有零售类领域十年以上经验。

目前，滨海正信已获批接入央行征信系统，这对于个贷不良资产的估值和后续处置中的个人征信修复都有益处。此外，还有四家地方AMC已经接入央行征信系统，分别是河南资管、广西广投、广州资管、广东粤财资管。

国厚资产布局个贷不良处置领域已有五年，包括成立科技公司、打造生态链等。2021年3月，国厚资产拿到首批个贷不良资产批量转让试点第一单资产包。2022年，国厚资产共收了19个个贷不良资产包，已收购的个贷不良资产包总规模36亿元。

专注不良资产处置的海德股份，业绩连续三年创新高。4月25日晚间，海德股份发布的2022年年报和2023年一季度报显示，该公司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10.63亿元、同比增长59.46%，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7亿元、同比增长82.63%；2023年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3.05亿元、同比增长51.65%，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1.92亿元、同比增长50.84%。

该公司年报提出，要抓住政策红利，快速做大个贷不良资产清收服务规模，计划未来一年累计管理资产规模不低于1000亿元，未来三年累计管理资产规模不低于4000亿元，其中以科技清收个贷不良服务业务为主。

最大痛点：定价

“2021年刚开始试点时，市场不理性，三折、五折成交的资产包都有，很多AMC抢资产包可能更多考虑的是广告效应；到了2022年后期，个贷不良资产包的价格已经回落到一折以内。那么这个价格到底合理不合理？作为一家国有AMC，内部的估值逻辑和流程必须经得起审计。”令[江西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孙涛最为困惑的是定价。

对于业内普遍认为的定价难，多家AMC有不同的应对策略。柴娇梅认为，零售类业务非常小而分散，基本上没有抵押物。资产估值需要综合考虑宏观经济形势、区域经济环境对个人的影响，资产管理公司处置能力，债务底层资产是否有瑕疵，司法资源利用对资产回收的影响等，所以定价确实是难点，“但也是因机构而异的，我们已经有了相对适合我们公司的估值模型和解决方案”。

在甘小虎看来，“价格是否合理，关键在于这个资产包能不能五年回本。今年很多资产包基本上回本周期是五年左右，就还可以”。

这一判断与海德股份的测算接近。该公司年报指出，海德股份目前收购个贷不良资产的折扣率平均为本金一折以内；通过司法诉讼方式处置，预计一年本金回收率约为15%、两年回收率约为20%、三到五年回收率约为25% 30%。

“有的资产包看着大，那么是不是有利润？”余宙认为要看三个关键要素：第一是这个资产包有多少债权已经进入诉讼阶段；如果已经使用了激烈的诉讼方式，后期再用传统的催收会有难度。第二是单笔金额的大小，如果是5万元以下的债务，对债务人影响不大，有可能尽快解决；如果债务金额在二三十万元，这部分大额债权笔数在资产包中占比较高，可能一时解决不了，“即使谈好了，也没有钱执行”。第三是借款人的债务总额，如果收完资产包发现借款人已经破产了，再去跟他谈和解、重组方案等，意义不大。

要评价这些关键因素，需要银行披露更多关于资产包的信息，包括借款人年龄、职业分布、学历、负债金额等。但对余宙来说，难题在于有些银行出售资产包时并没有披露这些细节，“希望银行能把更多的用户画像呈现给AMC，对未来拿资产包的价值判断更有利一些”。

作为不良资产包的卖方，平安银行也非常重视资产包的估值。唐海澄介绍，平安银行有自己的估值团队，多个业务部门会诊整个估值的逻辑，加上参考外部第三方机构的估值，将定价因素做了非常细致的划分。“银行更关注本金的折扣率，希望与市场共同完成价值发现。譬如，2022年一季度是10.3%，到四季度是8.2%，应该说市场上转让机构和受让机构之间逐渐达成更好的互动，逐渐找到更合理的价格区间。”

多位业内人士指出，由于很多银行第一次开展个贷不良资产业务处置，经验不足，加之[《个人信息保护法》](#)自2021年11月起实施，对于能给出哪些个人信息数据、如何处理敏感信息、是否涉及滥用用户个人信息等，多数银行比较谨慎。

一位地方AMC负责人表示，有的银行在债权转让过程中，只愿意交接债权合同，最多提供一些个人诉讼材料，“很多风控核心数据，比如共债信息、个人职业收入、家庭地址、身份证号码等，银行不愿意对外提供”。

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1191号文”第三条明确：不良贷款出让方可依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依法处理个人信息，即为订立、履行个人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合同所必需的情形下，不良贷款转让出让方处理个人信息，不需取得个人同意。

对于资料移交过程中，银行方关于个人债权的信息应该给到什么程度，柴娇梅认为，应建立明确的标准，银行方不能以个人信息保护为由，拒绝移交合理要求的档案，“收购方在得到标准化、充分全面的信息后，才会利用各自的资源禀赋予以更好的资产增值”。

柴娇梅认为，随着个贷不良资产批量转让业务的市场进一步开放，预计监管部门及银登中心将会进一步出台标准化、规范化的文件，包括信息披露标准化、合同文本标准化、转让流程标准化，并逐步将共债情况予以整合。

这也是业内的共识。4月下旬，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在第五届中新金融峰会上亦指出，特殊资产行业是传统非标行业，但当发展到一定阶段，可以促进产品的标准化，比如个人贷款和小微企业贷款的转让等。产品的标准化会让信息更加透明，让市场的定价更加准确。

“得科技者得天下”

在孙涛看来，开展个贷不良资产处置，没有一个数字化的管理平台是不可想象的。

与对公不良贷款相比，个贷具有小额、分散、量大、债务人数众多等特点，有估值定价难、后续处置效率低等问题。“过去抵押类的对公贷款基本是评估抵押物折现，有市场评估标准。个贷是信用消费类，小额、分散，估值必须基于科技手段、大数据模型化。”孙涛表示。

目前68家地方AMC中，有能力搭建自己IT系统的公司不多，没有估值模型，没有催收队伍，也没有构建完整的生态圈，多以通道业务为主。“但下一步可能慢慢会过渡到结构化的合作收购。”孙涛表示。

所谓结构化的合作收购，是部分地方AMC收购个贷不良资产包后，与其他有处置能力的地方AMC或“科技+催

收”民企合作处置；有实力的地方AMC自身也投资设立了处置资产的科技平台。

例如，大熵数科是浙商资产的参股子公司，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信息技术为抓手，搭建了“互联网+”及“不良资产+”的不良资产处置生态平台，形成了“熵+”系列产品，为债权人、债务人、服务商提供不良资产处置全流程智能化解决方案，已初步具备高效合规的资产管理、处置监控及资源整合能力。

前述了解浙商资产的人士说，大熵数科作为浙商资产的“亲儿子”，主要为浙商资产服务，包括资产整合、系统管理、处置等全流程管理。

海德股份亦主要以“大数据+AI技术”为支撑，聚焦于已纳入不良分类的个人消费信用贷款、信用卡透支、个人经营类信用贷款等个人信贷不良资产，大幅提高案件处置规模，降低运营成本。

海德股份所依赖的科技公司，是2022年增资控股的金融科技类个贷不良处置公司西藏峻丰数字技术有限公司（下称“[峻丰技术](#)”）。海德股份年报介绍，峻丰技术拥有个贷不良批量法诉的全流程系统和16项软件著作权，形成了资产估值、资料梳理、OCR识别、文书自动生成、批量诉讼/保全、资料归档等多个功能板块的全链条个贷处置系统，配套建立全国性处置网络，实现了业务全流程自动化、科技化、规范化管理。

“未来，科技参与不良资产处置，不仅是简单的系统管理，更可能涉及资产估值、与一些债务人沟通的应用场景。而且，与债务人沟通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电话催收，可能是人机交互，根据客户画像随时切换沟通话术，不存在暴力催收，管理非常方便。”余宙说。

余宙总结道，未来的个贷不良资产处置市场有三个方向：第一是“得科技者得天下”；第二是非持牌机构和持牌机构之间协同发展；第三是从债务重组变成资产重组，与债务人从对抗变成共同解决问题，重塑人的价值。□

刘冉对此文亦有贡献

版面编辑：刘春辉

最新财新周刊 | 财务再保险需求增长背后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第17期 出版日期 2023年05月01日

险企2022年资产负债两端同时承压，导致92家人身险公司中，有超过三分之一使用了“财务再保险”这一最隐秘的手段维持偿付能力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身险公司面临偿付能力充足率的压力，财务再保险这“技术手段”近来被更多使用。

文 财新周刊 吴雨俭

日前，中国精算师协会举办了一场常规培训会议，虽然培训的主题定位于投资，但在会后的问答环节中，多名精算师却将注意力聚焦在另一个不太常见的话题上——财务再保险。

“我们公司最近做了笔（财务再保险），因为一季度（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已经低于150%了。”一名精算师在交流时表示。

所谓的财务再保险，是一种非传统再保险业务，本质是直保公司从再保险公司借钱作为资本金，一般发生在保险公司出现偿付能力告急的情况下。

长期以来，财务再保险游走于中国人身险行业的“灰色地带”，是一家保险公司最隐秘且不愿被外人提及的话题之一。尤其是此前部分问题公司滥用财务再保险，也给这一业务带来了不少负面评价。但在近两年，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身险公司面临偿付能力充足率的压力，行业里提及“财务再”这个简称的频率也在不断上升。

有来自直保和再保险公司的人士向财新透露，从2021年开始，人身险公司利用财务再保险维持偿付能力的情况逐渐增多，2022年更是出现了较为明显的需求增加。从公开数据看，目前中国人身险行业平均综合偿付能力水平较为充足；但据前述直保和再保险公司人士估算，在92家人身险公司中，若算上问题公司，估计有三分之一至一半的机构使用了财务再保险。

财务再保险需求增加的背后，是保险公司在2022年资产负债两端同时承压。一方面，资本市场的情况影响了保险公司投资端的表现，使得净资产出现大幅下降；另一方面，负债端尤其是增额终身寿险这一产品消耗了大量的资本金。此外，加上保险公司本身盈利能力下降、股东增资不畅、发行资本补充债的时间流程过长，使得险企不得不依靠财务再保险这一“技术手段”将偿付能力维持在一定的水平。

值得一提的是，进入2023年，人身险公司的资产负债两端均出现了一定的改善迹象。日前，监管部门已通过窗口指导，要求人身险公司调低预定利率，旨在降低负债端成本，实现高质量发展。2023年一季度，寿险行业的规模开始恢复增长，保费增速明显反弹，主要公司的新业务价值预计可实现正增长；从[中国平安](#)（601318.SH/02318.HK）发布的2023年一季度报看，该公司的寿险业务多项指标已开始回暖。

“讳莫如深”的财务再保险

有来自再保险机构和寿险直保机构的人士估算，如果算上目前已暂停披露偿付能力报告的公司（这些公司一般被视为高风险机构），目前利用财务再保险补充资本的人身险公司，可能占到整个人身险行业的三分之一到一半，尤其以中小险企和民营险企为主。

“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很多中小公司一看偿付能力不太行了，就想着去做个财务再保险。记得去年12月下旬的那两个星期，所有负责保险审计的同事基本24小时连轴转，因为每家公司的财务再保险合同长得都不一样，需要

确认到底是否符合监管规则，还得一个字眼一个字眼地抠。”一名审计公司人士表示。

从账面看，目前被纳入统计的181家保险公司，整体偿付能力水平较为充足，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为196%；其中，人身保险公司的平均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为185.8%，比100%的监管标准多出近2倍。

但也有部分业内人士的判断较为悲观：“现在整个行业的问题比表面上要严重得多，包括财务再保险的滥用。有人开玩笑说，很多中小公司现在是给部分再保险公司打工，更不要说还有十几家高风险机构。”

早在2011年，由于股债双市低迷，严峻的投资环境让多家保险公司面临偿付能力快速下降的局面。在此之后，监管部门拓宽了保险公司的资本补充渠道，此前一直游走在“灰色地带”的财务再保险，也一度被业内讨论是否要“阳光化”，试图以规范发展的方式将其纳入正式的资本补充渠道。

2015年，原保监会曾公开发布《[《保险公司资本补充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列举了保险公司补充资本可采用的八项工具，其中第八类“非传统再保险”即为财务再保险。不过，该文件并未正式发布落地。目前在保险行业内，财务再保险依然是一个讳莫如深的话题。

从再保险的理论上看，财务再保险和一般的再保险并无不同；但从实操角度判断，如果一家险企做了一笔财务再保险业务，就意味着这笔交易的目的更多是基于财务管理的资本释放，而非传统意义上的风险转移。

在绝大多数时候，财务再保险的叫法和定义就明确了这仅是一笔“账面游戏”，相当于再保险公司向直保公司借出本金，帮助后者在短期内改善偿付能力指标。但能否真正达成所谓的风险转移，或者说监管、审计部门能否明确判断一笔再保交易存在风险转移，仍有许多模糊地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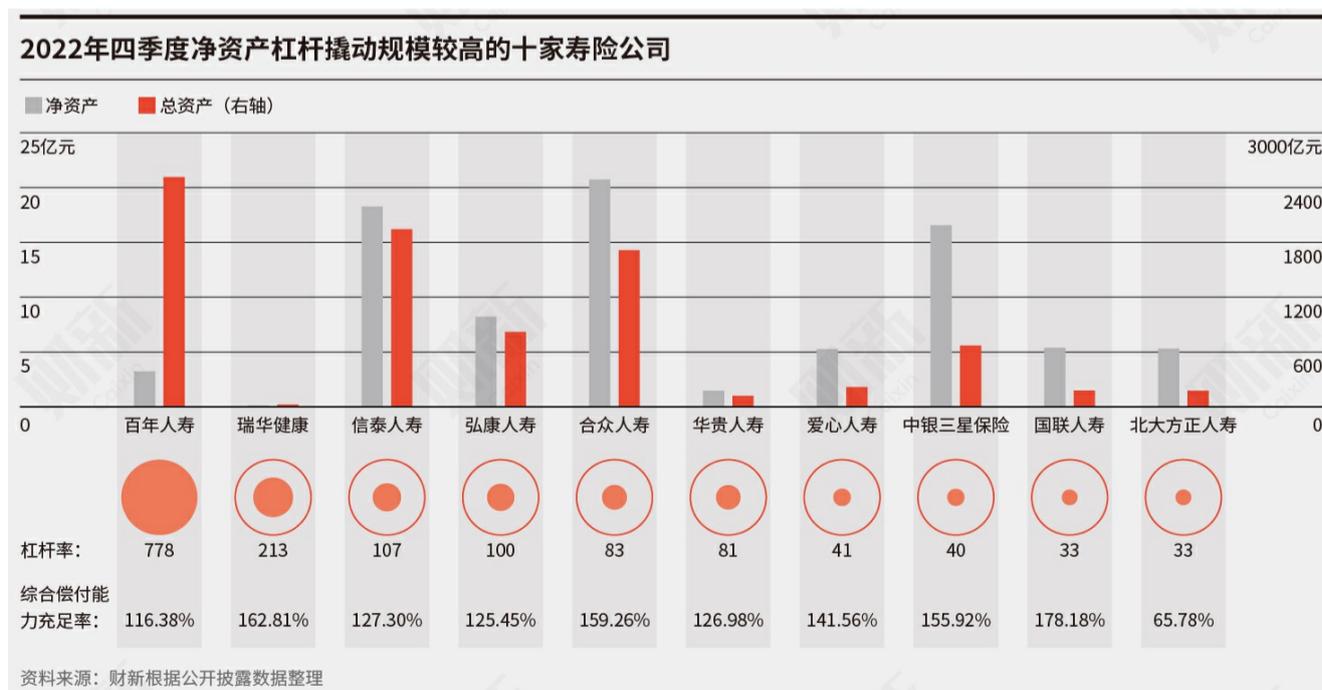
“财务再保险最开始被界定为没有实质性风险的再保险安排。说白了，就是直保公司找再保险公司帮忙、降低自留保费，但是这个业务不能让再保险公司有实质性的承保亏损。双方达成一种默契：我帮你解决偿付能力压力，但你不能让我有实际损失。”一名小型中资再保险公司高管解释道。

此前，滥用财务再保险的问题长期存在，不少保险公司曾利用财务再保险虚增偿付能力，以转嫁偿付能力不足的风险。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明天系”旗下的几家保险公司，以及近几年曝出问题的[君康人寿](#)、[信泰人寿](#)等，这些险企的共同特点是，曾在短期内迅速做大规模，若来不及增加资本金，那就先用财务再保险顶上。有再保险人士表示，这些公司中，有的甚至通过财务再保险的手段改善了高达90%的偿付能力，“都是做出来的”。

目前，在为直保公司提供财务再保险服务的再保险公司中，市场份额占比较大的有[中国再保险](#)（01508.HK，下称“中再”）和外资公司[汉诺威再保险](#)（下称“汉再”）。

“‘偿二代’实施前，财务再保险规模最大的应该是汉再，然后是中再。‘偿二代’实施后，由于需求降下来了，对汉再的冲击比较大。而中再是主动调整业务，因为要强调‘再保姓保’，所以整体导向是要把保障型业务做起来，降低财务再保险的占比；但这一变化预计对中再的业务盈利能力也会产生不小影响。”一名再保险行业资深人士向财新表示。

另有再保险公司人士指出，再保险公司开展的财务再保险分保费规模，并不能与其实质帮助直保公司解决了多少资本、缓解了多少偿付能力画等号。“汉再去年跟[渤海人寿](#)和[合众人寿](#)做了较多业务。虽然财务再保险的保费规模比较大，但实际解决的资本并不是很多。”



财务再保险的滥用情况早已引起监管部门的关注。为减少“账面游戏”，“偿二代”二期工程堵上了一期的漏洞，并提高相应监管标准，鼓励保险公司真实、合理地利用再保险风险转移的功能。比如，要求再保险合同在三年内终

止的，不得将因其增加的资本计入实际资本，还要对三年后终止的再保险合同按照风险和资产是否真实转移以及合同期限进行资本分级。

“偿二代”二期工程同时要求，只有通过重大风险测试的业务，才能被认为是有效的再保险合同业务；如果被认定为没有实质性的保费分出，将被视为一种财务性安排。“在官方场合下，‘财务再保险’这个词已不被提及了，因为监管并不鼓励。如果一定要说某笔业务是财务再保险，那么就是否定了这笔交易。”

不过，在目前的实践当中，财务再保险依然存在操作空间。

“财务再保险实在是太个性化了。如果传统的再保险是课内题的话，那财务再保险就是奥数题。坦白讲，现在的监管规则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暂时写成现在的样子，但很多监管想达到的目标，目前还找不到合适的方式去规制。明面上，现在大家可能不会存在违反监管规定的行为，但换个角度还能绕过去。”一名曾参与“偿二代”二期工程中关于财务再保险规则修订的精算人士坦言。

该精算人士同时透露，过去一年来，监管部门曾做过多次调研，专门收集了部分财务再保险做得比较多的保险公司的情况，也否决了一些特别不合理的财务再保险业务。

前述再保险行业资深人士强调，在国际再保险市场中，财务再保险是一类常用的财务工具，应该中性看待，不必谈财务再保险而色变。一方面，保险公司可以合理使用财务再保险；另一方面，要防范滥用财务再保险带来的风险，这其中最重要的是严格把握风险转移测试，不要因为过去的极端案例因噎废食，把一些正常的财务分保之路给堵死了。

“如何把握财务再保险的度，目前不是一个纯技术问题，更多还是需要监管部门从行业、公司本身的情况出发去判断。如果本来就是问题公司，存在很多其他问题，再大量做财务再保险就不行了；如果这家公司还能救、还能继续正常发展，那就利用财务再保险支持过渡一下。有部分机构反馈的是默认改善偿付能力不超过20个百分点，但不同地区的尺度也不一样。”前述精算人士表示。

“财务再”为何需求增长

有再保险公司人士分析认为，2022年市场上有财务再保险需求的公司数量增多，直接原因是寿险行业在资产负债两端承压。

他表示，从投资端看，2022年资本市场表现不好，使得很多保险公司的净资产下降幅度很大。因为许多财务投资收益率都有可调节的空间，所以账面上净利润的表现尚可，但真正到了评估偿付能力时看的是净资产，整个寿险行业的综合收益非常差，净资产大幅下降，进而导致行业资本下降得很厉害。

从负债端的产品供给看，近几年寿险行业销售的产品多以增额终身寿险为主，这类产品从保险公司的定价水平，到留下的利润空间和剩余边际都大不如前。同时，增额终身寿险的资本占用也偏高，所以整个行业的资本压力都比较大。

除了2022年的短期因素，财务再保险需求的增长也从侧面反映出其他补充资本渠道不畅。

目前，保险公司补充资本的方式主要有股东直接出资、发行次级债和资本补充债。2022年，在“偿二代”二期工程下，保险公司尤其是寿险公司的核心偿付能力普遍下降，补充资本的需求和迫切性随之增加，资本补充拓展至可发行“永续债”（即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

在股东出资方面，近年来受疫情和宏观经济等因素影响，寿险行业保费增长乏力、核心指标新业务价值下降、代理人规模大幅脱落；与此同时，寿险行业的盈利能力和保险牌照热度骤降，投资保险业并不是一笔划算的买卖。

“现在根本没有股东愿意拿钱出来，这是个大问题。”前述再保险行业资深人士表示。

数据显示，2022年，人身险公司净利润571.79亿元，同比下降57.28%。纳入统计的86家人身险公司中，38家公司实现盈利，占比44.19%，较上年同比减少21家；48家亏损公司中，有22家公司亏损超过5亿元，中小微人身险公司盈利状况面临较大压力；71家公司净利润同比减少（或亏损增加）。盈利排名前十的人身险公司净利润总和占86家人身险公司净利润总和的312.14%；亏损排名前十的人身险公司合计亏损1097.22亿元。

即便原股东愿意继续增资或保险公司最终寻求到新股东注资，但在监管部门严格把控、审慎监管的当下，被拒之门外的保险公司也不在少数。目前看，获批增资的险企股东多为国资，鲜见民营。

另外，发行资本补充债也需要经历漫长的周期，且同样面临审慎监管的情况。从整体规模看，近些年，保险公司的发债规模也出现逐年下降的趋势。据财新不完全统计，2020年保险公司资本补充债券发行规模达780亿元，创历史新高；2021年的发行规模为539亿元；2022年仅有10家险企合计发行资本补充债券221亿元，不足上年的一半。

自2022年7月**利安人寿**发行10亿元资本补充债券后，便经历了半年的“空窗期”，直至2023年3月，才有包括太平再保险、**太保财险**、利安人寿、**农银人寿**和**中再财险**等密集获批发行资本补充债，且多为大型险企。其中，太保财险发行的两期共100亿元资本补充债券，是2022年以来监管机构批复同意保险公司发行的单笔最大规模资本补充债

券。

在这样的背景下，保险公司面临的实际困难可想而知。正基于此，不少险企不得不选择使用财务再保险这样的“技术手段”来缓解偿付能力压力。

虽然保险公司对财务再保险的需求不断增加，但从整体看，这一数据或呈现下降态势。

有再保险行业人士向财新透露，监管部门此前已经通过窗口指导要求压降财务再保险规模。比如，中再2022年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境内财务再保险的分保费收入同比下降32.5%至167亿元，在人身再保险分保费收入的占比也从上年的35.8%降至25.2%。

如何判断一家保险公司是否做了财务再保险？

前述再保险公司人士向财新介绍，一个比较简单粗糙的计算方式，是通过总规模除以净资产，观察净资产撬动杠杆的大小来推测。在“偿一代”时，这个数字如果高于25，相当于净资产的杠杆撬动很大，几乎就可以断定这家公司使用了财务再保险。而在“偿二代”的风险导向下，这一数字的判定标准还会更低。

以君康人寿为例，2020年一季度，该公司账面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为109%，其认可资产总额（约等于总资产或更低）为1861亿元，净资产76.79亿元，相当于杠杆率为24。但据财新此前报道，若剔除财务再保险后，该公司同期的实际偿付能力充足率仅剩17.34%，远低于100%的监管要求。

目前，大部分未上市保险公司尚未披露2022年数据。若按前述再保险人士介绍的方式粗算，净资产撬动杠杆较大、极有可能使用了大量财务再保险的寿险公司，前十名分别为：[百年人寿](#)（2022年四季度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显示为116.38%，下同）、[瑞华健康](#)（162.81%）、[信泰人寿](#)（127.30%）、[弘康人寿](#)（125.45%）、[合众人寿](#)（159.26%）、[华贵人寿](#)（126.98%）、[爱心人寿](#)（141.56%）、[中银三星保险](#)（155.92%）、[国联人寿](#)（178.18%）、[北大方正人寿](#)（65.78%）。

按照监管要求，保险公司的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必须满足的最低“红线”为100%，这意味着上述公司中除了北大方正人寿，另外九家保险公司的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均符合监管要求。但从实际情况看，这些保险公司或多或少都使用了财务再保险来维持偿付能力。其中，华贵人寿和爱心人寿在今年年初获批股东增资，从而缓解了此前的偿付压力；而百年人寿、信泰人寿、合众人寿和弘康人寿等，目前分别在投资端、股东、公司治理等方面存在不少问题，前三家的总资产规模分别都超过了千亿元。

增资困局何解？

无论是财务再保险还是发行资本补充债，对保险公司来说均是“治标”。只有通过提升盈利能力、降本增效，提升保险公司本身的实力，进而提升偿付能力才是“治本”。

也有机构人士将目前保险公司面临巨大的偿付能力压力，归咎于“偿二代”二期工程的规定过于严苛。

“‘偿二代’二期工程的出台承载了太多考虑，对于保险业特别是寿险业造成了大面积的打击。相当于改变了尺子的标准，一个身高一米六的人，在新的标准下变成了一米五。目前，行业中有相当数量的机构在偿付能力上面临压力。是不是到了重新对防风险和求发展做再平衡的时候？”一名曾在监管部门工作、后“下海”的保险机构高管提出。

从“偿二代”二期工程出台前后至今，业内关于其中的部分规定一直存在不同声音，认为其在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的同时，忽略了行业的发展问题。

同时，也有业内人士并不认可这一看法。“把标准放宽了，那不就意味着结果可能变得更坏？”一名大型寿险公司的精算师反问道。他认为，“偿二代”二期工程加大险企的压力，主要体现在公司内部战略管理、风险管理、内部治理结构是否完善，这些问题不是光靠资本金就能解决的。“实事求是地讲，金融领域现在的风险状况并不乐观，保险只是其中一小块。从未来趋势看，尤其是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成立后，严监管趋势甚至可能会进一步加大。”

前述再保险公司人士则表示，“偿二代”二期工程的最大变化导致核心资本大幅降低，对大型寿险公司的影响更大。当然，中小保险公司和民营机构的偿付能力原就较低，因此目前感受到的压力更大。

“现在整个行业的导向都是往长期产品走，特别是市场上的增额终身寿险，本身风险就很大。像之前破产的欧洲、日本的保险公司，都是因为长期的保证型高收益产品导致的。现在要求保险公司提供对应的充足资本金，我认为没有问题。如果放松监管，现在或许没事，但十几、二十年后呢？还是要考虑长期的发展。当然，如果通过放松监管把现有风险消化掉，从发展的角度看也是一个思路，但这就取决于对未来宏观环境的判断了。”他称。

另一名中小保险公司高管指出，当前寿险行业面临困境的核心原因在于行业的商业模式不可持续，具体表现为销售人员综合素质难以匹配高质量发展要求、难以满足消费者需求，以及有组织的销售套利使保险公司沦为银行和互联网平台的“通道”。

“偿二代”二期工程只能说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合成谬误。所谓增资难、发债难，也是其中的一环而已，这本应加速中小公司自身的淘汰和出清，利于行业长期健康发展，但由于寿险公司高度外部性等因素，就导致出现了一批“僵尸”寿险公司，严重消耗了监管和市场资源。”他表示。

值得一提的是，财新从业内人士处获悉，[中国保险保障基金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保险保障基金公司”）曾在3月末的一场会议上提出，针对目前行业资本补充困难的情况，呼吁监管部门对股东增资的资格审批等方面“放宽一些”。

保险保障基金素有保险行业“最后一道防线”之称。目前，多家保险公司承担的偿付能力压力，自然也会传导到保险保障基金。尤其当保险公司从“准问题险企”变身为“问题险企”时，这种压力对保险保障基金来说会更加显著，因为过去产生的窟窿已达到数千亿元，如果继续新增，未来又该怎么办？

根据2022年第四季度保险公司风险综合评级结果，纳入会议审议的181家保险公司中，有16家保险公司风险综合评级被评为C类，11家被评为D类。除此之外，还有包括[安邦集团](#)、“明天系”在内的机构仍在风险处置过程中。

4月20日，一家名为“[九州启航（北京）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下称“九州启航”）的企业注册成立，注册资本高达339.01亿元；该基金的成立或与[华夏人寿](#)的风险处置有关。

华夏人寿是“明天系”旗下四家保险公司之一，与[天安人寿](#)、[天安财险](#)同为“明天系”后期的主要融资平台，三家公司的“明天系”占款规模达千亿元。而华夏人寿是业务规模和股东占款最大的一家，风险处置的困难程度也可见一斑。

风险综合评级不达标的保险机构概览				
寿险公司	总资产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上一季度风险评级
三峡人寿	37.44亿元	106.87%	84.45%	C
渤海人寿	498.07	110.82%	110.54%	C
百年人寿	2512.68	116.38%	77.16%	C
弘康人寿	821.41	125.45%	85.35%	-
信泰人寿	1944.56	127.30%	112.54%	-
合众人寿	1712.73	159.26%	79.63%	C
中韩人寿	69.03	345.50%	318.09%	C
华汇人寿	9.47	2545.90%	2538.08%	C
财险公司	总资产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上一季度风险评级
安心财产	10.80亿元	-1208.94%	-1208.94%	D
长安责任	70.77	30.49%	15.24%	D
都邦保险	46.41	115.40%	115.40%	D
渤海财险	56.44	121.34%	103.76%	C
珠峰财险	9.88	123.51%	123.51%	C
前海联合	24.52	123.65%	123.65%	C
华安财险	224.00	154.73%	118.25%	C
富德财产	58.82	366.12%	359.86%	C
处于偿付能力豁免期/仍在风险处置过程中的险企				
大家保险、华夏人寿、天安人寿、天安财险、易安财险、和谐健康				
已暂停披露偿付能力报告的准问题险企				
恒大人寿、君康人寿、前海人寿、上海人寿、中融人寿、珠江人寿、富德生命、国华人寿、昆仑健康				
资料来源：财新根据公开数据整理				

银保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在2023年2月透露，已批准保险保障基金公司和其他投资人共同筹建瑞众人寿保险公司，这标志着华夏人寿风险处置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据财新了解，所谓的其他投资人，包括由[中国人寿](#)领投，[中国太平](#)、[中国太保](#)以及一系列“银行系”险企在内的多家保险公司。

“保险保障基金有六七百亿元陷在安邦里还没出来，现在华夏人寿大概有2000亿元的窟窿，再加上多家不公布偿付能力报告的公司，总资产4万多亿元，需要注资的规模估计要上千亿元。光靠现在2000亿元的保险保障基金，以及摊派到行业几家国企头上的300多亿元基金，远远不够。”一名业内资深精算人士对此评价称。

不过，事情总在发展变化中。近日，寿险行业龙头中国平安发布的2023年一季报显示，在经历了多个季度的新业务价值连续下降后，中国平安终于在这一季度迎来了转折，其核心指标新业务价值同比增长8.8%，寿险与健康险业务实现的归母净利润也同比增长104.5%。在寿险业低迷多时的背景下，这一成绩令行业为之一振，甚至被视为寿险业止跌回稳的信号。

同时，在监管部门对寿险行业提出“高质量发展”要求的当下，保险公司的负债端成本也将有所下降。

财新日前从业内人士处获悉，银保监会寿险部正陆续召集多家公司总精算师开会，要求机构应当主动调降新产品的定价利率，尤其是传统寿险产品，明确若定价利率在3.5%的将不予报备。至于应当下降至何种水平，监管部门暂未“一刀切”。整体看，传统险不超过3.5%、分红险不超过2.5%、万能险不超过2%，但也将根据保险公司的实际情况分类监管，比如投资水平较高的或可放宽至3.25%。

专栏 | 科技投入能解决技术自主吗？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第17期 出版日期 2023年05月01日

中国扩大科研投入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现有体制是否为配置资源的最有效途径；其次，还须尽量与尽可能多的国家保持合作



海南三亚，科研人员正在实验室里进行研发工作。2019年以来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渐趋紧张，中国面临西方主要技术封锁的概率上升，这也令中央政府更重视科技发展。图：视觉中国

文 陈昌华

Aletheia Capital中国策略分析师

在2023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公布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中，除了金融部门，科技部门也是改革的重点。

过去十年，中央政府对科技发展的重视大幅上升有多种原因：首先，随着人口增长放慢，适龄劳动人口呈下降迹象，短期内人口对经济增长更像一个负面因素。其次，支撑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固定资产投资，因基建逐步完善、房地产需求趋向饱和、工业化接近尾声，增长已不如以往。第三，随着改革红利逐渐消耗，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在过去十年明显放慢，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或许更依赖科技进步。可能最重要的是，2019年以来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渐趋紧张，中国面临西方主要技术封锁的概率上升，这也令中央政府更重视科技发展。

无疑，中国在过去20年间对科技的投入极大，2000年到2022年科研支出年均增长近17.5%，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亦从2000年的0.9%升至2022年的2.6%，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但这样的投入足够让中国实现技术自主吗？

虽然中国科研支出近年大幅上升，但超过80%是把现存的学术成果进行商业化改造，而在基础和应用的投入并不太多。跟固定资产投资不同，研究经费投入后往往不知何时才有结果，特别是中上游的基础和应用研究，因此判断一个国家的基础和应用研究力量，需要比较过去十年的累计投入。从2011年至2019年，中国大约投入1000亿美元做基础研究；同期，美国投入7700亿美元；日本、英国、法国、韩国、中国台湾和以色列合计投入约5000亿美元。在应用研究方面，同期中国投入2200亿美元，美国投入9300亿美元，前述六个国家和地区合计投入8600亿美元。中国在基础和应用的投入与发达经济体有较大差距。

企业一般不会在中上游的基础和应用研究领域大量投资，因此全球多数国家的研究主要靠政府拨款。中国与西方国家不太一样：中国政府拨款大多投向政府成立的研究院，2012年至2020年约占政府科研经费拨款的64%；同期美国、日本、德国和英国的比例分别为44%、51%、41%和22%。西方国家政府将更多的研究经费拨给大学和企业。在很多国家，政府给大学和企业的科研资金通常都要通过公开评审机制分配，以保证钱给了适合的研究人员和机构。长远看，中国这种高度依赖政府研究院的机制是否影响中国科研资金的利用效率，值得深思。

中国现在的科研水平如何？这个问题不易回答。学术界往往用“H指数”衡量一位科学家、一所大学甚至一个国家的科研实力。“H指数”兼顾文章出版总量和质量。参考SCImago Journal & Country Rank (SJR) 网站数据，分析16个跟自然科学相关的专业“H指数”，并把它们分为五组：生命科学，数学与计算机，物理与工程，能源、地球与环境科学，化学与材料。SJR网站计算的“H指数”是基于1996年至2021年25年间的的历史数据。由于科研从理论出现到商业应用需时很长，这个长时间的“H指数”不失为判断整体科研实力累积的一个好指标。

简单概括，过去25年，美国在上述16个专业“H指数”中都名列前茅。中国在某些领域也不错，例如在化学与材料组中的三个专业（化学、化学工程、材料科学）“H指数”仅在美国之后。可以想象，如果只参考过去几年的数据，中国有可能在这个领域赶超美国。同样，中国在能源、工程和电脑科学几个方面跟得也比较近，但在生命科学领域则落后较多。

总体而言，这几年中国对科学研发的投入增加很快，并在某些领域接近国际水平，但总体实力跟西方发达国家仍有一定差距。未来一段时间，应扩大科研投入，特别是中上游基础研究，但要注意两点：首先，现有体制是否为配置资源的最有效途径；其次，在加强自身科研投入的背景下还须尽量与尽可能多的国家保持合作。西方国家对可能中国可能的技术封锁本身是个政治问题，如果单纯希望从科研投入去解决这个问题，成功的机会不是很高。□

版面编辑：刘春辉

最新财新周刊 | 以病毒攻癌症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第17期 出版日期 2023年05月01日

从已有的临床试验数据与在研药品进度看，中国有望在溶瘤病毒赛道与发达国家并跑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的首款溶瘤病毒产品Imlygic。迄今未有第二款溶瘤病毒产品能再获FDA批准上市。图：安进公司官网

文 财新周刊 崔笑天

新冠大流行期间，发表在《英国血液学杂志》上的一个病例让人印象深刻——一名61岁的淋巴瘤晚期患者，已停止免疫治疗三年，在他感染新冠病毒四个月后，可触及的淋巴瘤减小，PET/CT显示，他全身的大部分淋巴瘤消失了。

这个病例仍待更多探索，但它的基础原理不难推测，实际上，很多病毒都可以起到溶瘤作用，溶瘤病毒也因此诞生。这个新兴的免疫疗法意图通过注射活病毒治疗肿瘤，将疱疹病毒、腺病毒、痘苗病毒等减毒并进行基因改造，使病毒在肿瘤细胞内复制，让肿瘤细胞裂解。但不影响正常细胞。

肿瘤细胞裂解后，可以释放肿瘤特异性抗原，激活机体自身的免疫系统，杀灭肿瘤；另一方面，肿瘤细胞被病毒感染，释放多种抗病毒因子和炎性因子，也会促进该肿瘤细胞或周边肿瘤细胞死亡。

在溶瘤病毒这一赛道，中外创新药企都在发力。经过多年沉淀，一些玩家有望率先撞线，其中也不乏中国生物药企的身影。

溶瘤病毒的热度自2015年开始显现，当时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了首款溶瘤病毒产品上市，即安进的T-Vec（商品名：Imlygic），其将1型疱疹病毒（HSV-1）基因改造，用于手术后复发的黑色素瘤的不可切除病灶的局部治疗。随后的三四年间，百时美施贵宝、辉瑞、艾伯维、默沙东、勃林格殷格翰等大厂争相布局该赛道，收购多条临床前或临床阶段的溶瘤病毒管线。

不过，迄今未有第二款溶瘤病毒产品能再获FDA批准上市。即便是Imlygic也未成为“重磅炸弹”单品，因为其适应症局限，无颠覆性疗效，且只能瘤内注射，后续销售数据并不惊艳。其年均费用约5.4万美元，在2022年的安进财报中，Imlygic和另外三款产品及两个子公司的销售额并为“其他”一栏，年销售额加在一起仅为4.31亿美元，占总营收不足2%。

行业普遍认为，溶瘤病毒最大的市场空间在于联合用药，通过与PD-1抑制剂等多类药物的联用，将此前免疫治疗效果不佳的冷肿瘤变成热肿瘤，热肿瘤对免疫治疗有较好的应答率和治疗效果，从而给予患者更长的生存期。

[鼎晖投资](#)创新与成长高级合伙人、博士柳丹告诉财新，PD-1抑制剂在临床上只针对20%的热肿瘤患者有效，余下八成的冷肿瘤患者无效。因此其判断，溶瘤病毒是未来肿瘤免疫重要的治疗方式之一。

但随着Imlygic与帕博利珠单抗（商品名：Keytruda，下称K药）的联合疗法三期临床试验宣告失败，溶瘤病毒“退烧”，有大药厂中止了对相关管线的研发。

中国的溶瘤病毒研发起步较早，2005年[三维生物](#)的H101（商品名：安科瑞）国内获批用于鼻咽癌治疗，但临床应用较为有限。2015年药品审评审批改革后，溶瘤病毒的在研管线总量不大，多处于早期，但不断增加，[恒瑞医药](#)、[天士力](#)、[乐普医疗](#)、[阿诺医药](#)等引进数款溶瘤病毒品种，[滨会生物](#)、[亦诺微医药](#)、[复诺健](#)等生物药企则开始研发新一代的产品。

对创新药企来说，相比PD-1抑制剂，溶瘤病毒并非“低垂的果实”。业内人士指出，不同于有靶点的抗体，溶瘤病毒是一个完全新的病毒，每家公司的病毒都不同，做“me-too”（也称派生药）几乎等同抄袭，即便是模仿着去做，也需要较长的时间周期。

近两年，国内申报溶瘤病毒IND（临床研究申请）的数量才增长至每年10个以上。在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主办的溶瘤病毒创新药研究高峰论坛上，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CDE）生物制品临床部审评员黄云虹提供了一组数据：“2015年至2020年左右，每年溶瘤病毒的IND申报数都不多，仅为1个-5个左右。从2020至2022年申报数基本上翻番。”

“第一梯队”中，有参与过Imlygic研发的海归科学家。从已有的临床试验数据与在研药品进度看，中国有望在此赛道与发达国家并跑。

亦诺微医药的创始人、CEO兼董事长周国瑛针对1型疱疹病毒进行了十几年的科学研究，她曾身处的芝加哥大学研究团队发明了Imlygic的病毒骨架的专利。她告诉财新，不同于抗体、小分子等新药研发赛道，溶瘤病毒的研发人才少、门槛高。“他们必须在专门的溶瘤病毒上积累很多年的科学探索，每个病毒学家只针对一种特定的病毒聚焦研究，而病毒学家不做抗病毒研究转而做溶瘤病毒的更是少之又少。”

柳丹亦表示，这个领域的壁垒非常之高。“病毒是一个高深的学科，需要有二三十年的功力，才能将一个病毒研究得较为透彻。”他领投了复诺健的6200万美元C轮融资，复诺健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科学家贾为国曾任加拿大UBC大学脑所资深研究员，并主持病毒载体和溶瘤病毒研究。

业内人士承认，溶瘤病毒企业的融资，也受到了生物医药投融资的大环境影响，在2022年变得不易。行业都在期待着中国能有一款溶瘤病毒产品率先“跑出来”，为大家注入一剂强心针。华药康明创始人袁明在前述论坛上坦言，抗体、细胞、mRNA等赛道已经有对标、有标杆，就有想象空间，投资机构可以一窝蜂地进来。因此，溶瘤病毒领域的发展，需要出现标志性的事件，让大家看到赛道的潜力，从而让市场再加温。

部分头部企业透露，由于生产效率较高，溶瘤病毒的定价将低于其他免疫治疗药物，单次治疗成本有望控制在千元内，年治疗费用控制在1万-3万元区间。这意味着，溶瘤病毒产品上市后，受到医保控费政策的影响较小。

曾是Imlygic原研团队成员、现任滨会生物董事长的刘滨磊表示，溶瘤病毒的临床剂量、纯化工艺的稳定性、对杂质的控制等因素最终决定了其成本。“我们现在临床使用的有效、安全剂量，每针剂的成本可能是在几百块钱，和目前其他肿瘤免疫治疗药物相比，是一个白菜价。”

由冷转热

溶瘤病毒如何发挥疗效？

最早受到关注的是，病毒可以感染肿瘤细胞并大量复制，导致该肿瘤细胞裂解。但随着免疫治疗的发展，可以诱导机体的抗肿瘤免疫反应被视为溶瘤病毒更重要的作用机制，其也因此焕发了新的生命。

“业内现在越来越多地认为它和宿主的免疫系统更加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共同发挥作用。”在溶瘤病毒创新药研究高峰论坛上，星尘生物的联合创始人、首席科学家陆金华说。陆金华曾在美国FDA的生物制品审评和研究中心（CBER）担任审评员，并参与过溶瘤病毒产品的研发。

多位业内人士坦言，研发溶瘤病毒的难点有二，不感染正常细胞，同时要让病毒在肿瘤细胞内大量复制。

对于第一个难点，很多病毒都可以起到溶瘤作用，但是，如果它在正常细胞和肿瘤细胞之间没有太大差异的话，就不适合做溶瘤病毒。目前已进入临床试验的溶瘤病毒其亲本株主要有腺病毒、疱疹病毒、痘病毒。

研究者往往通过基因修饰增强溶瘤病毒的安全性。以Imlygic为例，它敲除了1型单纯疱疹病毒的 γ 34.5基因，这个基因可以抑制正常细胞对病毒的清除机制，敲除之后，病毒不能在正常细胞中复制；而肿瘤细胞中这一机制缺失，因此不影响病毒在肿瘤细胞中的复制。

与此同时，研究者还可以通过基因修饰为病毒插上多种“武器”，锦上添花。Imlygic即在敲除 γ 34.5基因后，插入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M-CSF），可将抗原提呈细胞募集到肿瘤微环境中，并促进T细胞对肿瘤相关抗原的反应。

基于基因修饰的不同，刘滨磊认为，溶瘤病毒可划分为三类，第一类主要是未经基因修饰的溶瘤病毒，第二类是将其敲掉一些有毒基因，第三类更注重在此前的研究基础之上，将各种治疗性基因插入到病毒载体当中，改善它对肿瘤的靶向性，提高它的疗效，进一步去诱导免疫反应。“第三类有百家争鸣的趋势，大家各自对溶瘤病毒、治疗性基因的理解不一样。现在国际上在这个方面的进展是非常快的。”

值得注意的是，基因工程修饰后的溶瘤病毒，其复制能力大大减弱。因美未来创始人、董事长黄映辉表示，人体存在抗病毒免疫，且体内环境高压缺氧。病毒存活较难。“最核心的问题是让病毒先不要被干掉。”

所以提高溶瘤病毒的药效，须在病毒骨架上有所突破。周国瑛说，绝大部分做疱疹病毒的溶瘤病毒产品，用的

都是Imlygic的病毒骨架的原理，在敲除 γ 34.5基因的位点上插入GM-CSF，或者PD-1等免疫相关的基因，但关键在于，这样的插入病毒本身的复制能力没有改变，因为病毒骨架没有改变。亦诺微则把病毒骨架改造到跟Imlygic完全不同，让它在肿瘤内的复制能力更强。

研究者也可以做进一步的创新。“做得好的溶瘤病毒专家一定要在病毒领域深造多年，知道如何去改病毒，不仅不影响病毒的复制，同时让病毒直接杀死肿瘤的效果更好，而且能更高效地刺激免疫反应。”柳丹说。

他所领投的复诺健在探索新一代溶瘤病毒，即不去掉病毒的基因，而是通过调节病毒基因的表达，使其仅仅在肿瘤细胞中表达，增加了安全性的同时，也提高了溶瘤活性，代表药物是VG201，已获中美临床试验批件。

柳丹表示，目前在三期临床的溶瘤病毒大部分是10年前的第一代，其溶瘤活性与刺激特异性抗肿瘤免疫的能力都远逊于现在的新一代溶瘤病毒。“后者因为还在临床的较早期阶段，我们预料在不久的将来，会看见一批具有优秀临床疗效的溶瘤病毒从这一代中脱颖而出。我们坚定看好新一代溶瘤病毒产品。全球开发新一代溶瘤病毒产品的团队大约只有5个，5家企业产品阶段相似，中国在溶瘤病毒领域完全有可能在全球并跑甚至领跑。”

现有四款溶瘤病毒上市，但少见全球范围内被认可的产品。除了Imlygic，日本2021年批准了第一三共的G47?（商品名：Delytact）用于恶性脑胶质瘤治疗；拉脱维亚2004年批准了Latima的Rigvir用于黑色素瘤治疗；中国于2005年批准了三维生物的H101（商品名：安科瑞）用于鼻咽癌的治疗。后两款临床应用较为有限。

在研的溶瘤病毒数量在近年升温。黄云虹表示，从2015年开始，新一批的溶瘤病毒已有IND申报。2015至2020年，每年的申报数量在1个-5个左右，从2020至2022年申报数量则翻番了。

据ClinicalTrials.gov，全球现有160项溶瘤病毒的临床研究，多集中于早期，其中118项处于一期临床阶段，70项处于二期或三期临床阶段。分地区来看，美国共有79项，中国共有38项。

此外，联合疗法数目不少，共有76项研究，占比达到47.5%。业内普遍认为，溶瘤病毒的前景在于联合用药。一方面，这与溶瘤病毒的局限性有关，其主要的给药方式是瘤内注射，对晚期患者来说，大部分出现各种转移的病灶，很多都是无法直接注射的，虽然溶瘤病毒可以起到“旁观者效应”，即未给药的远隔病灶也同步缩小，但疗效没有直接注射显著。“所以理论上讲，溶瘤病毒的联合用药具有更实际的临床应用价值。”周国瑛说。

更重要的是，溶瘤病毒有望通过重塑肿瘤微环境，将冷肿瘤变为热肿瘤。所谓冷肿瘤，即对免疫治疗应答不佳，热肿瘤则对免疫治疗有较好的应答率和治疗效果。“比如PD-1抑制剂治疗失败的病人，溶瘤病毒注射后，再打PD-1抑制剂又有了应答。”周国瑛说，“这个东西是溶瘤病毒特有的。”

目前，溶瘤病毒展现出较好疗效的瘤种为黑色素瘤、脑胶质瘤等实体瘤，新的给药方式如静脉注射也在探索之中。国内在溶瘤病毒赛道研发进展较快的企业有三家，滨会生物、亦诺微医药与复诺健，均在中美获得临床批件。目前，滨会生物的BS001进入确证性三期临床，亦诺微医药的T3011、复诺健的VG161进入二期临床。

更受投资人关注的，则是溶瘤病毒很难形成像PD-1抑制剂那样的“内卷”，产生大量“me-too”的跟随式创新。这意味着，先跑出来的公司将建立起较高的技术门槛。

“溶瘤病毒在CMC（Chemical Manufacturing and Control）上，跟PD-1、CAR-T这些免疫治疗产品不一样，一个工艺不能替代所有的溶瘤病毒，所以当有一个溶瘤病毒冲出来以后，不见得马上就有一大批溶瘤病毒会冲出来，都是要根据你选择的溶瘤病毒种类、插入的外源基因，还有你选择的适应证等等（来看）。”刘滨磊说。

谁将获益

溶瘤病毒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作为首款“撞线”的产品，Imlygic与K药联用的三期临床失败，一度对从业者打击很大。

溶瘤病毒最大的市场空间在于联合用药。Imlygic与K药联用的一期临床数据很优异，呈现了“1+1>2”的效果。21名晚期黑色素瘤患者，在中位随访18个月时，总缓解率（ORR）为61.9%，完全缓解率（CR）为33.3%；中位随访时间为36.8个月时，ORR提高到67%，CR达到43%。这比单独使用K药或Imlygic治疗的效果更好。

但随后的三期临床结果泼了一盆冷水。研究结果表明，相比K药加安慰剂组，联用组虽然将中位无进展生存期（PFS）提高了近6个月（14.3vs8.5个月），但差异未达到统计学意义；而K药加安慰剂组的中位总生存期（OS）为49.2个月，联用组则未达到中位OS。这意味着，Imlygic与K药联用，对晚期黑色素瘤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或总生存期没有明显改善。

该三期临床设置了PFS和OS的双重主要终点，共入组692名患者，1：1随机分配至K药加安慰剂组、K药加Imlygic的联用组。

“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沮丧的情况。”该三期临床的主要研究者、美国犹他大学医学院的Robert H.I. Andtbacka教授在溶瘤病毒创新药研究高峰论坛上说。

不过，Robert H.I. Andtbacka教授认为，不能简单将该三期临床的失败解读为溶瘤病毒加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这种

方法不灵。因为其中叠加了多种原因，比如可能是由于相关的免疫反应并没有被激发起来，或者患者的选择、肿瘤的选择并不合适。

柳丹也推测，该临床研究没有达到预定终点的原因可能是，一期先给病毒后给K药，而二期改成同时给药，结果抗病毒免疫被大大激活，削弱了抗肿瘤免疫作用。“不能因为试验设计问题导致未达预期，就说联用不行。”

因此，溶瘤病毒的临床试验设计需要精细、谨慎。中国的研究者仍在不断探索。当前走得较快的适应证包括黑色素瘤、脑胶质瘤。这两个适应证均有较成熟的产品获批，如Imlygic与日本的Delytact。

在溶瘤病毒创新药研究高峰论坛上，受到关注的是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副院长、肾癌黑色素瘤内科主任郭军团队的研究，其在一项BS001单药或联合普特利单抗治疗晚期黑色素瘤患者的开放一期研究中发现，BS001单药组的受试者总体生存期延长，临床获益明显。

研究团队发现，在PD-1抑制剂治疗失败的患者里，用BS001单药效果更显著。为进一步证实，研究团队又扩展了22例单药受试者，数据显示，没接受过PD-1治疗的9例受试者，ORR只有22%，疾病控制率（DCR）为44.4%；接受过PD-1治疗的13例受试者中，ORR达到46%，DCR达到61.5%，尤其在接受PD-1治疗失败且疾病分期为III-IVM1a的亚组人群中，显现了较高疗效，ORR可达62.5%。

“我们惊奇地发现，没用过PD-1的患者，和用过PD-1的相比，后者的治疗效果好很多。”郭军说。

基于此项研究，BS001开启了确证性三期临床试验。试验设计为单药，入组免疫治疗、靶向治疗、化疗等标准治疗均失败的末线患者，以研究者选择的挽救性化疗或最佳支持治疗（BSC）为对照，研究的主要终点为OS。在免疫治疗尤其是PD-1抑制剂已作为常规治疗手段的情况下，将溶瘤病毒放在后线，可能会较快地推动其获批上市。

研究者坦言，关于该三期临床的设计，与CDE进行了非常多的沟通。此前曾讨论BS001是否可以作为突破性治疗药物，采用单臂研究的数据申请上市。这意味着无论是临床试验的成本还是速度都将大大减少。但CDE非常谨慎，认为前期的ORR数据不足以支撑其作为一个疗效特别突出的药物，以单臂申请上市，建议还是选择随机对照试验。

另一项受到关注的研究则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肿瘤综合治疗中心主任李文斌，其探索了BS001在治疗脑胶质瘤方面的潜力。

脑胶质瘤的年发病率约在5-8/10万。李文斌研究的四期胶质母细胞瘤，中位生存期仅为14.6个月，且20年来始终缺少有效的治疗药物。

2021年底，日本批准第一三共的Delytact上市，用于治疗18岁以上残留或复发恶性脑胶质瘤患者。其关键性临床试验显示，19例受试者的一年生存率为84.2%，中位OS为20.3个月，1例受试者部分缓解（PR），18例受试者疾病稳定（SD）。疗效并非特别突出。

相比之下，李文斌介绍，BS001的一期临床数据纳入9例受试者，有效性方面，可评估的受试者共5例，其中1例PR，2例SD，ORR为20%，DCR为60%。安全性也较好，9例受试者中，6例发生27次不良反应，多为一或二级，即头痛、发热和流感样症状，2例发生2次与研究药物可能相关的严重不良事件，分别为脑水肿和脑疝。

其中一例受试者为23岁男性，疗效评估为PR，入组时病灶最大横截面积综合1191.36立方毫米，经三次给药，残留病灶最大横截面积总和缩小至387.44立方毫米，较基线缩小67.5%。“这是目前我们见到的非常让人兴奋的一个数据。不单是肿瘤消掉，他的症状也消掉了。”李文斌说。

李文斌表示，对比Delytact和BS001，“他们给药是10的9次方，我们给的是6次方或者7次方，量小很多，成本降低，副反应理论上也会低。”更重要的是，研究团队还发现了与治疗敏感相关的肿瘤标志物。这意味着，未来通过基因检测方式，可以进一步筛选出对该药物敏感的人群，提高有效率。

目前，除了黑色素瘤、脑胶质瘤，更多的适应证如乳腺癌、头颈癌、膀胱癌等也在探索之中。“从临床结果来看，中国（在溶瘤病毒上）真的有可能跑到前面去。”陆金华说。

监管寻路

作为细胞与基因治疗的一种，有关部门对溶瘤病毒的审评较为严格。自药品审评审批改革后，中国未有溶瘤病毒获批。

在FDA，溶瘤病毒归类为细胞与基因治疗，适用该领域的指导原则，而CDE在此基础上，发布了两个专项指导原则，即2021年2月的《溶瘤病毒类药物临床试验设计指导原则（试行）》，与2023年2月的《溶瘤病毒产品药学研究与评价技术指导原则（试行）》。

黄云虹坦言，关于溶瘤病毒的技术指导原则，CDE在2017年时，已有构想。在撰写过程中，也有企业、医生多方参与，反复讨论溶瘤病毒的定义和它的作用机制。到目前为止，出台相关技术指导原则的国家也很少，“中国走

得比较靠前，也反映了中国在研发方面走得比较快”。

“我们作为审评人员，平常的工作是非常细的，要挖到很深的地方。但是这种评价也要有一个尺度和逻辑，对于差异非常大的品种，要以一个尺度来衡量它。溶瘤病毒的指导原则就反映了这样的情况。”黄云虹说。

多位中美双报的业内人士认为，在审评过程中，CDE与FDA均非常关注产品的安全性。

“在上临床之前，安全性比你的药效更重要。简单说，如果你的药在安全性上的阐述不充分，这两个监管机构不会让你上临床。”刘滨磊说，在药效方面，有的时候有些药品，人和动物本身就差异比较大，可能还有沟通的余地。但安全性是一票否决，只要安全性不够好，IND的路就会变得非常漫长。

具体到一些细则，由于实行审评员终身负责制，CDE比FDA要更严格。例如，在生产工艺相同的情况下，CDE会侧重在CMC环节提出很多问题。“不是说你这个病毒本身是否有问题，而是你生产出来的产品是否有问题。”周国瑛说，如果产品的纯度和制剂有问题，就不能运用于临床研究。

再从临床试验设计看，以《溶瘤病毒类药物临床试验设计指导原则（试行）》为例，黄云虹介绍了里面几个大的方向：受试人群、给药方案、疗效评价、安全性评价。

关于受试人群，CDE建议临床试验首先在对标准治疗无效或失败的受试者中进行，在获得确切安全性和疗效后，再逐步向疾病更早期的治疗阶段推进，并重点关注人群流行病学数据中人体内相关预存免疫的影响。

溶瘤病毒的品类复杂，DNA病毒与RNA病毒不同，疱疹病毒、腺病毒与痘病毒也不同，一个品类后面是一个崭新的领域，更别提还需要在病毒上进行基因修饰与改造。因此，黄云虹强调，要在IND阶段着重考虑一是让受试者的权益得到比较完整、确定的保护，二是这些新病毒的致病性、在人群中流行的情况与抗体情况。

关于给药方案，CDE建议在实体瘤中，首推局部给药进行探索，如瘤内给药，积累相关安全性数据后，再探索全身给药如静脉给药。同时应首先进行单药单次给药，再开展单药多次给药。“溶瘤病毒毕竟是个活的病毒，在体内是增殖的，尤其是起始剂量要非常谨慎。”黄云虹说。

这与FDA有区别。周国瑛表示，国内的基因治疗产品，首次上临床，CDE建议从单次给药开始，美国是允许直接多次给药的。

最后，关于安全性评价，CDE认为，溶瘤病毒是活病毒，有特有的安全性风险，如潜伏再激活、野毒株回复突变等，应设定足够的随访时间。“这一轮的疫情大家也可以看到，病毒的变异是非常快的，溶瘤病毒它本身会不会发生什么变化，我们现在只看到比较小的临床试验样本，有可能观察不到，但是并不意味着它不存在。在这个情况下，我们随访的时间也要相应地延长，基本上要随访到不能够再检出病毒。”黄云虹说。

国内外审评存在差异，对不少布局海外的生物药企来说，如何将有限的资金花在刀刃上？

周国瑛认为，企业是否选择中美双报，要从成本和速度来通盘考量。“中美双报意味着你在中国和美国重复了一期临床，假设一期临床成本5000万，重复就是一个亿。”在一个国家先把一期临床做完，然后与其他国家的监管机构沟通，在获得临床数据的基础上，讨论看能不能少爬几个坡，省几个病人，以减少成本，也是企业应当考虑的。

刘滨磊则表示，企业选择哪些适应证做临床要谨慎考量，有的适应证可能更适合美国，有的适合中国。有一些比如脑胶质瘤，则在全球需求都很大。

此外，部分企业亦坦言，中国临床前的申报周期较美国更长。按照现行规定，在美国药企递交IND申请后，会在30个自然日内得到反馈，中国则是60个工作日，接近三个月，再加上人遗办审批的周期顺利的话也要两个月，这产生了至少四个月的时间差。

刘滨磊经历了国内溶瘤病毒行业由冷到热的过程。早在2010年，他就归国创办了滨会生物，当时国内生物医药的生态不像现在这样完善，审评难，融资也难，企业经营很困难，2012年，才拿到第一笔1000万元的天使轮融资。

此后的发展也非一帆风顺。2022年，受到生物医药行业融资趋缓的影响，布局溶瘤病毒的企业也感受到“严寒”。2023年，生物医药行业开始复苏。“这是基业长青的赛道。”中君资本合伙人丁晓波表示，生物医药仍然存在巨量的、远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现在生物医药在资本市场上的表现不太好，有政策的原因，也有情绪的原因。但可能明年或者下半年就会转暖。

机构当下对溶瘤病毒热情如何？丁晓波表示，近年来细胞治疗升温，但局限在血液瘤，而溶瘤病毒可以解决实体瘤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已有的溶瘤病毒产品不温不火，也没有PD-1/PD-L1的联用获批。确实要有一款爆款产品跑出来，为整个行业打下一剂强心针。

“我希望进入三期的产品越来越多，先获批适应证，再联用、再拓展，专家形成共识、进指南。大环境可能不好，但是可以把小环境搞得火热。”丁晓波说。

如今，企业对监管有信心，他们认可近年来药品审评的进步，亦希望未来能够更科学、更创新、与国际接轨。

“监管机构在这些年与时俱进，掌握国际上的研发动向，超出我们的想象，为我们现在研发溶瘤病毒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因为新药研发绝对不是一个企业的事情。”刘滨磊说。

周国瑛笑称自己不太习惯用“弯道超车”这个词。“我们希望早点、快点，但又要严格遵守法规，在这个基础上，期待CDE能吸纳更多成熟的、前瞻性的科学，有更多的学习和认识，这样在审评一些创新项目的时候，会更加游刃有余。”

中国医药促进会执行会长宋瑞霖则表示，细胞和基因治疗领域新兴且超前，对其的认知要经历一定的过程。就创新而言，产业一定走在监管之前，而不是监管走在产业之前。“我们要用一流的监管来跟上一流的创新。如果监管不去跟上，创新者就会被捆住，因为你得不到国家的认可、法律的认可。那么产业要做什么？要有能力用你的数据来打消审评者的担忧。”

“一流的产业和一流的监管是相辅相成的。”宋瑞霖说。

版面编辑：刘春辉

显影 | CBD再无城中村



摄影 | 李丛汛、孙木子（实习）

撰稿 | 孙木子、李丛汛（实习）

北京东三环CBD的化石营，既是历史的遗物又是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的活体

北京CBD脚下的城中村——化石营，终于还是要消失了，就像等待已久的最后一只靴子终于落地。

在北京东三环CBD版图上，建成于20世纪中叶的化石营就像一个“井底”：往东是52层的京广中心；东南侧是46层的北京财富中心、80层的国贸三期和108层的“中国尊”；往南是23层的万通中心；西南侧是33层的朝外SOHO，四面的高楼大厦将其重重包围。

2023年2月27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发布《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决定》，根据《国有土地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相关规定，化石营旧城区改建项目符合公共利益需要，决定对该项目征收范围内的房屋及其附属物实施征收，国有土地使用权同时收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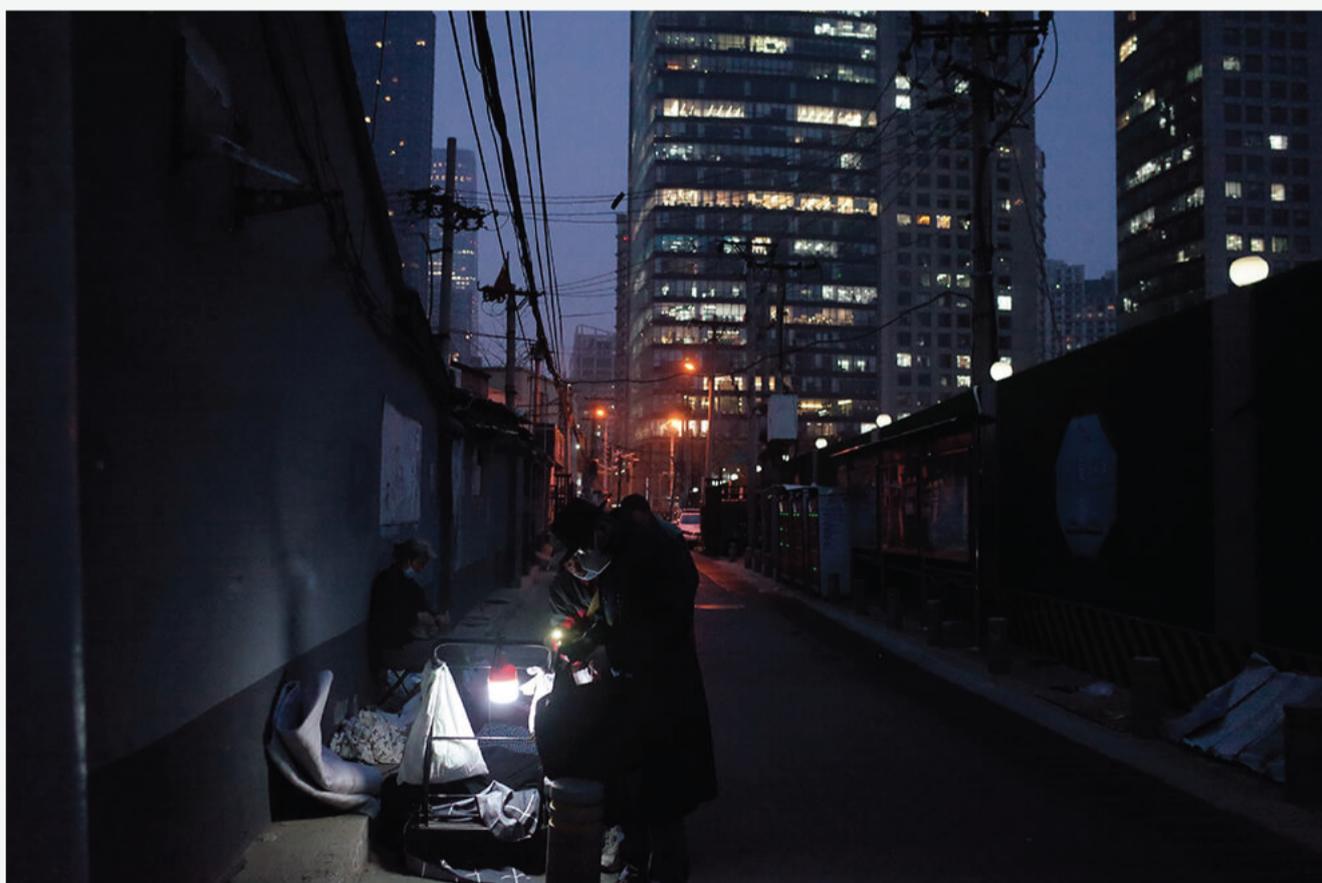
📷 征收公告发布后不久，化石营街道略显冷清。据管芳回忆，刚刚发布那几天，大量居民离开，搬家车辆和拖着行李的人来来往往，“和早就准备好了一样”。

3月初，印着“搬家”标志的数辆货车在化石营的门前排着队，挤进本就不宽敞的道路；小巷里不断走出拎着行李箱、推车、麻袋的人们，和站在路旁的邻居互相道别；商户将剩余的货物摆放在马路边的架子上，时不时吆喝几句；二手物品摊前人们围成一圈，翻找着大声询问着价格；狭窄小巷坑洼不平，堆满杂物，垃圾塞满房屋间的空隙；路口三三两两站着维持秩序的保安，倚在墙上发呆或和同伴聊天。

3月底，化石营旧改区域已全部被施工围栏遮挡。



📷 18点，一街边摊前围满了人，售卖街头巷尾收来或捡来的旧货，价格几元到几十元不等。



📷 夜幕降临，不远处的写字楼灯光亮起，巷子里的旧货摊也点起了小灯，生意不断。

热闹落尽

施工开始前的一段时间，管芳每天就靠着化石营门内的路旁，看着搬家的车辆来来往往，一把板凳，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偶尔和旁边摆摊的师傅唠上几句。今年67岁的管芳在化石营住了大半辈子，家紧挨着北面的小门，是化石营最早建成的一批房屋，历经近70年的时光。

在许多老住户的记忆中，从北京3501服装厂宿舍到CBD中心区，化石营曾是北京热闹的一角，在服装厂向城外搬迁后，曾作为工厂宿舍的化石营也变身为外来人口的集聚地。“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管芳对于过往的繁华年代颇有发言权，彼时化石营到附近的汽车总站一线是一个广为人知的“大市场”，来自全国各地的生意人聚在一起，就地搭建起一个个塑料布棚，出售各类商品。市场吸引了很多市民，整天人头攒动，顾客络绎不绝。那时候，管芳也从电子厂辞职，在家门口摆摊做起了小生意。

“不过热闹的同时也带来了混乱。”管芳回忆说，那时候垃圾堆放在路边，天气炎热会散发阵阵恶臭；部分路面坑洼不平，下雨天会形成一个个水坑；小巷堆满杂物，要侧身才能通过；平房屋顶的瓦片开始破碎，摇摇欲坠地挂在房檐上。



📷 小巷一角，散落着不少杂物。拆迁期间，化石营随处可见成堆的垃圾与遗弃的生活用品。

化石营里的房子大多是平房或五层宿舍楼，一间房大的20多平方米，小的10平方米不到，整个区域有几百间平房，公共厕所却很少。进入上世纪90年代，随着北京城市建设加速，化石营要拆迁的消息就不时传出。

据几名老住户回忆，最早的拆迁消息出现在1991年，也有住户回忆说，2008年出现过具体的拆迁通知，有人上门测量估价，并有少数居民因此搬走。2014年，据《北京晚报》报道，北京市朝阳区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在化石营旧城区各处的墙上张贴公告，征集改建意愿。2019年5月20日，朝阳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办公室发布《化石营项目平房摸底调查通知》，对化石营平房区进行测绘，为期十天。2022年10月3日，化石营区域启动预签征收补偿协议工作，签约期限为30日，签约比例达97%可启动征收工作。2023年2月27日，朝阳区人民政府正式发布《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决定》，化石营地区正式启动拆迁工作。



📹 收废品的师傅杨健林和他的两个菏泽老乡承包了6号楼的废品回收作业，“每天早上10点左右就骑车来到化石营，等着征收办的人来带着我们进门收东西”。



📹 收废品的师傅收到一张治疗床，辗转扛下楼。“（拆迁前这段时间）每天能挣个三四百元。虽然忙但是有活儿能挣钱就高兴。”另一位收废品的师傅说。

交钱交货

拆迁通告发布伊始，大多数人就已经离开化石营，但也有人迟迟不愿意走。

“收到拆迁的消息也是有些见怪不怪了，这次通知一出，街坊邻居和早就准备好了一般呼啦啦走了一大片。谨慎些的住户就补偿细节和拆迁办掰扯起来。”管芳说。

根据《化石营旧城区改建项目住宅房屋征收补偿方案》，被征收人可以选择货币补偿，也可以选择房屋产权调换，但不能同时选择两种方式。同时根据实际情况给予一定的搬迁费补偿、临时安置补偿、停产停业损失补偿。据公开的补偿方案显示，产权调换最大可调换面积为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的1.8倍；另根据公示的被征收住宅房屋分户初步评估结果，每平方米约值8.9万元。

管芳不会使用智能手机，也不愿意管这些复杂的事，就将拆迁的诸多事宜交给住在街对面小区的女儿，自己则每天坐在家门口，多看看住了一辈子的地方，多和附近的朋友去公园里打几天球，感慨着“住进高楼就真的与世隔绝了”。



📍 6号楼的一名租户在交房最后期限的前一天搬走。她的房间是公司租的半地下室员工宿舍，这种情况在化石营的楼栋并不少见。

来贵山不是老北京，19岁从山东菏泽来到北京打工，1989年结婚后住进化石营，在自家房子的前厅隔了一小块地方做小卖铺售卖酒水副食，后来还顺带理发。2004年妻子生病后，来贵山辞去工作回家与妻子一同照料起小卖铺。这段时间，来贵山总是在屋前晃悠，“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他要等到新房和补偿款下来再离开。

来贵山的妻子和女儿都有严重的精神残疾，五年前，妻子又不幸因病去世。多年来，除了低保，小店的收入一直勉强支撑三个人的生活开支。“现在只想等着自己应得的补偿发放下来，离开这间破旧的小屋，和女儿去一个新的环境定居。”来贵山说，等找到临时安置处，未来再等女儿的公租房申请下来，生活才有了着落。



📷 来贵山靠在货柜上，“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他要等到新房和补偿款下来再离开。

马翔今年33岁，从小在化石营平房区长大。为了让父母有更好的居住环境，2019年末他斥资10余万元装修了化石营的老房屋。完工后不到两年，便传来了拆迁的消息。“拆迁的事说了二十几年，都没有落实”，对拆迁无望时，马翔才选择装修，但未料到真正的拆迁来得如此迅速。

后来，征收办上门测量房屋面积后，赔偿了他几万元的装修费。交房这天，征收办和水电局的工作人员、保安以及看热闹的街坊都挤到了马翔的房子前。看着自己充满回忆、费尽心思装修的小屋被贴上封条，马翔表现得很平淡，“终于结束了”。



📷 马翔交完房后在门前拍照留念。他2019年末斥资重新装修了老房，“拆迁的事说了二十几年，都没有落实”，未料到真正的拆迁来得如此迅速，“终于结束了”。

变迁重启

对化石营的房主们来说，拆迁带来的既有财务上的补偿也有情绪上的怀旧；而对租户来说，则是生活的变迁与重启。

从河南来北京谋生的张琴在化石营租了两间房，一间在小巷里做居住用，另一间在街道旁开了间便利店。张琴今年60岁，平日里带着孙子孙女一起生活，这次他们的住处没有纳入征收规划，但赖以生存的店面确定要拆迁了。“再难找到这样租金低廉的店面”，3月初退租交房后，张琴休息了十来天，便利店里的货物没有来得及卖完，她就将货物和铁架搬到路口，支起一个小摊吆喝售卖。没有条件通电，她将冰柜里的货物放在装了冰的泡沫盒子里。保安不许她在路口摆摊，临时小摊也换了数个地方。等货物售完，张琴还要寻找新的门面或工作。



📷 贾成（左二）的露天小理发铺，街对面是同行杨师傅。贾成平日上午出门打工，下午出摊理发。拆迁以来，生意越来越少，“只能是多赚一天是一天”。



📷 开小卖铺的河南夫妇在此租住20余年，如今每日等待着拆迁的最后期限到来。小卖铺在墙上开了一扇窗当作门面，这是2017年街道整改后惟一留下的墙上开窗。

两把椅子、一个工具箱、一块白底黑字的广告牌，组成了贾成的露天小理发铺。每天下午2点，在化石营路口拐角处开张，收费10元，只理男士寸头。贾成今年53岁，在化石营租了一间小屋，上午出门打工，下午出摊理发一直到晚上。拆迁以来，生意越来越少，贾成每天只能坐在椅子上打盹，或和路口的保安闲聊。3月底，围栏彻底将拆迁区域围蔽，他也没有离开，而是将自己的小理发铺搬到了紧靠围栏的位置，“我这个年纪很难再找到好的工作，只能是多赚一天是一天”。



📷 东侧小巷不在本次征收范围内，其中一间房屋传出短视频的声音，猫在窗边向外张望。

未来

都市里的城中村，既是漫长历史的遗物，又是快速城市化过程中新生的活体。在化石营消失前夕，人们奔忙许久，终要找到下一个落脚点继续自己的生活。

来贵山最终经亲戚帮忙，和女儿住进了北锣鼓巷的胡同，环境比之前好了不少；管芳在女儿帮她办完了全部手续后，搬进了“与世隔绝”的高楼，开始尝试改变习惯了大半辈子的生活状态；张琴留在化石营继续摆摊等货物清空，她还要继续物色新的店面或工作，“还好住的地方不用搬，在北京生活要学会将就”。



📷 据化石营的保安说，拆迁期间常有居民以遗漏物品为由要求进入施工区域。这天，又有两名居民强行闯入，警察赶来处理引得不少路人围观。



📷 旧改区域外围街道，3月底门店全部关闭，卷帘门上喷上了“征收”印记。

和张琴租住的房屋一样，大约还有三分之一的平房区不在本次征收范围内，下一步的征收规划尚没有消息。3月21日傍晚，几位住在征收范围外的老居民围坐在巷口，如往日般闲聊。顺着他们的视线看去，一只红冠小鸟正在树梢搭巢，它每叼起一根树枝搭在巢里，一阵风便将其吹落，它又重新将其拾起，如此往复。街坊笑得不能自己：“也许等我们搬走了，它都还在搭巢呢！”



📷 3月底，旧改区域已全部被施工围栏遮挡。透过围栏，可看见空旷的路面和几辆工作用车。



📷 由花坛、梯子、椅子等搭成的疫情临时隔离点，如今已然废弃。



📍 平房区的房屋使用统一式样的瓦片和墙漆，瓦片已经有些破碎，尚未变绿的树木从房屋空隙中伸出。

（文中管芳、贾成、张琴为化名）

图片编辑 | 董德

开篇图说：2023年3月21日，北京市朝阳区化石营旧改区域的居民大多已经撤离，入夜后一片漆黑，仅有路灯还在发出光亮，不远处的CBD写字楼仍灯火通明。



订阅财新
支持严肃新闻

最新财新周刊 | 卡位智能驾驶供应链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第17期 出版日期 2023年05月01日

电动化和智能化推动汽车供应链重构，整车开发模式与商业生态都在迅速调整

文 财新周刊 余聪 刘沛林 屈运栩

2023年4月18日，疫情后备受瞩目的上海车展开幕，十天展期内，超1000家企业展出了超过1400台汽车，新能源展车占比超过三分之一。与两年前车企爱展示各类高配置智能驾驶方案不同，本次车展新车的智能化方案更加务实；而围绕智驾芯片、激光雷达、辅助驾驶、智能座舱等软硬件供应链的关键词，则变成了“上量”和“降价”。

“中国电动汽车的渗透率已是全世界最高，围绕电动汽车产业链，比如电池和上游原材料甚至已经产能过剩。”一家“国字头”投资机构人士告诉财新，汽车行业目前步入“电动化+智能化”的加速期，整个汽车供应链正在重构，挑战与机遇并存。

国际能源署（IEA）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约为30%，欧洲超过20%，美国则为8%。另一边，汽车业界基本认可，中国在汽车智能化领域也暂处领先地位，中国市场的汽车智能化路线将定义未来。

与所有行业的智能化类似，汽车业智能化也离不开数据、算力和算法三大环节。前述投资人认为，在数据层面，整车厂是绝对主导者。“数据基本来自车厂，包括人机互动和驾驶数据，主机厂自身能力和销量在供应链谈判地位中最为关键。”新旧供应链势力则在算力和算法上比拼能力，争夺车厂。

算力方面，与普通消费电子产品不同，一辆智能汽车可能需要几十、上百颗芯片，负责驾驶、车内娱乐系统和胎压监测等的芯片各不相同，且市场上传统供应链企业各有擅长。在国际市场，英伟达（NASDAQ: NVDA）、高通和Mobileye（NASDAQ: MBLY）等企业基本垄断了高端车市场；在中国，[德赛西威](#)（002920.SZ）、[中科创达](#)（300496.SZ）和[知行科技](#)等公司，则通过给三大芯片公司做“在地”服务，迅速获得资本市场青睐。

德赛西威是英伟达全球六大集成商之一，2022年营收149.3亿元，同比增长超过50%，股价一度攀升至203.99元/股；同期，作为高通座舱方案主要合作方的中科创达，营收也有54.4亿元，同比增长超过30%；知行科技则通过与Mobileye合作获得上车机会，近期赴港IPO，招股书显示其收入从2020年的4765万元飙升至2022年的13.26亿元，复合增长率超过400%。“这些公司赚了顺势而为的钱。”前述投资人说。

新兴的中国芯片公司，竭力抓住机遇切入汽车供应链。多家汽车芯片公司告诉财新，因为美国对中国芯片的出口限制和未来的脱钩预期加大，车企尤其国资背景车企，都倾向于打造国产芯片备份方案；而2019年开始的汽车行业缺芯，也加速了国产芯片上车的进程。本届上海车展期间，国产芯片的“领头羊”公司[地平线](#)、[黑芝麻智能](#)、[芯驰科技](#)等均挤进了整车展馆发布芯片产品，宣发热度不输新车。

在算法方面，走得最快最远的是完全自动驾驶（L4）公司。不过，受限于政策和市场需求，曾备受资本追捧的一众L4级公司，陷入了技术突破和商业模式落地双难境地，纷纷向辅助驾驶（L2）方向“降维”转型，寻求前装量产的机会。

汽车制造业目前更倾向于高级辅助驾驶（L2+）路线，但在这一领域的供应链企业，整车厂选择太多，价格战暗涌。以“蔚小理”为代表的造车新势力，对系统和算法层自研诉求强烈，而新的供应商必须手握芯片、激光雷达、高精地图、人工智能（AI）等“拳头产品”，才能在产业链获得一席之地。

以算力、算法和数据来划分的智能驾驶供应链，与传统汽车供应链从Tier 1（一级供应商）到Tier 3（三级供应商）的“金字塔结构”全然不同。“汽车供应链已经变为网状（交叉合作）。”中国首家上市的激光雷达公司[禾赛科技](#)（NASDAQ: HSAI）创始人[李一帆](#)对财新指出，芯片这类核心零部件，过去归于二三级传统供应商，“现在芯片影响太大了，主机厂只好越级管理”。

前述“国字头”投资人也指出，新的智能化供应链会形成新兴的Tier 1，这些公司须有“独门绝活儿”。“对于地平线、[四维图新](#)（002405.SZ）这样高毛利公司，目前是一个‘风口’，但要解决车规级转型和成本控制的问题。”

想要成为新一代的Tier 1，成本控制是核心竞争力。行业“内卷”下，车企更偏好性价比高的智能驾驶解决方案。地平线总裁陈黎明直言，地平线需要利用硬件峰值算力提供更高性能、更优成本的产品，以协助车企应对市场压力。一名智能驾驶供应链人士直言，目前车企对智能化的诉求简单直接，就是“功能好、价格低、上车快”。

四维图新乘用车业务负责人简国栋则告诉财新，基于高精地图的辅助驾驶方案无需采购新硬件，能够节省成本。“我们主要做的是单车售价7万到15万元的市场，走量是关键。到2024年，70%以上的新车都会标配L2，四维图新希望获得较高份额。”

在传统燃油车时代一路领先的外资供应商，不会坐视中国供应链独享智能化红利。全球头部Tier 1博世、采埃孚均在加大中国投入。2022年11月博世宣布在上海投资1.5亿元建设新的研发中心，进行智能座舱、高阶智能驾驶平台的开发与量产。“博世现在身段也在变软，在中国业务合作方面更愿意提前沟通，以前都是等着全球总部把业

务分发过来。”一家国产芯片厂商管理层人士告诉财新。采埃孚也将在广州投建汽车电子厂，预计2025年量产，近期还与地平线、汽车软件公司[东软睿驰](#)达成战略合作。

“自研热”退了吗？

4月19日，上海车展第二日，[小米集团](#)（01810.HK）董事长[雷军](#)出现在[蔚来汽车](#)展台。蔚来汽车联合创始人[秦力洪](#)向雷军介绍了公司在智能驾驶上的新方案：融合感知，即区别于特斯拉的纯视觉方案，将激光雷达和多个感知硬件获得的数据进行融合和冗余，以实现为周围环境的全面感知。秦力洪称，这一方案将在7月上车。

作为中国造车新势力中产品定位最高的公司，蔚来汽车在上海车展搭建了与国际巨头宝马面积相当的展台。[小米汽车](#)将在2024年上半年量产，市场期待其在当年北京车展露面。

蔚来汽车和[华为](#)是汽车行业新玩家两类代表。“蔚小理”等造车新势力希望在智能化阶段掌握主动权，因而模仿特斯拉的全栈自研模式；华为和[百度](#)（NASDAQ: BIDU）等互联网科技公司希望通过输出智能化能力，成为新的供应链厂商；这代表着手握数据的整车厂在与大型科技巨头博弈。

特斯拉是电动汽车时代全栈自研的标杆，包括FSD（Full Self Driving）驾驶辅助系统、AI芯片和超级计算机Dojo等。特斯拉最初和Mobileye合作推出自动驾驶辅助系统Autopilot。但2016年5月，一辆特斯拉Model S未能识别前方横穿马路的卡车，导致车主发生事故并丧生。两个月后，特斯拉即结束与Mobileye的合作关系，走向自研。2020年，特斯拉开始测试L2级辅助驾驶系统FSD Beta版。到2022年底，FSD功能订阅推送量约达40万辆。在中国，增强版Autopilot选装价格为3.2万元，FSD选装价格是6.4万元。2022年，FSD收入3.24亿美元，主要来源于美国和加拿大市场。

中国造车新势力素以特斯拉为追随目标。蔚来汽车第一代平台车型自动驾驶芯片和感知算法来自Mobileye，第二代平台车型就开始自动驾驶全栈自研，智能驾驶芯片供应商切换为英伟达。

[理想汽车](#)则于2020年开始投入自动驾驶研发，首款车型搭载的自动驾驶辅助系统也由Mobileye供应，2021年开始转向地平线和英伟达。2023年，理想汽车的城市辅助驾驶系统要开始铺量，目标是年底覆盖百城。理想汽车智能驾驶副总裁郎咸朋称，理想汽车使用新的大模型AI算法，能够摆脱对高精度地图的依赖，像人类司机一样实时感知、决策和规划驾驶行为。

[小鹏汽车](#)（NYSE: XPEV）被视为最像特斯拉的公司，在智能驾驶上更为积极，2022年9月发布了XNGP（X Navigation Guided Pilot，导航辅助驾驶）系统，可在城市、高速、泊车等场景实现智能驾驶。本次上海车展，小鹏再推新架构，希望提高产品迭代速度、降低研发成本。其介绍，XNGP智能驾驶系统要在未来所有车型上搭载，新架构可降低智能驾驶技术适配不同车型的成本。

“真正的智能汽车公司不能把智能化的架构、软件、硬件、数据完全交给合作伙伴。”4月16日，小鹏汽车董事长[何小鹏](#)在车展前表态继续走自研之路。他认为，在汽车智能化时代，产品开发、迭代速度加快，车企不能全盘依赖供应商，只能将部分能力交给供应商，自我研发、自我整合才是核心。

一家传统车厂研究院人士告诉财新，传统车厂无论电动化还是智能化，都更倾向于等待供应链成熟，通过价格战压低采购价格，再通过制造经验快速上量：“没有哪家研究院的领导敢说‘我们来自己做一款智能驾驶的车吧’，毕竟一款新车的研发成本高达一二十亿元，传统车厂不会赌。”

正因如此，诸多在传统车企无法放开拳脚的智能化研发人员进入了造车新势力。新的问题接踵而至。小鹏汽车早早将“智能驾驶”作为自身标签。“激光雷达最早上车的就是小鹏，他们这块的研发团队超过500人。”前述传统车厂研究院人士告诉财新，但消费者感知不到传感器和智能化带来的根本变化，小鹏两代汽车G3和P5均难言成功，其智能化探索短期未能带来市场增量。

上海车展前夕，百度自动驾驶平台Apollo发布了适用于城市、高速等场景的系列智能驾驶产品。“一些之前尝试自研的车企逐步意识到，全栈自研需要投入巨大且不是车企擅长的领域，算账也算不过来，行业里的‘自研热’在退潮。”百度集团副总裁、智能汽车事业部总经理储瑞松当时称。百度于2017年推出Apollo，前期聚焦在L4领域，2021年下半年，百度Apollo开始将L4级自动驾驶技术降维应用到L2级辅助驾驶上，但截至目前，与车企的合作更多集中在地图、智能座舱业务。

智能驾驶供应商[福瑞泰克](#)总裁张林也告诉财新，造车新势力自研的自动驾驶方案成本过高，难以下放大众市场。“我相信蔚来汽车做30万元以内的市场，就必须要找第三方合作。”

据财新了解，蔚来汽车正与[大疆](#)车载沟通合作，可能应用于2024年面世的第二或第三品牌。大疆车载是无人机巨头大疆于2016年启动的项目，主攻智能驾驶系统核心零部件。2022年，大疆推出了适用于10万元以内车型的智能泊车方案。本次上海车展前，大疆又推出可实现城区领航辅助的新方案，大疆车载负责人沈劭劭提出，智能驾驶系统成本应占整车售价3%—5%，按照中国汽车市场主销车型价位，对应价格为5000元至1.5万元。

对造车新老势力来说，华为是它们都想绕过却不得不重视的公司。华为智能汽车解决方案BU（业务单元）CEO [余承东](#)对华为面临的市场认知清醒。他在4月初的电动汽车百人会上指出，造车新势力企业为了市值和自

身掌控需要，不会跟华为在智能驾驶等业务开展合作；华为面临美国制裁，国际车企也不会选择华为；中国传统车企中“怕失去灵魂”的，也不会与华为合作。“华为汽车业务研发投入这么大，在这种情况下没办法商业变现。走智选车模式，能够与我们紧密合作的车厂实现共赢。”

“智选车”和“HI”（Huawei Inside）构成了华为汽车业务。智选车模式由华为提供全栈解决方案，问界即是华为和赛力斯大力合作的智选车，后来奇瑞汽车、江淮汽车（600418.SH）等亦加入阵营；HI模式下，整车厂主导产品和体验，华为仅提供智能驾驶方案。相较而言，华为在智选车模式中话语权更高，目前这一模式也明显占上风，不过相关产品销量并不理想。（参见本刊2023年第16期《何为华为不造车？》）

4月中旬，就在内部再次为是否造车激烈争论时，华为宣布问界M5智驾版搭载其高阶智能驾驶系统ADS（Advanced Driving System）2.0版，成本约为3万元。二季度，ADS 2.0计划在上海、深圳、广州、杭州和重庆五城的问界M5上线，三季度推广至15城，四季度至45城。

“金字塔”变网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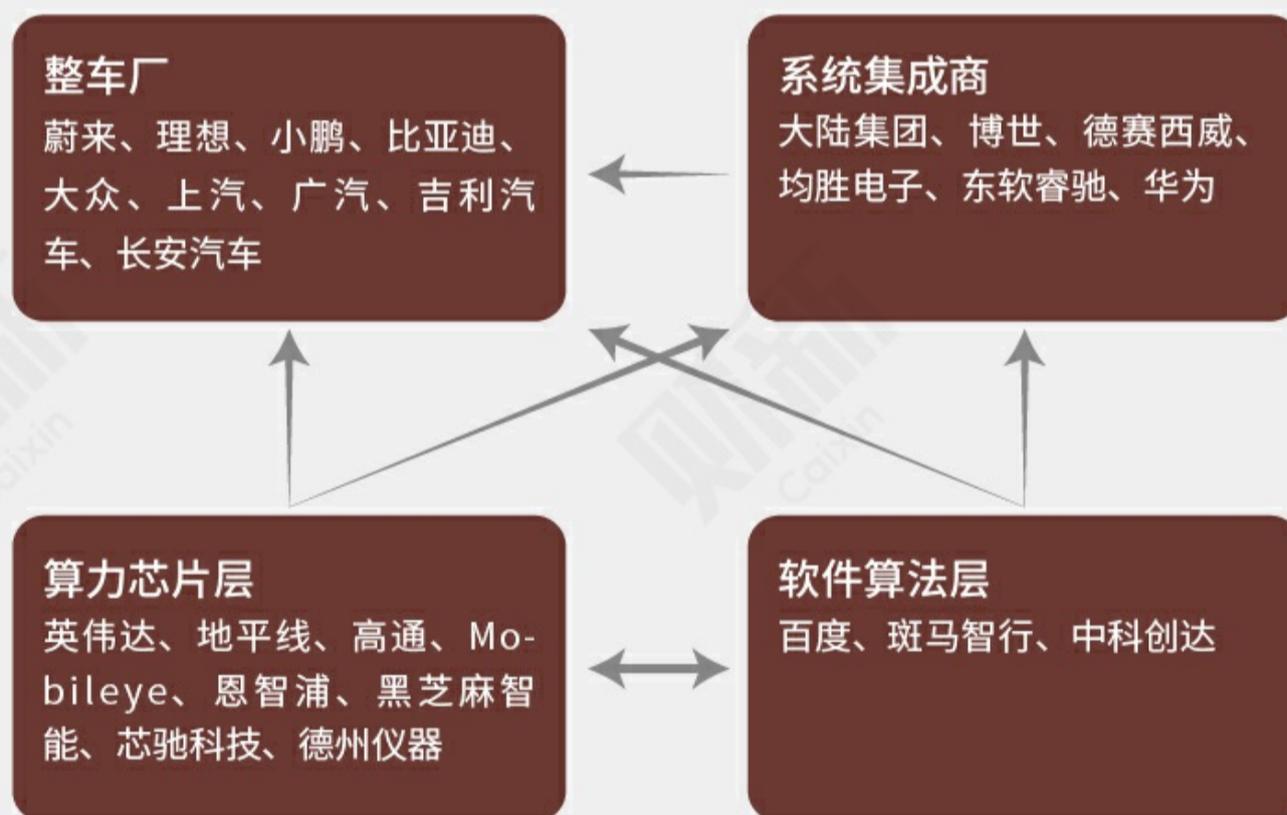
新的智能化供应商加入后，整车厂和供应链的关系、开发模式和商业生态都在迅速调整。

传统汽车供应链像“金字塔”：车企位于塔顶，一级供应商直接向车企供货，二级供应商向一级供应商供货，以此类推。算力芯片和算法软件商作为二级供应商，以往不会与车企直接对接，而是由博世、大陆这类一级供应商按需采购并系统集成，再将模块化后的零配件销售给整车厂。

但智能车时代，整车厂需要直接与芯片、软件等系统供应商进行联合开发。“供应链网状的协作未来会成为常态，主机厂通过这样的合作方式可以获得更大的自主权，整个开发周期也会变得更短。”陈黎明指出。

“燃油车时代，Tier 1能力强大，实际上定义了整个汽车行业的技术路线和产品节奏。”国产芯片厂商芯驰科技副总裁陈蜀杰告诉财新，但部分车厂目前与芯驰的合作，已经是与Tier 1同步进行，车厂备选的不同Tier 1有时还会同时选用芯驰的芯片。

智能汽车供应链从传统金字塔模式变为网状模式



资料来源：财新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而激光雷达等新硬件的供应商，传统Tier 1对此并没有集成经验。激光雷达因为单颗成本一度高达几万美元，原本只用于L4级自动驾驶的两大落地场景——Robotaxi（无人驾驶出租车）、Robotruck（无人驾驶卡车）。但从2020年底开始，小鹏汽车、蔚来汽车、长城魏牌等均宣布在量产车上搭载激光雷达。厂商为车企提供激光雷达硬件和一部分基础软件，车企负责激光雷达上车后的算法开发。高工智能汽车研究院监测数据显示，中国市场（不含进出口）乘用车前装标配激光雷达的搭载量，从2021年的不足万台激增至2022年的12.99万台。

但李一帆告诉财新，目前消费者对激光雷达的感知不清晰，因为车企的自动驾驶系统未能完全发挥出激光雷达的能力，还需持续迭代。

因为英伟达、高通和Mobileye等主要芯片系统成了智能汽车的核心部件，一些为其做适配的公司也获得了上车的机会。4月初，知行科技在招股书中透露，由于在自动驾驶行业发展初期，市场上自动驾驶SoC（系统级芯片）供应商数量有限，其与Mobileye合作得以成为吉利旗下新能源子品牌极氪首款轿跑车001的供应商。

成立于2015年的[易航智能](#)，早期同样依靠Mobileye实现量产上车。易航智能创始人、董事长陈禹行告诉财新，当时Mobileye负责感知算法，易航智能负责规划、控制算法，积累经验后易航智能转向全栈自研，目前已拿到江铃雷诺、[上汽大通](#)、[北汽](#)等其他车企定点项目。

此外，原本定位L4级自动驾驶的公司也开始向L2级前装市场聚集，现阶段希望提供高阶的L2级功能，包括城市或高速场景的点到点辅助驾驶。4月19日的上海车展上，自动驾驶卡车公司[图森未来](#)（NASDAQ: TSP）发布L2域控制器集中式产品。该方案同时支持商用车和乘用车，计划在2024年实现量产交付，目前还没有拿到订单。图森未来CEO[吕程](#)称，近年无人驾驶陷入寒冬，图森未来希望把一部分技术剥离出来，为主机厂提供L2级服务，更快实现商业化。

图森并非特例，小马智行、[文远知行](#)、[轻舟智航](#)、[元戎启行](#)等L4级自动驾驶公司均转向拓展L2级业务，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降维打击”，技术路线降级不是简单的减法，而是需要重构算法与芯片系统及其供应链。4月13日，[小马智行](#)发布乘用车辅助自动驾驶的系列产品，计划2023年量产。据财新了解，合作方为新车企[洛轲智能](#)。2022年5月，文远知行和博世达成合作，计划将自动驾驶方案应用于L2至L3级前装量产。在本次上海车展期间，博世展出了与文远共同开发的高阶智能驾驶解决方案。

四维图新则希望撕掉简单的“图商”标签，跻身智能驾驶Tier 1。2021年，四维图新拿到了作为Tier 1的首个订单为四川宜宾车企[凯翼汽车](#)提供自动驾驶系统。简国栋对财新称，四维图新在芯片、地图、云和智能驾驶方面都有布局，很幸运赶上了自动驾驶爆发的业务窗口。2022年，四维图新的智能驾驶业务营收1.31亿元，占比不到4%，但营收同比增长超过2000%；包括地图在内的智云业务仍为营收支柱，占比超过60%，但营收增长趋缓，仅约3%。

据财新了解，2022年8月，四维图新拿到了[比亚迪](#)的订单，双方共同开发L2级自动驾驶辅助系统软硬一体解决方案。方案包含域控制器硬件，以及地图和相关数据算法。

国产芯片上位

智能汽车供应链的调整，引发车企调整研发生产模式，而这一连串调整的根本动能则来自芯片。在美国科技封锁、疫情造成缺芯这两大因素触发下，一众国产厂商乘机在汽车工业领域获得了一席之地。

在传统汽车的电子电气架构中，每个功能单元都需要通过分布式的电子控制单元（ECU）控制，各ECU芯片之间相互独立，一辆汽车需要50-100颗不同的ECU来实现不同功能。而随着特斯拉将控制模块按分布位置简化为左车身、右车身、中央三个域控制器，整车控制模块从分布走向集中，对底层芯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芯片厂商在汽车供应链的地位也相应提升。

2019年美国制裁华为后，中国汽车产业界就开始出现“不能过度依赖外国芯片”的呼声。2021年1月，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工信部原部长苗圩在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论坛上表示，美国对走在技术前列的国家和企业会出手遏制，华为和[中兴](#)被制裁值得汽车业警惕，要早做准备，“卡脖子”零部件至少要有个“备胎”。

在这样的背景下，国产芯片厂商的第一批客户来自“央企系”整车厂。2015年成立的地平线直到2020年才找到第一个客户[长安汽车](#)，此后陆续收到[上汽](#)、[一汽](#)和[广汽](#)的定点合作。另一家成立于2018年的国产芯片厂商芯驰科技首个客户是一汽集团，为红旗SUV车型提供网关芯片。

席卷全球的“芯片荒”促使整车厂开始向下“越级管理”。“2020年初，整车厂都还不知道自家产品的芯片是从哪来的，只知道Tier 1是哪家，但这两年汽车行业对芯片的认知有了质的飞跃。”秦力洪说。

“过去车企希望能够有成熟的供应商比如博世、大陆兜底，用国内方案会担心出了事谁担责任，但缺芯撕开了个口子，让国产芯片有了上车机会，进而带动国产软件、操作系统上车。”东软睿驰业务线总监兼欧美全球销售总经理茅海燕告诉财新。

为确保中国市场的供应链稳定，国外车企也开始选择中国国产芯片厂商作为合作伙伴。2022年10月，大众汽车集团宣布决定向地平线投资24亿欧元并成立合资公司，为中国市场开发自动驾驶辅助系统和自动驾驶解决方案。

在此次上海车展期间，地平线、黑芝麻等国产车规芯片厂商纷纷晒单，合作涵盖比亚迪、奇瑞星途、[东风](#)等品牌。

目前已量产的算力最大的国产芯片包括地平线的征程5、黑芝麻的A1000，两款芯片的单片算力分别最高可达128TOPS（算力单位，1TOPS等于每秒进行1万亿次运算）、116TOPS。与之相较，英伟达在售算力最大的Orin-X芯片的单片算力最高达254TOPS。

在中低端市场，国产芯片已与英伟达、德州仪器等外国厂商形成正面竞争。小马智行CFO王皓俊告诉财新，100TOPS算力是自动驾驶中端和底端的分界线，只有底层芯片算力超过100TOPS，才可以实现较好规划、控制能力。这一门槛对应的车型售价在20万至25万元。

而30万元以上的高端车型市场，是英伟达Orin-X芯片的天下，部分高端量产车会采用双Orin-X芯片方案，总算

力超过500TOPS；而L4级公司路测的Robotaxi则需要1000TOPS左右的算力，往往需要搭配至少四颗英伟达Orin-X芯片。

在中低端市场，车厂选择国产芯片主打性价比路线。2022年9月，理想汽车发布L8车型，该车型共有三个版本，两个较低配置版本使用地平线单颗征程5芯片，实现了高速导航辅助功能，这也是该产品首次上车。L8高配版本使用的是双英伟达Orin-X方案，已经实现高速导航辅助功能，后续支持实现城市场景的辅助驾驶。

王皓俊透露称，目前英伟达单、双Orin-X都是万元级方案，而算力在100TOPS左右的国产芯片方案可将成本降低到5000-6000元。

根据高工智能汽车研究院发布的2022年度榜单，以新车上险量来统计，地平线以49.05%的市场份额占据中国乘用车市场标配导航辅助驾驶市场份额第一名，排名第二的英伟达市场份额为45.89%，两家合计市场份额近95%。德州仪器、Mobileye和[华为海思](#)的市场份额分别为2.69%、1.97%和0.41%。

目前，国产自动驾驶芯片仍在不惜成本上车。前述“国字头”投资人告诉财新，地平线的芯片和算法高度绑定，在保护核心算法的同时给整车厂定制化空间，与车厂的合作采用联合开发模式，需要大量的驻场工程师。

一名自动驾驶公司高管则认为，地平线和理想的合作是为了打标杆，拉动其他量产项目引入，因此提供了包括感知在内的整体方案。“和理想的合作是征程5的第一次上车，所以地平线愿意花这么大精力，实际它们的商业模式还是卖芯片。”

而在承担车内车联网、娱乐等功能的智能座舱控制域中，高通芯片几乎垄断高端市场，而芯驰因为更高性价比获得许多大众车型青睐，陈蜀杰指出，芯驰和高通是错位竞争，是目前国产智能座舱芯片出货量最具规模的企业。

陈蜀杰还认为，未来智能座舱、自动驾驶控制域也将进一步整合，芯片公司的竞争终将收束至争夺中央计算。“做智能座舱、自动驾驶的都有野心去做中央计算。未来高通会与英伟达直接竞争，高通关心的是英伟达这种能提供大算力产品的公司。”她说。

地平线则对智能座舱和自动驾驶控制域芯片合并更为谨慎。“座舱是自成体系的，尤其是在软件上的应用，与自动驾驶之间的差异像两个世界一样，放在一颗芯片上也不见得合理。”地平线联合创始人兼CTO[黄畅](#)在上海车展期间表示。同场活动上，地平线副总裁兼软件平台产品线总裁[余轶南](#)也指出，智能座舱和自动驾驶控制融合到一颗芯片上能带来什么好处仍不清楚，市场未必有足够动力。

价格战火燃起

目前，新能源汽车被特斯拉降价拖入新一轮价格战。降本诉求下，车企辅助驾驶功能开发偏好更务实的方案，区别于早几年的高配置“炫技”产品。

2021年上海车展时，智能驾驶比拼刚刚拉开序幕，车企“装备竞赛”蔚然成风。当年1月，蔚来汽车发布ET7车型，宣布搭载33个感知硬件，包括1颗远距离激光雷达。4月，搭载华为高阶自动驾驶技术的[极狐](#)阿尔法S HI版车型亮相，该车型配置的硬件包括3颗激光雷达，传感器多达35颗，售价较普通版本高8.5万元。

然而，高配置没带来销量，极狐至今未公开披露HI版车型具体销量。据麦肯锡调查，自动驾驶技术在消费者购车决策中仅排在第九位。

汽车行业迅速作出调整。“现在智能驾驶行业与两年前发生本质区别，现阶段行业更注重落地，‘卷’价格成为明确趋势。”一名汽车行业分析师告诉财新。

4月26日，在[广汽资本](#)2023新能源及智能网联产业投资峰会上，广汽资本总经理袁锋提出，高级辅助驾驶技术若要向大众市场持续渗透，系统成本须下探至1万-1.5万元区间。

[盖世汽车](#)数据研究统计显示，以行泊一体域控制器市场为例，2023年前两个月，德赛西威、[经纬恒润](#)（688326.SH）等国内传统供应商占据约30%份额，主要与以英伟达为代表的国际芯片厂商合作。[宏景智驾](#)、福瑞泰克等国内新兴Tier 1以“性价比”为标签，主要选用小算力经济型芯片。这类厂商市场份额约为8%，主要瞄准定价在20万元甚至15万元以内车型。

2022年底，宏景智驾推出基于单颗地平线征程3芯片的5V5R（5颗摄像头，5颗雷达）行泊一体方案。公司称，该方案硬件价格在3000元以内，计划在2023年内量产。宏景智驾创始人兼CEO[刘飞龙](#)在本届上海车展期间透露，一款定价在15万元左右的车型，其智驾方案预算大概为3000-4000元。中国市场15万元以下车型销量占比为50%，要拿下这一市场，成本控制能力是决胜关键。

辅助驾驶领域围绕要不要高精度地图，出现了两条不同的技术路线，它们均声称自己价格更低。

4月17日，华为推出高阶智能驾驶系统ADS 2.0。与1.0版本相比，2.0版以车辆的融合感知为主，减少对高精度地图的依赖，更多依靠系统现场判断。对此，余承东解释称，高精度地图采集成本非常高，很难做到普及全国，华为在上海市采集了两三年的高精度地图，也只覆盖了2.2万公里，而覆盖全上海需要采集3.6万公里。

他还介绍，从国家安全角度，政府只允许厂商每隔几个月刷新一次高精度地图，而国内道路更新变化太快，上述情况导致高精度地图无法广泛使用。华为ADS 2.0的激光雷达数量减少为1颗，毫米波雷达减至3颗，高清摄像头数目减至11路，成本约为3万元，较1.0版本成本砍半。

在华为的方案中，最贵的车载硬件莫过于激光雷达。[中信证券](#)2022年9月的一份研报显示，激光雷达价格约为600美元。李一帆认为，激光雷达短期内很难进一步降价。

百度在上海发布的城市智驾系统Apollo City Driving Max则采用纯视觉感知方案，可在城市辅助驾驶。百度Apollo人士向财新解释称，该系统采用轻量级高精地图，通过优化算法和感知能力，在数据采集量比传统高精地图低80%的条件下，仍可实现城市导航辅助等高级辅助驾驶功能。

提供高精度地图的四维图新却认为，应对复杂场景，在成本上，高精度地图方案更有竞争力。简国栋指出，相比动辄上万元的感知硬件组合，四维图新依据“高精地图+感知”方案额外单车成本只需一两百元。“现阶段大环境不乐观，作为Tier 1的能力不在于死扛着不降价，而是凭借组织效率‘从干毛巾里拧出水来’。”

特斯拉是纯视觉路线代表，其方案既不依靠高精度地图，也不需要激光雷达。

特斯拉即将在中国测试FSD功能，这让国内智能驾驶玩家更添紧迫感。理想汽车创始人兼CEO[李想](#)称，到2023年底，中国头部企业的智能驾驶技术能达到特斯拉FSD在2022年底、2023年初的水平。

汽车行业残酷的价格战正向全产业链传导。新能源车企淘汰赛即将到来，这意味着供应链也会“洗牌”。东软睿驰总经理曹斌指出，车企会集中力量做更有竞争力的车型，或对部分车型减配。“大胆预测的话，今年Tier 1供应商倒掉的数量或许比车企还要多”。

张而弛、戚展宁对此文亦有贡献

版面编辑：刘春辉

最新财新周刊 | 高通竞逐未来市场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第17期 出版日期 2023年05月01日

苹果志在独立，联发科步步逼近，芯片大厂的未来在汽车、电脑、人工智能等多元融合

文 财新周刊 翟少辉

3月下旬，美国芯片公司高通CEO安蒙（Cristiano Amon）来到中国，行程紧密：首站落地深圳密集拜访客户，随后飞往北京参加3月24日举行的高通“骁龙友会”（即高通芯片粉丝社群）派对，次日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3年会，并于3月26日受到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的会见。

这是安蒙时隔三年半再次来到中国。中国可谓高通最重要的市场，贡献约六成营收。高通于1985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创立，如今是年营收达到442亿美元、市值超千亿美元的全球移动芯片龙头。

“过去我经常来中国出差，至少每个季度一次。”3月22日，在高通位于深圳的办公室，安蒙向财新提及与老客户们线下重聚时难掩兴奋。除了OPPO、vivo、小米、荣耀、华为等众多消费电子品牌客户，“来中国，还可以结交新朋友”，包括中国新兴的电动汽车行业客户。

今年52岁的安蒙出生于巴西，1995年加入高通，以工程师为起点，历任多个业务和技术的领导职位，2018年出任高通总裁，并于2021年6月成为高通历史上第四任CEO。彼时全球许多国家正全速推进5G部署，疫情首轮冲击后的智能手机市场也迎来复苏之势；与此同时，一场史无前例的“缺芯风暴”席卷而来，供应链各环节“抢芯”。安蒙坦言，过去两年的供应短缺，是他执掌公司以来经历的最大挑战。

在安蒙分散代工的策略下，高通顶住缺芯压力，2021、2022财年业绩猛增，营收分别为335.66亿、442.00亿美元，同比增长43%、32%；净利润分别为90.43亿、129.36亿美元，同比增长74%、43%。

下游厂商为保障供应链安全不断抬高元器件库存，叠加宏观经济逆风以及俄乌冲突、局部疫情等“黑天鹅”因素，消费电子市场需求急转直下。2022年下半年以来，全球主要终端品牌进入去库存阶段，减少上游订单，半导体行业由此陷入十年来最艰难的下行周期。

一名国内手机行业资深人士介绍，直至2023年4月，终端厂商“砍单”影响仍在，相关库存去化至少还需三个月。高通未能幸免，2023财年第一季度，非美国通用会计准则下，高通实现营收94.56亿美元，同比减少12%；净利润为26.84亿美元，同比下滑27%。

大客户风险已然袭来。为高通贡献近百亿美元营收的苹果近年加码自研基带芯片，随着研发推进，迟早会弃用高通。在当地时间2月26日的世界移动通信大会（MWC）上，安蒙对“苹果会否在2024年继续使用高通基带芯片不作预测”的表态，迅速被市场误读为“苹果将在2024年弃用高通”，足见市场对此之关切。为追赶苹果，安卓手机厂商效仿软硬件一体化策略纷纷试图“造芯”，亦给高通的未来需求带来不确定性。

老对手联发科则在奋力追赶。疫情期间，联发科发布天玑9000芯片系列，向高通一直以来的优势领地——高端市场发起挑战，同时巩固中低端市场。市场调研机构Counterpoint数据显示，以出货量计，2020年三季度，联发科首次超过高通，以31%的市占率登顶，并在此后一直保持了对高通的领先。不过，以营收计，高通仍是全球移动芯片“老大”。

安蒙着力推动高通打造直面消费者的品牌，比如2022年邀请好莱坞华裔女星杨紫琼出演公司的人工智能宣传片。安蒙解释称，高通虽然是一家to B（面向企业）的公司，但如今，智能手机社群日趋成熟，消费者有很强的意愿去了解手机背后的技术。加大对品牌的投入是高通公司新战略的一部分。目前，高通还是F1赛事、英超曼联队的赞助商。借助品牌争夺手机市场份额的同时，高通还加码业务多元化，在PC（个人电脑）、汽车、人工智能、XR（扩展现实）等多终端积极拓展，试图打造新的增长曲线。截至目前，手机芯片仍为高通支柱业务，但非手机业务在芯片销售收入中占比已接近三成。

苹果即将“掉落”

苹果主要向高通采购基带芯片以及获取相应的专利授权。苹果对于高通到底有多重要？市场调研机构TechInsights手机元件技术服务总监Sravan Kundojjala向财新估算，2021年，高通来自苹果的营收约为60亿美元，2022年猛增50%达到90亿美元——这约占高通营收的五分之一。

苹果与高通合作最早追溯到2010年，苹果在其被誉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iPhone 4产品上首次使用自研A系列处理器，同时引入高通基带芯片，部分替代此前使用的英飞凌产品。2011年，高通进一步成为iPhone基带芯片的独家供应商。2016年，苹果从iPhone 7系列开始引入英特尔，后者与高通一同供应基带芯片。到2018年的新款iPhone中，英特尔挤掉高通成为独家供应商。彼时苹果和高通已陷入专利战，英特尔的基带芯片尽管性能不足，但增加了苹果与高通谈判的筹码。2019年4月，高通与苹果达成和解，苹果在2020年发布的iPhone 12中重新启用高通基带芯片。

不过，苹果并未放弃自研基带芯片。2019年，苹果以10亿美元收购英特尔基带芯片多数业务，加快自研步伐。基带芯片用于无线电传输和接收数据，是移动通讯设备的基础元器件。由于需要兼容前代通讯技术，且专利布局较为完善，自研难度相对较高。英特尔的专利组合对苹果自研芯片十分关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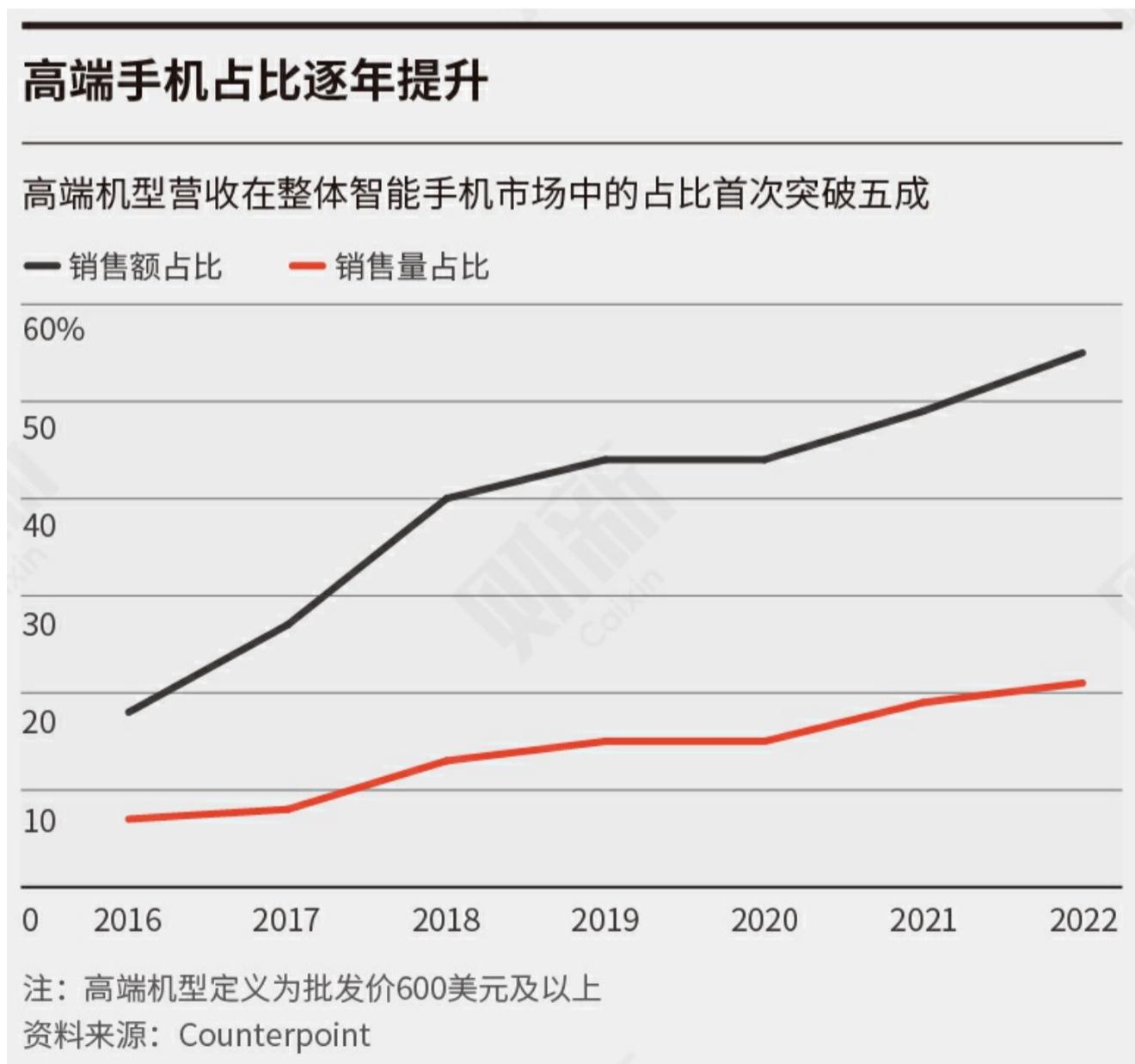
高通早就意识到，终有一天会失去苹果。2021年11月，高通在投资者大会上称，苹果2023年的iPhone产品中，仅有20%继续使用高通基带芯片。2022年5月，安蒙曾对财新称，公司对未来增长的整体预期，已纳入苹果切换自研基带芯片的风险考量。按当时预期，苹果相关营收占比将降低至个位数。“这更多是苹果的问题。”他当时说，“如果苹果决定继续和我们合作，只是我们整体预期上的增量。”

几个月后，高通等来戏剧性反转。2022年11月，高通在财报会上表示，苹果2023年绝大部分iPhone产品将继续使用高通5G基带。不过，高通对苹果业务规划设想没有变化，即2025财年（截至2025年9月末）相关业务将贡献极小的营收。这种假定更多是为了财务预测，而不是确认其他公司的产品规划。安蒙对财新强调，没有对2024年的供货情况作任何预测。

Sravan Kundojjala对此分析认为，苹果确实可能在2024年切换成自研基带芯片，不过也可能出现类似2023年的情况，高通仍保留继续对苹果供货的可能。高通从苹果获得的收入分为专利授权和芯片销售，其中芯片销售收入占比65% 70%，这部分收入恐将随着苹果切向自研基带而逐步丢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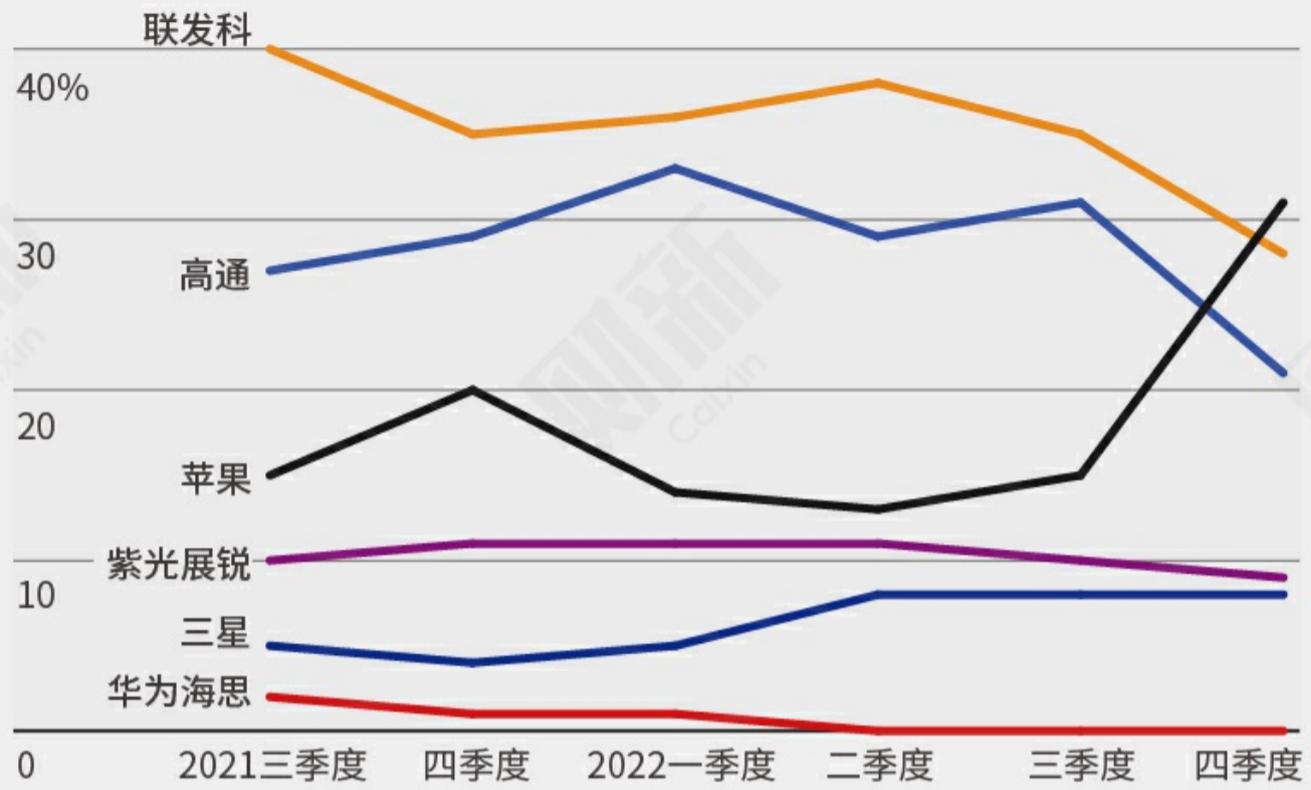
除了即将“掉落”的苹果，另一客户华为亦面临不确定性。华为高端手机原本采用自研的麒麟芯片，一度问鼎全球第二大手机厂商，但受限于美国出口管制，自研芯片无法流片，只能转向高通购买4G芯片。2023年以来，美国部分议员主张禁止向华为供应任何产品。不过，高通技术许可业务总裁罗杰士（Alex Rogers）曾在2023年2月的业绩会上回应称，公司尚未从美国商务部获知相关情况，且高通已获得政府发放的向华为供应4G和Wi-Fi等其他芯片的许可，这些许可还会持续数年。据TechInsights估算，2022年，高通与华为相关的营收超过10亿美元。

更大的麻烦还在于，苹果、华为自研芯片带来的成功，让OPPO、小米、vivo等一批意欲突破高端市场的中国手机厂商纷纷效仿，均从辅助芯片起步下场造芯。以OPPO为例，其已自研一款影像芯片和一款蓝牙音频芯片。多名了解OPPO造芯计划的人士告诉财新，OPPO的最终目标是掌握自研手机SoC（系统级芯片）能力。



手机芯片战事胶着

联发科在中低端市场突进，高通开始反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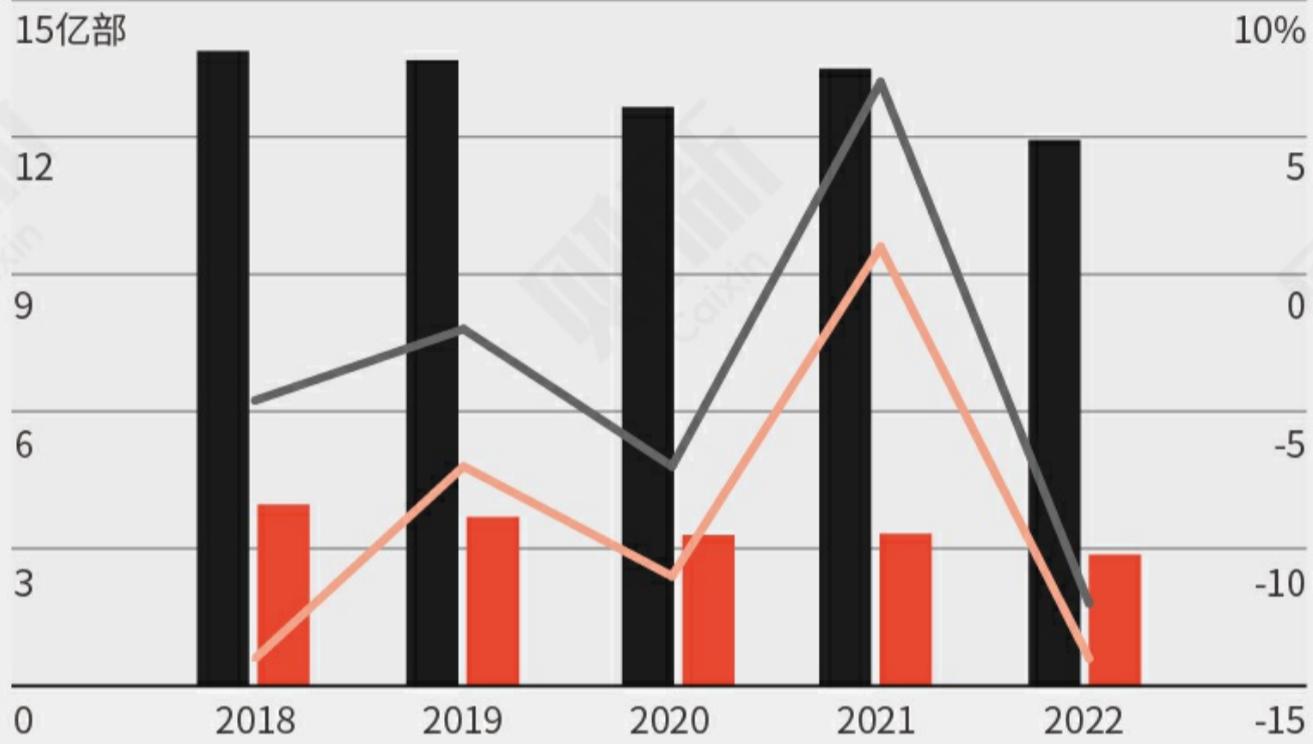


资料来源：Counterpoint

智能手机市场出货量加速下滑

2022年，全球智能手机市场出货量同比下滑12%；其中，中国市场下滑14%

■ 中国市场出货量 — 同比增减(右轴) ■ 全球市场出货量 — 同比增减(右轴)



资料来源: Canalsys

“国内厂商的自研芯片能否真正跑出来尚存不确定性，即便能成功亦需要很长时间。这部分的潜在影响，远不如失去苹果订单的威胁大。”Counterpoint研究副总监Ethan Qi对财新称，“高通的挑战在于能否不断创新、提升自己的性能。如果高通的芯片性能不如苹果，无法帮助安卓厂商抵挡苹果扩张，安卓厂商才会激进自研SoC。”

苹果正不断在高端市场挤压安卓阵营的份额。Counterpoint数据显示，2022年，全球600美元及以上价位的手机营收在整体大盘中的占比达到55%，iPhone在上述价位销售量份额达到75%，较2021年提升了4个百分点。

“我们已经看到并且始终相信这个趋势：当消费者购买下一个终端时，他们会希望拥有更好的。高端和旗舰市场增速始终快于低端市场。”安蒙说。他还曾在2022年5月对财新称，高通的策略是100%专注于推动安卓旗舰和高端设备的创新：“对我们来说，最大的增长点之一是处理器，而非基带芯片。”

竞争对手猛追

高通在手机芯片领域建立了完整的高、中、低产品系列，常踞手机芯片市场龙头位置。不过，疫情这三年，其竞争对手联发科争抢OPPO、vivo、小米等大客户愈发猛烈，不仅在中低端市场扩大份额优势，还尝试在高通的腹地高端市场打开切口。

Counterpoint数据显示，联发科在2020年三季度手机芯片出货量超过高通，之后逐步扩大市场份额，市占率一度在2021年二季度达到42%，领先高通约16个百分点。高通随后收复部分失地，两者市占率差距在2022年三季度缩小至4个百分点，但四季度又拉大至7个百分点。

安蒙曾在2021年6月接受财新采访时解释，公司更聚焦于高端领域，而竞争对手则更善于把握其他领域的机会，从而获得了更大的出货量。

一名半导体分析师则对财新介绍，缺芯风暴中，高通起初采用了三星代工部分芯片，并于2020年12月发布了应用三星5纳米工艺的旗舰5G SoC“骁龙888”，但三星良率未及预期，拖累产品出货，高通再向台积电追加产能也不容易，只得优先保障高端和旗舰产品产能；联发科则坚持台积电代工，并受益于后者较高的良率，供应情况好于高通。

联发科亦部分把握住了[华为海思](#)让出的市场。2020年二季度，美国升级对华为制裁，含有美国技术的晶圆代工企业无法再为海思进行生产，直接制约华为手机出货。这部分市场被苹果、OPPO、小米、vivo等厂商瓜分，联发科亦抓住了其中的商机。

Counterpoint数据显示，2020年二季度，海思智能手机处理器出货量的占有率为16%，仅次于高通和联发科，但一年后就仅剩3%。2022年二季度起，海思份额已几近归零。

一名手机芯片分析师曾在2021年中对财新坦言，联发科出货量份额的增长，主要受益于海思退出和高通放弃部分中低端市场，“几乎是送分题”。一名联发科中层人士此前亦称，联发科天玑800系列产品抢占了大量中端市场份额，性价比优势和对手缺货带来的意外优势，一同成全了该系产品。

上述国内手机行业资深人士坦言，他对联发科出货量反超高通并不意外。“高通是搞研发的思维，联发科是做生意的思维，风格明显不同。”该人士对财新形容称，高通天然希望将最先进的技术“全部砸上去”，而联发科的产品不是最高端，技术也非最先进，却最懂得匹配客户需求，理解“门当户对”。

他以价格举例称，目前，单看芯片价格，联发科仅略低于高通，但联发科深谙客户产品开发的完整需求，为手机厂商带来包括缩短产品开发流程、减少投入工程师数量等在内的综合性价比优势。

联发科近期产品在技术上与高通的差距正明显缩小。上述人士称，2019年，高通原本凭5G先发优势挡住过联发科的攻势，但此后却遇到骁龙888芯片过热等问题，给了联发科缩小差距的机会。

天玑9000系列是联发科布局高端市场的关键。2021年11月，联发科发布旗舰芯片“天玑9000”，剑指此前由高通统治的安卓旗舰市场，并将营销重点放在良好的发热控制表现上，直戳对手“过热”的软肋。联发科副总经理徐敬全当时对财新称，在出货份额已达四成的情况下，公司下一步策略重心是在高端市场有所斩获。

Ethan Qi认为，如今，在高端市场，不考虑基带，单从处理器性能跑分来看，联发科与高通已经差距不大；从成本考虑，两者目前的旗舰产品都采用台积电的4纳米工艺，而前者的价格优势并不显著。但在品牌层面，高通芯片还是旗舰机型的标配，联发科的品牌要弱一些，改变消费者长期形成的固有印象需要时间。

上述国内手机行业资深人士亦称，海外市场对高通的认可度还是比联发科高，“同一型号的手机，有高通、联发科、展锐三个配置，海外顾客很可能还是会买高通那款，哪怕要贵一些。”整体来看，高通在高端市场仍领先，不过其200美元价位段的中低端市场份额在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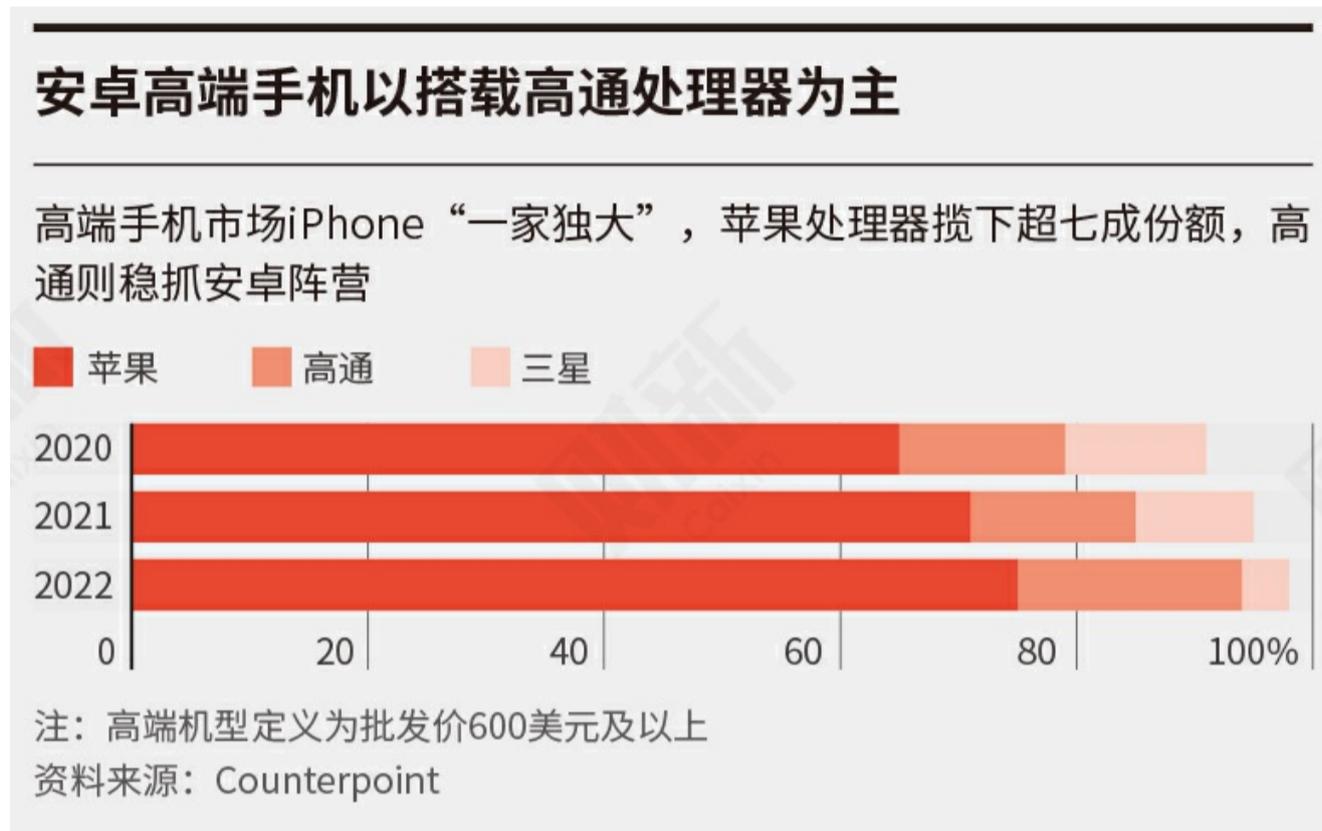
TechInsights的数据显示，2022年四季度，以营收计，高通在手机处理器市场的份额为36%，领先联发科13个百分点。“如果不看数量而是价值份额，我们从未失去过第一。”安蒙说。

高通试图反击中低端市场。针对缺芯风暴中供应受限的问题，高通启用多源产能供应方式，重新开始将部分产

品交由台积电代工，并为适应不同晶圆产线而重新设计产品。其2021年5月推出的面向中端市场的“骁龙778G”芯片，即为该策略下量产的首款芯片。

骁龙778G的首发给了刚与华为“分家”的荣耀，高通在帮助荣耀打消外部供应链顾虑的同时，也赢得了一个大客户。2021年6月，荣耀中端机型“荣耀50”发布，之后供应链迅速理顺，产品节奏恢复，出货量拉升。据Canalys数据，2022年，荣耀在中国市场份额达18%，位列第二。因基数较低，其出货量同比增长30%至5220万部，是唯一2022年收获正增长的主流安卓厂商。

高端产品方面，高通亦将旗舰产品重回台积电代工。2022年5月，高通发布采用台积电4纳米工艺的第一代骁龙8+产品，在性能大幅提升的情况下，还顺利摆脱从骁龙888开始持续困扰公司一年多的发热难题。高通2022年11月发布的第二代骁龙8处理器，亦由台积电代工，并在性能、功耗等方面延续了良好口碑。



高通还将老款旗舰产品能力“下放”，力图在中端市场更多斩获。2023年3月发布面向中端市场的第二代骁龙7+芯片，称其CPU（中央处理器）性能较前代提升超过50%，GPU性能提升2倍。该产品采用了与前代旗舰级产品骁龙8+相同的工艺。

在安蒙看来，目前，面向中低端市场，以往高通供给受限的问题已经解决，产品重回客户的整体产品路线图；在高端市场，公司进行的大量创新、投入在结果上已有所体现，例证包括三星最新发布的Galaxy S23旗舰系列手机，在全球所有市场均采用高通芯片。“我们在和三星的合作中，实现了相关领域份额的绝对增长。”他说。

Counterpoint数据显示，2022年，全球600美元及以上价位段手机的芯片中，凭iPhone“一家独大”的苹果占比达75%。高通则紧抓安卓阵营，份额由14%升至19%。三星位列第三，份额为4%。

未来在多端融合

手机芯片一直是高通支柱业务，2022财年贡献近六成营收。然而，手机市场在过去一年陷入低迷，未来亦难言乐观。Canalys数据显示，2022年，全球智能手机市场出货量同比下降12%。该机构分析师朱嘉弢预期，2023年全球智能手机市场将继续下滑1%左右。

“手机市场已经非常成熟，在几乎每个人都已经拥有手机的情况下，这个市场会随着经济环境而上下波动。”安蒙称，宏观经济环境对高通消费级业务产生了复杂的不利影响，但另一方面，包括汽车在内的其他业务则延续了增长趋势。

2023财年第一季度，高通手机芯片业务营收同比下降18%至57.54亿美元，而车用芯片业务实现了4.56亿美元营收，同比增长58%。安蒙称，目前高通汽车业务订单总估值已增长至300亿美元，随着采用高通技术的新车陆续发布，上述订单将转化为营收。

早在2002年，高通就开始向车企提供车载网联解决方案，但“上车”并没有成为公司的重点业务。近年来，随着汽车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趋势日渐明确，芯片大厂开始竞逐这片未来市场，比如英特尔就在2017年以153亿美元收购了以色列自动驾驶技术公司Mobileye，借此闯入汽车芯片市场。

高通曾在2016年宣布以380亿美元收购荷兰汽车芯片厂商恩智浦，却未能等来中国监管机构一纸批文，吞下失

败苦果。此后，高通转向依托移动芯片的技术底座，从通讯、娱乐等角度切入汽车市场。其优势在于，产品可由手机芯片上积累的技术延伸而来，无需从零开始。

2016年，在前代产品试水的基础上，高通发布第二代智能座舱芯片骁龙820A，搅动座舱芯片市场格局。该芯片采用14纳米工艺，集成诸多针对汽车场景的功能，与德州仪器、恩智浦、瑞萨电子等传统汽车芯片厂商的同类产品相比，制程更先进，性能更突出，成功进入了本田、路虎、奥迪、小鹏、理想、福特、极氪等众多车企供应链。

高通趁热打铁，在2019年推出骁龙8155座舱芯片，工艺提升至7纳米，一经推出便迅速成为众多高端智能汽车的首选，奠定了高通在智能座舱芯片市场的领跑地位。

座舱芯片之外，高通还在2020年初推出ADAS（高级辅助驾驶）平台Snapdragon Ride，与英特尔旗下的Mobileye、英伟达等展开竞争。2021年8月，高通宣布以46亿美元收购瑞典自动驾驶技术公司Veoneer，强化在ADAS和自动驾驶领域的布局。

高通还试图将许多前沿通讯技术同步延伸至车用场景。“汽车开始连网，车企特别关注卫星通讯。目前，许多客户与我们合作，将卫星通讯整合到汽车当中。”谈及这个刚被部分新款旗舰手机纳为新卖点的功能，安蒙介绍称，“比如当汽车发生事故，无论此时是否有地面（信号）覆盖，汽车公司都希望知道安全气囊是何时弹出的。”

除了“上车”，高通还认定手机与PC融合是未来趋势。2016年高通试图联合微软切入PC市场，但未获成功。2021年3月，高通以14亿美元收购以CPU设计见长的初创企业Nuvia，希望借此打造媲美苹果M系列产品的PC芯片。该笔收购立竿见影，高通在当年末就宣布再战PC市场，新一代产品即由Nuvia团队设计。

不过，这一目标正面临芯片架构企业Arm的挑战。2022年8月，Arm以高通违反授权许可协议及商标侵权为由，与高通对簿公堂。双方争执焦点在于，Arm认为高通收购Nuvia时未获Arm同意，不能将Nuvia基于Arm架构设计的定制化处理器核直接用在高通产品上；高通则称，无论依据合同法还是其他法律，Arm都无权对高通或Nuvia的创新活动加以干涉。目前，双方诉讼仍在进行中。

高通在2022年11月宣布，其PC芯片将在2023年交付客户。近段时间，更有市场传闻称，一家头部PC大厂已确认，将在2024年发布搭载高通芯片的笔记本电脑产品。“不止一家，而是很多家。”被问及上述传闻，安蒙称，高通目前不仅与几乎所有的PC厂商在合作，还在与有意切入PC领域的手机厂商合作。

2023财年第一季度，高通非手机芯片业务营收同比增长15%，为21.38亿美元，在芯片销售收入中的占比由上一财年同期的21%提升至27%。对于未来非手机业务的营收占比，安蒙不愿具体预测，仅称这一占比会随着时间推移进一步提升。

安蒙称，公司最初面向智能手机开发的这些技术，如今正变得与千行百业息息相关，从而推动公司多元化策略的执行。但高通是一家有着“移动DNA”的企业，将始终专注于移动技术，而驱动新一轮换机周期的或许是人工智能（AI）。

2022年11月，OpenAI公司发布聊天机器人ChatGPT，掀起新一轮猛烈的AI热潮。谈及这一火爆概念，安蒙称，通过这些大型语言模型，人们有能力去拥有非常复杂的人工智能，并开始有了像ChatGPT这样与语境相关的对话，这将改变用户的使用体验。

用户会开始频繁与手机、电脑、汽车等进行对话，每一次的提问都需要运行模型。“ChatGPT将仅仅是这场大变革的开端。”安蒙说，“但有趣的是，如果100%依赖数据中心，就不能有效做到这一点，这太昂贵了。”他认为，下一代人工智能将需要在边缘侧运行。

2023年世界移动通信大会期间，高通展示了其在安卓手机终端侧运行Stable Diffusion模型的能力。Stable Diffusion是一个流行的基础生成式AI模型，能够基于文本输入来创作图像。该模型参数超过10亿，此前主要限于在云端运行。

谈及模型可以在本地运行的好处，安蒙以电脑举例称，这些设备中会存有企业或个人不希望上传至云端的数据。“比如，你要用你所有E-mail来训练模型，让它知道你们之前的对话内容。当你收到下一封邮件时，它已了解上下文语境，可以帮你写回信的草稿。”他说，“你也许不介意这些邮件信息上传至云端，但也许会介意。”

他认为，随着这些模型日益成熟，消费者或会因为这些AI能力而选择升级手机，从而有望驱动新一轮换机周期。“这在2024年、2025年可能成为一个有趣的趋势。”他说。

专栏 | 完善监管才能防止银行危机再现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第17期 出版日期 2023年05月01日

管理层失职、存款人恐慌、监管失职、宏观政策转向过快，共同导致了硅谷银行危机，防止危机再现惟一可行的办法是更有效的银行监管



美国加州旧金山，第一共和银行。临近4月末，第一共和银行再度遭遇股价大跌。图：Justin Sullivan/视觉中国

文 巴里·艾肯格林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经济学教授

临近4月末，第一共和银行再度遭遇股价大跌。3月美国中小银行危机爆发时，市场上有过许多分析，但这些基于仍不完整信息的早期评估，质量不高。正如英国政治家、探险家沃尔特·雷利（Walter Raleigh）所言，那些紧跟历史脚步的人可能会被踢掉牙齿。

一个月后，关于这场危机为何发生，大致可以归纳为四方面因素。

第一种因素是管理层失职。硅谷银行的最高管理层擅长与科技公司打交道，但在投资决策上并不谨慎。令人惊讶的是，在2022年大部分时间里，拥有约2000亿美元资产的硅谷银行居然没有首席风险官。在其他银行管理者已经重回办公室工作后，居家办公仍是硅谷银行主要管理人员的常态，而且这些管理者还分布在从夏威夷到美国东海岸的六个时区里。任何有过居家办公经验的人都知道，这种安排不利于解决一些难题。

因此，当银行存款飙升时，硅谷银行的管理者们采取了简单的方法——大量买入美国国债，并且出于节省成本的考虑，绝大部分债券未对冲利率风险敞口。

第二种因素是客户过于恐慌。硅谷银行的企业客户存款远远超过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规定的每个账户25万美元的保险上限。如果企业在现金管理上比较审慎，如此大规模的存款余额应存放在资产负债表最强劲的大型银行或货币市场基金中。更糟糕的是，在意识到企业存款属于无保险存款后，硅谷银行的客户极度恐慌，争相提取资金，这种恐慌在社交媒体上像野火一样蔓延开来。

第三种因素是监管者不称职。硅谷银行首席执行官（CEO）格雷格·贝克尔曾是旧金山联储董事会成员，危机发生后才离任。硅谷银行的存款规模在五年内增长了400%，使得可贷资金超出了其支配能力范围。对监管来说，这不啻于在一头斗牛面前挥舞红布。但是，2021年以来，美联储只警告过硅谷银行这是“需要关注的事项”，美联储的压力测试也并未涉及通胀和利率大幅上升的情境。

此外，这场危机还与宏观政策转向有关。长期的低利率政策会激励像硅谷银行这样的银行大量购买长期债券，以提高收益率。最终，联邦政府不计后果的增加赤字不可避免地带来价格飙升，通胀高企迫使美联储快速加息，导致债券价格暴跌，给包括银行在内的债券持有人造成损失。

看起来这场银行危机的爆发，有点像阿加莎·克里斯蒂在《东方快车谋杀案》中的结论：每个人在谋杀案中都是帮凶。问题是，现在该怎么办？

我们可以选择更好的银行管理层，但总会有缺乏经验的银行管理者，以及无法提供有效监督的董事会成员。眼下可以通过立法允许收回支付给破产银行管理者的奖金。

我们也可以设法更好地培训存款人，但相比大多数人，硅谷银行的客户受过更好的教育。不仅仅是高科技企业家，银行客户通常都有其他事务需要优先考虑。硅谷银行的破产确实敲响了警钟，但历史告诉我们，总有一天储户

会再次丧失警觉。存款人施加的压力和财务纪律可以抑制银行过度承担风险的想法是一种幻想：典型的存款人并不是信用分析师。

同样，我们也可以完善宏观政策调整机制。但是，现在认为此前财政政策大幅扩张和美联储快速加息诱发了3月银行业危机的人，是事后诸葛亮。没有人认为旨在维持低通胀和高就业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应该屈从于对金融稳定的惟一追求。

因此，惟一可行的解决办法是更有效的银行监管。一些人认为监管机构不能被信任，监管永远不会有效，并将硅谷银行作为一个例子。这种愤世嫉俗的观点实际上是一种绝望之下的自我安慰。只要银行仍然存在，银行倒闭就会存在。鉴于这一现实，我们需要监管机构从硅谷银行的破产中吸取教训，将其中暴露的问题纳入监管考量及程序，筑牢监管防线。□

更多报道详见：[【专题】硅谷银行危机](#)

版面编辑：刘春辉

回溯 | 一周回溯 (《财新周刊》2023年第17期)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第17期 出版日期 2023年05月01日

开卷 | FIRST PAGES

一周回溯

4月21日,二十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审议通过了《关于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意见》《关于加强和改进国有经济管理有力支持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意见》《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等。

4月23日,国务院以“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为主题,进行第一次专题学习。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王昌林作专题讲座。

4月25日,自然资源部表示,不动产统一登记改革实施十年来,全国累计颁发不动产权证书7.9亿多本,全面实现不动产统一登记。

4月22日,2027年世界田径锦标赛申办城市征集工作完成,仅北京市申请并满足征集条件。目前北京正全力以赴投入2027年田径世锦赛申办工作。

4月20日,总部位于上海的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宣布,银行首次发行以美元计价的绿色债券,规模为12.5亿美元的3年期绿色债券。

4月21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原副总经理刘逖涉嫌严重职务违法,目前正在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证监会纪检监察组和浙江省台州市纪委监委调查。

4月2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消息,台湾地区犯罪嫌疑人杨智渊因涉嫌分裂国家罪被批准逮捕,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4月27日,浙江省委原常委、杭州市委原书记周江勇受贿案一审开庭,检方指控周江勇非法收受财物折合人民币1.93亿余元。

4月24日,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接受70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4月20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孙卫东奉命就韩国领导人涉台湾问题错误言论向韩国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

4月29日起,所有来华人员可以登机前48小时内抗原检测代替核酸检测,航空公司不再查验登机前检测证明。

4月24日,英国航空恢复伦敦希思罗机场至上海浦东机场的往返客运航班,这是时隔近三年后英国航司在中国内地恢复的首条航线。

4月21日,30年期国债期货在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上市交易。

4月22日,第十三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开幕,全面恢复线下举办,共有93个国家和地区的1488部影片报名参赛。

4月21日,国务院安委会决定,对北京长峰医院已造成29人死亡的重大火灾事故查处实行挂牌督办。

4月26日,习近平应约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双方就中乌关系和乌克兰危机交换了意见。

4月25日,美国总统约瑟夫·拜登宣布将参加2024年总统竞选,寻求连任。当天也是拜登2019年宣布参加2020年总统选举四周年纪念日。



4月24日,孟加拉国新总理穆罕默德·谢哈布丁·楚普宣誓就职,任期五年。谢哈布丁出生于1949年,曾担任过法官。

4月21日,英国副首相兼司法大臣多米尼克·拉布因欺凌多名公务员的指控被迫辞职。首相苏纳克因在回复副首相的辞职信时对其大加赞扬,正面临质疑。



4月19日,新组成的古巴第十届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举行会议和投票,迪亚斯-卡内尔以97.66%的选票再次当选古巴国家主席,任期5年。



4月24日,韩国总统尹锡悦赴美展开对美国为期七天的国事访问,将同美国总统拜登会晤、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等。

4月23日,日本国会众参两院补缺选举举行,执政的自民党获得4个议席,在野的日本维新会获得1个议席。

4月24日,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瑞典宣布,欧盟理事会已通过对伊朗个人和实体实施第七轮制裁的决议。

4月24日,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公告,根据联合国预估,印度于4月成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总人口达14.258亿,并将继续增加。



4月23日,由于经营难以为继,已有52年历史的美国万能卫浴寝具公司(也称3B公司)向法院提交破产保护申请,并启动清仓销售程序以便偿债。



4月17日至21日,2023年德国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举办,主题为“工业转型-创造不同”,绿色氢能(简称绿氢)新技术、新产品成为各方关注焦点。

版面编辑:刘春辉

前瞻 | 土耳其震后举行大选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第17期 出版日期 2023年05月01日

文 财新周刊 侯吴婷

5月14日，土耳其将举行总统和议会选举。迄今在该国掌权二十载、现年68岁的现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将寻求连任。其主要对手将是来自中左翼、主张政教分离的主要反对党——共和人民党的党魁奎里达欧鲁。

就民众支持度而言，两位总统候选人平分秋色，竞争将非常激烈。根据土耳其研究机构Metropoll近期民调，42.6%的受访者表示将会在第一轮投票中投票给奎里达欧鲁，41.1%选择了埃尔多安，另外两位候选人获得了7.2%的支持。

今年3月初，在经过数月的协商后，在野的五个较小政党与主要在野党共和人民党组成联盟“六方之桌”（Table of Six），共同支持奎里达欧鲁。

外界评价，在自2018年来持续的高通胀及土耳其货币里拉危机和今年2月初的毁灭性震灾后，埃尔多安面临着其执政以来最艰难的一次竞选。今年2月6日，土耳其中南部、叙利亚西北部突发的7.8级大地震后，埃尔多安政府被指灾后救援反应速度过慢，对建筑安全要求执法不力，支持率有所下滑。截至当地时间4月22日，根据土耳其内政部信息，地震已致该国5.0783万人遇难。

4月11日，埃尔多安开启其竞选活动，承诺政府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的首要任务为恢复被地震毁坏城市，将把为幸存者建造65万所房屋为目标，其中，31.9万所房屋将在一年内建成。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地震对土耳其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预计达342亿美元，但重建所需资金或为其2倍。

土耳其智库经济与外交政策研究中心（EDAM）秘书长乌斯顿此前在接受财新采访时表示，经济是土耳其人民最关注的选项，而震后出现的大量境内流离失所者会面临失业、住房等问题。这对原本便饱受高通胀之苦的土耳其民众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

去年10月，土耳其通胀率高达85.51%，刷新24年来最高水平；今年3月，土耳其通胀率回落至50.51%。

在外交方面，尽管土耳其多年来与部分周边国家关系一度紧张，但近期持续采取措施，以修补与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叙利亚的关系。此外，在俄乌冲突上，埃尔多安表示，土耳其可与冲突双方进行谈判，以在粮食走廊、战俘交换等方面取得具体进展。

2003年至2014年，在土耳其仍实施议会制时，埃尔多安曾担任过三届总理。

2014年8月，在土耳其史上首次举行的总统直选中，埃尔多安成功当选总统。2017年，埃尔多安发动修宪公投，将土耳其当时采用的议会制改为总统制。在2018年土耳其改行总统制后的首次大选中，埃尔多安成功胜选连任，并由此成为集中了大部分行政权力的土耳其总统。奎里达欧鲁表示，若其当选，他将会让土耳其回归议会制。

□

版面编辑：刘春辉

国风 | 广交会上看供应链转移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第17期 出版日期 2023年05月01日



2023年4月15日，广东广州，采购商在广交会展馆了解智能家用电器。4月17日，中国机电进出口商会副会长石永红告诉财新，诸多企业正将商品制造终端环节转移到东南亚，因此中国向东南亚大量出口中间产品，即各种零部件。图：中新社 陈楚红/视觉中国

文 财新周刊 王婧 翟少辉，傅文迪（实习）

王鹏（化名）是水龙头外贸销售业务员。在第133届广交会现场，他发现部分外商的需求，从购买整个水龙头变成了购买水龙头的零部件。4月18日，他向财新展示的一份客户购买意向登记表显示，一名印度客户要购买不锈钢管，一名卡塔尔客户要购买壳体管。

“一名巴西采购商告诉我，进口整个水龙头要缴纳40%的关税，但如果是购买零部件回国后组装，只需要缴纳20%的关税。”王鹏说，土耳其等多个中东国家客户都反映类似情况。

外商采购零部件是外贸领域新动向。在广交会的家电展区，[中山东菱威力电器有限公司](#)微波炉事业部的海外营销经理张洲说，多名南美客户下单零部件，“他们买我们的家电产品，我们给他们全部拆开，做成散件包装。他们买回去后再按照之前的设计，原封不动装回去”。这些南美客户在当地有自己的组装线。

据财新了解，当前外商采购零部件回国组装，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为了节省关税，以南美和中东为代表；另一种是产能向海外转移，以东南亚为代表。这两种情况都意味着组装工厂在当地崛起，然而由于供应链不够完善，诸多零部件需要从中国进口。

[浙江格亚电气有限公司](#)主要出售配电开关控制设备等工业产品，欧洲、美洲和中东是其主要市场。“中东客商购买成品越来越少，都是来买零部件。”该公司负责人钱乐丹说。据她测算，成品附加值大约比零部件高出15%，其中包括组装部分的人工费、检测费、包装费等，若销售以零部件形式进行，利润会下降5%。

[浙江东亚工具有限公司](#)面向欧美和中东销售钻头和钉枪。“大量中东客户是购买零配件，然后让我们教他们如何组装。”该公司销售总监蔡晓艳说，此外不少国内同行在泰国和越南投资设厂，亦是从中国采购原材料再在当地组装。

4月17日，中国机电进出口商会副会长石永红告诉财新，诸多企业正将商品制造终端环节转移到东南亚，因此中国向东南亚大量出口中间产品，即各种零部件。他解释说，东南亚人工成本较低，企业将部分制造环节转移过去，是经济规律使然；另一方面，欧美等国采购商出于供应链安全等各种考虑，不会只在中国下订单，中国企业必须“走出去”。

石永红调研过一些机械和家电企业。这些企业反映，当前欧美国家采购商通常会事先考察供应商是否有设在中国之外的备用工厂，作为下单前提条件之一，企业就不得不考虑在周边国家设点。石永红称，这些企业以中小企业为主，因为“大企业早就实现全球布局了”。

“中国企业的供应链体系将发生变化，形成本土供应链加上境外供应链的‘双链并举’格局。”在4月16日举办的“中国-非洲西亚经贸合作新机遇论坛”上，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副院长曲建说。据曲建介绍，中国企业启动了新一轮产业转移，转出地主要是东部沿海的中心城市和工业强市，除了向内地转移，境外转入地主要是东盟、东亚、南亚、非洲、中东和南美。

版面编辑：刘春辉

心智 | 正视焦虑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第17期 出版日期 2023年05月01日



插画 | 董必奇

文 猫柳
安人心智特约作者

焦虑是心理学家和精神医生眼中心理治疗的阿喀琉斯之踵。弗洛伊德认为，焦虑与童年、性等这些生物性因素有关，但他的徒孙卡伦·霍妮旗帜鲜明地反对 祖师爷说得不算错，但是他没说到点子上，焦虑（神经症、心理冲突）必须置于社会文化背景中谈论才有意义。

神经症是精神分析学家常常提及的一个词，现代医学早已将之弃用，取而代之的是关于心理冲突的研究。但是，早期精神分析学派大师关于人格的观点，对于我们理解人性依然有独特的启示。

在霍妮时代，很多人随意使用“神经症”，如同现代人随便骂人“神经病”，意在表达他人的反应不同于一般人的反应。例如，一女孩安于现状，拒绝接受加薪，也不希望跟她的上司保持协调一致，这就会被人视为患上“神经症”。这个判断暗含了一个默认假设，即人行为中存在一个正常的标准。

谁来规定这个“正常”？谁有权利说某人的行为僭越了“正常”的范畴？

霍妮批评这些随便定义自己是正常、他人是“神经症”的人：“我们之所以会称这些人为神经症患者，其原因在于我们大多数人都熟悉，而且只熟悉一种行为模式，那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出人头地、超越他人、赚比满足基本生存需要多得多的钱。”

所谓的正常，不仅因文化不同而不同，而且在同一种文化中，也会因世易时移而发生改变。例如，前面的例子放在古希腊时期，在超出自己需要之外还拼命工作的态度，就被视为下贱。

所以，霍妮重新定义神经症。她认为神经症有三个典型特征：1.反应的僵化；2.潜能与实际成就之间的差距；3.冲突倾向的存在。

反应的僵化，指的是缺乏一种灵活性，我们可以对不同的情境作出不同的反应。例如，正常人感到事有可疑才会感到怀疑，但神经症患者可能随时随地都会疑虑重重。当僵化偏离了文化模式时，才会成为神经症的表现。

第二个特征“潜能与实际成就之间的差距”，指的是觉得自己就是自己的绊脚石。例如，一个人极具天赋，外在环境也利于他发展，他却毫无建树；一个人拥有让自己幸福的资本，却不能享受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或者一个女人十分漂亮，却仍觉得自己不能吸引男性注意，这些就是神经症的表现。

神经症还有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存在各种心理冲突，且患者可能不知道这些冲突的存在，并会自发地对这些冲突加以调节、解决。但是，这些特征都只是神经症的表象，霍妮认为，在探讨神经症的形成动力后，“存在着一种一切神经症所共有的基本因素，这就是焦虑，以及被建立起来对抗这些焦虑的各种防御机制”。那么，焦虑又是什么？焦虑与恐惧很相似，都有心跳加速、立即想逃避的生理或行为表现，霍妮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中，对这两种情绪作了区分，认为恐惧与焦虑都是对危险作出的恰当反应，但是在恐惧的情况下，危险是显而易见、客观存在的，而在焦虑的情况下，危险则是隐藏的、主观性的。

我们宁愿忍受痛苦，也希望逃避焦虑。因为焦虑会带来两种让人讨厌的感受：无助感与非理性。

为了逃避焦虑，大多数人会采取四种方法：1.把焦虑合理化；2.否认焦虑；3.麻痹焦虑；4.避免一切可能导致焦

虑的思想、情感、冲动以及情境。

这样做的目的是出于自我保护，可一旦这么做，就阻碍了“对于那些真正激发我们的态度与行为的力量的理解”。

什么是焦虑合理化？它指的是将焦虑转化为一种合理的恐惧。例如一位母亲过分操心孩子在幼儿园会遇到危险，如同我们会在想象中夸大失业的悲惨。

否认焦虑，即是将焦虑排除在意识之外，就像喝醉的人不会承认自己喝醉了。这时可能会出现一些生理现象，如颤抖、出汗、心跳加速、窒息感、尿频、呕吐、腹泻以及心理方面的烦躁不安、无端冲动或无能为力的感觉。

第三种缓解焦虑的方法是麻痹焦虑，这是有意识地、不加掩饰地通过酒精或药物来达到麻痹的目的。也有其他方法，例如，因为害怕孤独，所以让自己投身于社会活动之中或者沉溺于工作之中。

第四种逃避焦虑的方式是，避免一切可能导致焦虑的情境、思想或情感。就像害怕社交的人回避社交，不想面对家人就在异乡漂泊。

一个人可能会意识到焦虑的存在，也可能意识不到，或者只是朦朦胧胧地感受到。但行为上，那些与焦虑有关的事情他会拖延，或者，“假装”不喜欢一些事情，并以此为理由躲避这些事情。例如，一个女孩害怕在聚会上被人忽视，就会让自己相信自己根本就不喜欢社交，从而避免参加聚会。

简而言之，焦虑可能隐藏在心跳过速、疲劳这样的生理不适感背后；也可能被一些看似合理或有根据的恐惧所掩盖；它也可能是驱使我们去酗酒，或者沉溺于各种娱乐消遣之中的潜在动力。如果你发现自己经常无力去做某些事情或无力享受一些事情，原因可能就是焦虑，或是因抑制焦虑而形成的防御行为。

治疗焦虑，我们需要先了解焦虑形成的原因，它比弗洛伊德所认为的更复杂。根据霍妮的思想，导致神经症产生的个人内心冲突，虽然不排除性压抑、遗传禀赋、童年经历等个人特征，但本质上却源于社会文化环境对个人施加的影响。只有了解这一点，我们才能真正缓解和治疗焦虑。

更多精彩内容请阅读：[【专题】心智](#)

版面编辑：刘春辉

天眼 | 撤离苏丹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第17期 出版日期 2023年05月01日



图 | Patrick T.Fallon/视觉中国

图 Patrick T.Fallon/视觉中国

当地时间2023年4月24日，肯尼亚内罗毕，从苏丹撤离回国的肯尼亚公民抵达机场。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15日在喀土穆爆发武装冲突，后迅速蔓延至其他各州。苏丹卫生部26日称，该国武装冲突已造成512人死亡，另有4193人受伤。据联合国难民署统计，已监测到近1.2万名来自苏丹的跨境难民。冲突爆发后，多国已启动撤侨行动。中国外交部官员表示，截至26日，已有包括香港特区居民在内的1100多名中国同胞从苏丹安全撤离。中国也是苏丹内部冲突爆发以来有组织撤离人员最多的国家。□

版面编辑：刘春辉

回声（《财新周刊》2023年第16期）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第17期 出版日期 2023年05月01日

细雨绵绵：地方债都到了“以债养债”的地步，如果救助，成本是全国分担。

[《地方债务财政纪律不能松》](#)

dukealex：过去为了经营城市搞扩张，土地财政亏钱也可以搞，现在不能继续了，要收缩保运转，抓好精细化管理和服务。

[《如何应对土地财政可能退潮的冲击》](#)

财新网友：作为零部件供应商担心错过风口，作为整车厂担心实力不足。

[《何为华为不造车？》](#)

财新网友：“时间银行”既不能应对人口老龄化之后的供需变化，又不能像货币一样实现合理的动态定价。

[《“时间银行”能否解开养老难题》](#)

思想暴徒：“时间银行”是在现金之外又创造了一种“货币”，本质上是劳动价值论的变种，反倒把问题复杂化了。

[《“时间银行”能否解开养老难题》](#)

版面编辑：刘春辉

读周刊看视频（《财新周刊》2023年第17期）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第17期 出版日期 2023年05月01日

4月20日，美国得克萨斯州，SpaceX“星舰”在升空后爆炸。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表示，团队将审查数据并努力进行下一次发射尝试 @《财新周刊》[《星舰首飞》](#)，相关视频：[马斯克：将从“星舰”首次发射中吸取经验](#)

以SHEIN、Temu为代表的中国电商在海外快速起量，但国际政治和监管环境挑战严峻 @《财新周刊》[《中国电商北美遇阻》](#)，相关视频：[亚马逊公布第二轮裁员计划 预计再裁9000人](#)

版面编辑：刘春辉

财新视听内容精选（《财新周刊》2023年第17期）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第17期 出版日期 2023年05月01日

【财新时间】国漫“奇谈”（上）

[“中国动画百年纪念之作”《中国奇谭》年初火爆全网，这是中国动画又一次转瞬即逝的高光，还是行业整体跃升的起点？](#)

【华尔街原声】

[花旗：美国可能将面临信贷收缩/大摩：银行收紧借贷是商业地产潜在下行风险](#)

【周五晚7点】

[中国经济意外指数创新高，市场为何意外](#)

【财新会员专享】

[走近巴洛克音乐巴赫与亨德尔作品欣赏](#)

【高端对话】风停出港：中国与世界经济复苏

[春华资本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CEO胡祖六和亚投行首席经济学家白乐夫共同探讨世界经济前景与挑战](#)

版面编辑：刘春辉

答疑（《财新周刊》2023年第17期）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第17期 出版日期 2023年05月01日

联系编辑部：邮箱 newsroom@caixin.com 或电话（010）8590 5000

广州读者 梦虎：

4月25日，中国全面实现不动产统一登记，这是否意味着房地产税的临近？

本刊产业新闻部：

个人住房在不动产中占比较大，又与居民切身利益相关，不动产统一登记出现风吹草动，市场都会解读为征收房地产税、调控房价的基础设施。

全国推行不动产统一登记已逾十年。不动产登记是通过登记公示保护当事人权利，也使第三人知晓物权变动情况。这是国际通行的基本物权制度，也是《民法典》提出的要求。不动产统一登记的核心功能和目的在于保障不动产交易安全，有效保护合法财产权，不是为了降房价。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特大城市经济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北京市房地产法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赵秀池认为，全面实现不动产统一登记为全面充分掌握房地产信息和科学决策提供了基础，也为征收存量房地产税提供了条件。但目前楼市低迷，还需更多利好政策促进楼市回暖。她认为，整体来看，目前房地产链条的整体税负并不轻，减免税收方能促进楼市良性循环发展、促进经济增长。

实际上，房地产税何时落地、试点城市范围多大、如何征收等问题一直未有明确的官方信息。2022年3月16日，财政部宣布年内不具备扩大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城市的条件。

上海房产律师郭韧称，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对于房地产长效调控有重大意义，但决定房价涨跌的仍是供求关系、居民预期等因素。

版面编辑：刘春辉

最新财新周刊 | 人流重现香港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第17期 出版日期 2023年05月01日

“旺丁”还要“旺财”

文 财新周刊 文思敏 王小青 发自香港

4月17日，中国香港与内地恢复通关100天，“东方之珠”正重新释放活力。

半年前空荡的香港国际机场变得人头攒动，[东方航空](#)的值机柜台前排起长队，前往上海、南京、杭州等各个城市的商务客带着订单归去；在中环海滨、迪士尼乐园，随处可见穿着时髦的内地“网红”，举着手机拍下港风大片；在湾仔，穿着西装、讲着普通话的商务人士，神色匆匆地奔向香港会展中心。

仅在这个4月，各种展会在香港轮番登场。据香港贸发局统计，“国际创科展”“香港春季电子产品展”和“香港国际春季灯饰展”，总共吸引超过6.6万名来自包括中国内地、东盟、日韩、美国等在内约160个国家和地区的买家。而从2022年底开始，香港特区政府密集推出发展Web 3（第三代互联网）领域的产业政策，吸引海外大量行业人士来港寻找机会，同期举办的香港Web 3嘉年华更一度成为城中热话。万向区块链实验室创始人、HashKey Group董事长肖风称，这场活动线下参与注册人数已突破1万。

“香港回来了”，正在成为现实。人流如织的背后，一方面是数年新冠疫情后，传统游客和商务人士重新回归，另一方面则是“新鲜血液”加入，包括虚拟资产行业人士，以及香港特区政府新推出的人才签证计划下，源源不断输入的内地人才。

无论是人流的存量抑或增量，都在同一时间涌入香港，用“热闹”“拥挤”来形容当下的香港一点不为过。自2022年底以来，因为疫后复常和产业支持政策，香港正在对周边区域出现人才的虹吸效应，但这股势能可以持续多久，尤其是在吸引海外人士方面能否有所建树，对香港而言中长期仍存不小挑战。

对于服务业主导的经济体发展，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就在截稿时，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刚结束对英国的访问，其此行目的就是向当地推介香港Web 3业务为金融业带来的新机遇，同时吸引海外人才，以及香港移民回流。

购物人群悄然生变

周末的铜锣湾街头摩肩接踵，商场内人潮不绝。开店不到两个小时，周大福的销售人员阿琳已接待了四五拨客人，大多是来自内地的游客。一对备婚的小夫妻更是大手笔购买了一对龙凤金手镯和一只钻戒，花费近10万元。阿琳笑言：“通关以后生意好了许多，最近金价上涨，不少人来港旅游时也会想着过来买几件金饰。”

“香港的黄金首饰款式更多、更时尚，质量有保证，而且价格对比内地便宜一点，疫情之前我来香港旅游也买了些黄金首饰，朋友们都觉得好看。”来自江苏南京的陈阿姨正在周大福选购黄金手镯，她这次计划花2万元购买金饰。

近期，周大福公布的2023年首季度销售数据，零售值同比增长14.2%，其中内地市场的零售额增速仅有9.6%；受惠于香港与内地边境口岸重开，香港及澳门的同店销售首季度大幅增加96.5%，其中香港增长154.6%，澳门则上升26.0%。

自1月初香港与内地全面通关以来，内地访港旅客大幅回升，3月18日，内地访港旅客单日突破10万人次。世邦魏理仕的报告显示，截至2023年3月底，单日入境旅客的七日移动平均数约8.6万人次，约为2017—2019年疫情前水平的50%，仍需一段时间才能恢复到疫情之前，但两个月以来旅客人数已经翻倍，增速较快。

香港旅游发展局总干事程鼎一表示，内地旅客在全面通关后上升，尤其经铁路来港方面；至于海外旅客，由于航空运力受限制，数字恢复稍显缓慢。从4月1日起，高铁香港段跨省长途班次重新恢复，每日列车班次将会由之前的102班增至164班，从香港可以直达北京西、上海虹桥、长沙南等66个站。

除了绝大多数为内地游客，香港街头近期也出现不少东南亚游客的面孔，尤以印度、泰国、印尼游客居多。旅客的快速回归，也带旺了零售行业。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数据显示，今年2月香港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为331亿港元，与2022年同比上升31.3%。前两个月零售业总销货额总计693亿港元，同比上升17.3%。从具体类别来看，一向受内地游客欢迎的商品类别，如“珠宝及钟表”“服装及配饰”和“药物及化妆品”的升幅最为亮眼，今年1、2月的零售额分别同比大升62.6%、46.4%及22.4%。

不过，今年前两个月的零售额录得大额升幅，也与2022年的比较基数低有关，当时香港正处于第五波疫情高峰期，本地消费也同样疲软。香港零售管理协会近期调研了4300间店及7.8万名员工，逾半受访者表示虽然3月生意录得较大升幅，仍远远未能恢复至疫前水平，有近五成受访者反映本地客购买力较2018年有所下降，但调研未统计游客的购买力。

尽管如此，香港商铺市场已重新活跃，药店及化妆品商户需求增加，抵消了口罩店退租一线街铺的影响。根据世邦魏理仕的数据，中环、铜锣湾、尖沙咀、旺角四大核心区的临街商铺截至3月底的空置率为14.9%，按季度环比减少0.5个百分点。其中，铜锣湾空置率按季减少1.3个百分点至13.2%；旺角空置率则按季减少0.5个百分点至16.6%，较低的空置率也让旺角区租金表现较其他地区更好。

昔日全球最贵地段铜锣湾罗素街近期签下一单租约，一家药妆店以每月80万港元的价格承租建筑面积约131平方米的商铺，与2019年首饰店施华洛世奇的续租价格一致，租金水平已经回到2019年的高位。世邦魏理仕商铺部资深董事兼主管温运强告诉财新，由于核心区街铺的租金较2019年年中高峰低大约40%，零售商正在考虑实体店扩张，因为内地旅客来港购买药品、化妆品以及品尝香港美食的需求较高，药房、化妆品、美容产品及餐饮业等旅游主导的行业租赁势头加快。

换言之，这也意味着香港在奢侈品牌销售的竞争力正日趋下降。随着中国内地整体消费水平上升，奢侈品牌转向更加重视内地市场，香港的优势已不再明显。“这次来香港我只购买了一些药妆，大牌的包包、衣服价格跟内地差不多，甚至更贵一些。”赵佐燕最近从上海来港旅游，原本计划要来看看大牌包包，却因差价不大而作罢。

她告诉财新，在上海的LV、香奈儿也能及时买到最新款的产品，如果在同一个销售人员那里下单，还有机会优先拿到限量款的包；相对而言，香港的价格优势不大，而且不能累计消费记录，回内地也有可能补缴税款，“香港买包已经没什么优势了”。

奢侈品店在香港的拓展已逐步收敛。世邦魏理仕香港区研究部主管陈锦平在接受财新访问时指出，从2014年起，中国内地的反腐行动对奢侈品消费产生影响，奢侈品店在香港的租金就逐渐回落，在疫情前部分奢侈品店铺便开始改变策略，逐渐将香港的部分店铺关闭，转而在中国二线、三线城市开店，“香港是一个700多万人口的城市，但奢侈品店密度较高，许多一线品牌在尖沙咀、中环、铜锣湾、机场等地均有品牌店，如果奢侈品牌转向内地开店，或许营收不如香港的店铺，但考虑到较低的租金，可能利润会更高”。

此外，随着海南免税区、海外代购等新兴渠道崛起，香港“购物天堂”的地位正在动摇，但对粤港澳大湾区居民而言，香港吸引力仍在。今年2月，麦肯锡针对大湾区内地城市富裕阶层的调研显示，约有85%的受访者表示购物和观光是他们来香港的主要目的，26%的人称访港是为了观看演唱会或表演。约有10% 15%的消费者表示，未来三年将会减少在香港的消费，转向海南免税店购买奢侈品，或是通过海外代购买化妆品、保健品。麦肯锡本次的调查亦显示，高质量的产品是大湾区居民来港购物的主要原因，但整体购物体验并非香港的强项，尤其是在支付环节的数字化体验不如内地城市。

“新势力”加入

2022年9月新加坡Token2049峰会上7000人的盛景，今年4月在香港重现。

4月12日 15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办的“2023香港Web 3嘉年华”，参会人数突破了1万，成为亚洲最大规模的Web 3活动。“不得不承认，香港比新加坡有活力。”一位从新加坡赶来香港参加Web 3嘉年华的行业人士小飞感慨道。

HashKey Group首席运营官Livio Weng向财新表示，香港是目前较少未对区块链行业采取过严厉监管行动的金融中心，加上香港特区政府的主政官员懂金融也懂行业，以及产业政策支持，接近中国内地的地缘优势，从2022年底开始，已经吸引了一批从业者从新加坡等回流。Hashkey Group旗下的Hashkey Pro是目前获香港证监会发牌的两家虚拟资产交易平台之一。

Livio Weng称：“近日在香港，我陆陆续续见了100多个人，大部分人都说，要不搬回香港，要不在香港设分公司。不过，一些持币很多的行业OG（Original Gangster，行业大佬）还留在新加坡，处于观望状态。”

区块链平台Neo创始人达鸿飞向财新表示，比起新加坡政府，香港特区政府明确表达了对Web 3的支持立场，并在全球第二大加密货币交易平台FTX爆雷后未改支持态度，这对业界而言十分重要。Neo创办于2014年，作为行业OG之一的达鸿飞透露，Neo在此次参加完香港的活动后，打算将运营主体设在香港。

亚太最大的数字资产托管解决方案提供商Cobo首席运营官Lily Z.King称，与香港特区政府接触后发现，各层级官员都站出来为香港要作为虚拟资产枢纽的目标在进行宣传。“如果你想请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那么你给他的办公室写信，他一定会尽他的能力，在他的日历上把你们想要支持的东西，放在他的日程安排上。”她说。

对于业内人士回流香港，Livio Weng分析称，长期以来，亚洲大部分Web 3、区块链技术人才都在中国内地，这给了香港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可以在技术上和内地联动，“其他地区就太远了，技术人员去一趟新加坡还挺费劲的，跑到香港就简单多了，特别是深圳的技术团队和香港联动非常容易”。Hashkey Group另外一名人士透露，从2022年底开始，新加坡公司20% 30%的员工陆续搬回香港。达鸿飞也表示，包括中国内地在内的全球分布式技术团队与香港金融运营联动，将成为业界未来的现实选择。

但业界也并非对香港没有疑虑。不愿具名的业界人士指出，2021年中国内地全面禁止虚拟货币交易，在香港的币圈人也避走他乡，担心香港因此受到波及。Livio Weng谈及行业时也提及，长期困扰行业从业者的首要痛点就是从业安全性。行业发展的混沌早期因为没有规则，从业者做的每件事都有可能触碰到一些风险。他称，明确的规则

十分重要，香港正走在前列。

2022年10月，香港特区政府在金融科技周上发表《有关香港虚拟资产发展的政策宣言》，此后逐步落地一系列监管方案，如自今年6月1日起，在香港经营虚拟资产交易所必须向香港证监会申领牌照；稳定币将纳入香港金管局监管框架等。在这次的Web 3嘉年华活动之前，由驻港中资机构和香港高校发起的香港Web 3.0协会，4月11日在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的见证下成立。此外，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透露，香港亦正在成立虚拟资产发展专责小组，且成员已大致就位；专责小组将纳入香港证监会、金管局的代表，以及让业界参与，共同商讨行业发展和监管方案。

“高才通”能否留住人

“最近班上从北京、上海转来好多新同学，这些妈妈都很关心孩子的学业，抓得很紧。”香港妈妈瑞秋说，最近因为高才通计划吸引了许多内地中产家庭迁到香港，香港学业氛围“更卷了”，各类补习班也异常火爆。

人才是香港疫后复常、重启经济的必要动能，受疫情和移民潮影响，香港“人才荒”日益严峻，香港特区政府为此推出一系列“抢人才”计划。2022年《施政报告》中提出的“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下称“高才通计划”）从2022年底开始接受申请，在内地反响热烈。高才通计划的申请门槛明确，如果申请前一年的年薪高于250万港元（约合230万元人民币），或者在全球百强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均可申请此类签证来香港工作、生活。

香港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菡透露，截至2023年3月28日，香港特区政府已收到超过2万宗申请，获批的接近1.2万份。计划推出至今约三个月，申请数字一直以平均每天200宗平稳上升。在2万份申请中，超五成成为拥有至少三年以上工作经验的全球百强大学毕业生，具备三年以内工作经验的全球百强大学毕业生占27%，年薪高于250万港元的申请人约占22%。

“前不久来香港预约办身份证都得找‘黄牛’。”一位获批高才通计划的人士说，由于高才通计划获批速度超出预期，不少申请人集中来香港申请换领身份证，也令香港入境处的工作难以负荷。

早年间，移民香港的大多是内地富裕阶层，以企业家居多，相比之下，高才通计划目标群体以年轻人和中产家庭为主。孙玉菡表示，获批的1万多名申请人，30岁以下的约占一半，40岁以下的更接近八成。由于高才通计划申请人可带配偶及18岁以下的子女一同来港，目前批出的受养人签证约有8300个，其中高薪类别申请人连同受养人一并申请的比率较高，每位获批的申请人平均会带同1.46名受养人。

2020年香港推出严格的防疫管控政策后，人才入境几近停顿。过去两年来，香港劳动人口大幅减少超10万人，从2020年二季度的357万人降至2022年四季度的346万人。离开的劳动人口中，逾七成属于具备管理和专业经验的高技术人才。孙玉菡表示，相对于香港过去两年流失的劳动人口多为59岁以下的技术人员，高才通计划吸纳的申请人是年轻、高学历、富工作经验、具国际视野的优质人才，正好可以填补本地人才缺口，与本地人才相辅相成，提升香港的人才库。

但获批高才通计划签证，并不意味着他们一定会来香港工作，部分申请人可能只是将其当成两年的长期旅游签证。今年1月底，在上海从事留学行业的荣宗骁在“香港人才服务窗口”线上提交了高才通计划申请，申请过程中只需要提供本科毕业证、照片、护照，以及在职工作单位的“赴港工作同意书”等信息；三四天后，荣宗骁就收到了审批通过的邮件。签证获批之后，申请者有6个月的期限缴费领取签证，可以网上缴付签证费用230港元，领取签证之后的6个月内需入境香港，激活签证。

荣宗骁本科毕业于全球百强高校，符合高才通计划的要求，也曾以交换生的身份在港留学，熟悉香港的生活环境。但荣宗骁所在的留学行业，在中国内地拥有更广阔的市场，他暂时并没有移居香港的打算。“申请高才通签证对我来说是锦上添花的选择，多了一张低成本的移居船票。”谈到申请原因时，荣宗骁表示，他暂未计划搬到香港工作、生活，而是希望自己的未来可以多一条出路，“香港的国际化优势仍在，而且税率更低，拥有香港身份也更容易在港注册公司，方便国际业务拓展”。他认为，美国、加拿大、新西兰等地移民手续相对繁琐，费用高昂，相比之下香港高才通计划申请条款清晰，手续简便。不过，拿到签证并不代表获得香港永久居民身份，如果两年之后未在港工作或者开办业务，高才通计划签证将难以续签。

虽然高才通计划申请和获批人数众多，但是申请者能否转化为香港的劳动力，尚存不确定性。香港立法会议员洪雯向财新表示，仅仅从申请和获批数据来看，并不能说明这个计划吸引到了多少人来港定居。洪雯认为，高才通计划推出初期，以其极快的审批速度吸引较高的关注度，“这些顶尖人才有兴趣申请香港的签证，对香港来说是好事，下一步应该与申请人有更多沟通，让他们了解香港的机遇，吸引他们真正来港定居”。

香港立法会2020年发表的“全球争夺人才”《研究简报》显示：在2010年至2019年期间，引进外籍人士来港工作的“一般就业政策”签证同比增加近五成，但是同期居港的外籍人士不升反跌，减少近三成。“输入内地人才计划”批准了5.7万宗申请，但是根据该计划来港并成为香港永居的仅有7033人。换言之，只有12%的内地人才在香港工作、居住满七年，最后成为香港永久居民。研究认为，香港难以留住人才的主要原因在于生活成本高昂，削弱了香港优厚薪酬的吸引力，在计算生活成本等因素后，香港本地职位的薪酬不如内地及新加坡的相似职位。

高才通计划推出后，也衍生出不少争议。有内地孕妇声称利用该计划成功来港预约产子，甚至公开在社交媒体分享经验。香港特区政府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表示，能通过高才通计划来港的应该是真正的高端人才，香港生

育率低，也欢迎有人申请高才通计划来港分娩。洪雯认为，2013年之前的“双非”（夫妇均非香港居民）父母赴港产子，当中不少家庭收入较低，希望借此让孩子获得香港身份后享受社会基本福利，但高才通计划吸引的人才有一定经济实力，即使来港生子，对香港社会的影响也不大。此外，洪雯建议，高才通计划应当与引进重点企业同步推进。

资金流入几何

香港人气这次真的回来了，但“旺丁”是否“旺财”？

最近，在社交媒体上经常可以看到香港银行门口大排长龙的场景。中银香港个人金融及财富管理部副总经理刘赛丽向财新称，自香港经济活动恢复，带动各地旅客访港，中银香港今年首季跨境客户新开立账户数目较2022年四季度上升近1.7倍。恒生银行发言人也透露，今年首季，恒生新增的非香港客户数较2022年同期上升2.6倍。

不过，两家银行都没有透露新开户的存款金额数目。更有乐观的市场人士认为，因欧美银行体系一系列风险事件，资金由西向东迁移，香港是目的地之一。在香港金管局尚未披露3月以来存贷款数据的情况下，很难判断香港银行体系资金进出的情况；不过，单从港股和港汇市场来看，并未见到明显资金流入。

香港金管局公布的月度存贷款数据，是反映银行体系资金变动的最直观工具。除此之外，银行体系结余是衡量香港银行间流动性的主要指标，但只有在港元、美元汇价触及联系汇率制度下7.75至7.85的浮动区间极值时，香港金管局出手承接港元或美元，银行体系结余才出现变动；配合香港同业拆借利率（Hibor）的变化，可间接反映大规模资金的流入或流出。

进入4月，港元五度触及“弱方兑换保证”（即美元兑港元汇价达7.85），迫使香港金管局出手承接277.81亿港元；截至2023年4月20日，香港银行体系结余降至492.3亿港元，已低于上一次美国加息周期的约540亿美元低位，达2008年11月17日488.97亿港元之后新低。自踏入美国本轮加息周期，香港金管局累计承接逾3000亿港元卖盘，香港银行体系结余自2022年5月约3500亿港元，已缩水近86%。

港元频频走弱，市场第一反应通常是资金外流。但综合市场人士的分析，这次主要是港元和美元息差导致。思睿投资集团合伙人、首席经济学家洪灏指出，美联储加息，香港银行按兵不动，港币汇率走软并不意外，因此对4月以来港汇连续触及“弱方兑换保证”并不担心。不过，如果是息差套利交易，并未使港美息差明显收窄。有投资人对财新称：“很可能反映有游资泊港，且大部分资金以美元形式停留香港。”

香港恒生指数在今年2月27日日内跌破2万点整数关后，持续窄幅波动，2万点大关数次失而复得、得而复失，至今未见明显突破，亦反映资金以观望为主。港股交投量在3月有所升温，据香港交易所披露，今年3月平均每日成交金额为1265亿港元，较2月的1184亿港元上升7%。

摩根资产管理亚太区首席市场策略师许长泰称，除了地缘政治因素，过去两年内地、香港严格的防疫政策，以及2021年内地对一些行业的监管环境突然收紧，均使外资担心难以应付迅速变化的政策；如今内地经济疫后重启，外资信心恢复需要时间。他指出，香港股市并未见到明显资金流入，相信短期内港股、A股要重拾升轨，主要靠本地投资者信心增强带动。不过，因香港人流回升，展望二季度，看好香港地产股，特别是收租类地产股，相信铜锣湾、尖沙咀等地的零售店铺将逐步转旺。

版面编辑：刘春辉

最新财新周刊 | 专门学校怎么办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第17期 出版日期 2023年05月01日

新版《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施行近两年，专门学校仍面临巨大挑战



清明节前，吉安市阳光学校学生步行去烈士陵园参加缅怀先烈活动。有一个男孩摘了路边的油菜花，放在自己的耳朵上，略带羞涩地向周边人展示，引来哈哈大笑。图：黄雨馨

文 财新周刊 黄雨馨

身着吉安市阳光学校（下称“阳光学校”）校服的学生们从江西省吉安市街头走过，近160人排成长约50米的长队。他们此行是去烈士陵园缅怀先烈，活动结束后再步行返校。这是阳光学校建立以来第一次举行全体学生参与的集体出校活动。对接受封闭式管理的他们来说，“可以放放风，很开心”。

这支队伍颇为特别——学生全是剃着短发的男孩，大多表情拘谨，走路很有纪律。在队伍中维持秩序的除了老师，还有穿迷彩服、拿防暴钢叉的教官和两名警察。

阳光学校是一所专门学校，招收的是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或者按老师们的说法，就是专门管理调皮捣蛋孩子的学校。上世纪90年代，大部分此类专门学校还叫“工读学校”，后者是国人耳熟能详的称谓。工读教育自上世纪50年代被引入中国，是对有违法和轻微犯罪行为而不适合在一般学校就读的青少年实施的一种特殊教育，其特点是半工半读，并带有一定强制性。“文革”中工读学校一度停办，改革开放后国家不断出台政策，使得工读学校恢复办学。

在立法层面，“工读学校”的概念写入1991年9月制定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下称《未保法》）。1992年2月出台的《〈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规定，承担实施义务教育任务的学校包括工读学校。1999年6月颁布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下称《预防法》）进一步规定了对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送工读学校的批准程序。工读教育在预防青少年犯罪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其存在的司法化、污名化、以劳代教、心理教育缺失等问题一直遭到诟病。2006年6月、12月，《义务教育法》和《未保法》相继修订，相关条文中的“工读学校”都改为“专门学校”。但因为《预防法》没有同步修改，“工读学校”的概念便沿用下来。

中共十八大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16年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的意见》，2019年3月又印发《关于加强专门学校建设和专门教育工作的意见》。这两份没有公开的文件，成为专门教育改革的重要依据。2020年12月26日，《未保法》《预防法》同步完成新一轮大修，后者条文中的“工读学校”均改为“专门学校”。

2020年这次修法背后，是未成年人犯罪持续增长且低龄化的趋势。据最高检察院数据，2018年至2022年，全国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32.7万人，年均上升7.7%；其中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从2018年4600多人上升至2022年8700多人，年均上升16.7%。特别是一些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死亡等恶性犯罪，引起全社会忧虑。

大量研究表明，未成年人实施犯罪之前，多有不良行为或违法行为，且这些行为多数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干预。为此，新版《预防法》引入了分级干预的思路，将未成年人相关行为分为不良行为和严重不良行为两类，严重不良行为又进一步细分，制定了不同的干预和矫治措施。

曾挂职担任最高检第九检察厅（未成年人检察厅）副厅长的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何挺评价说，《预防法》修订主要成果有三：一是体现了提前干预和分级干预的理念，并进行了分级干预体系的初步建构；二是对不良行为进行了较为准确的定性和归类，明确了分级干预体系的起点；三是将加强专门学校建设和发展专门教育明确为分级

干预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重点工作。

新版《预防法》在总则中明确规定：国家加强专门学校建设，对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进行专门教育。专门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的组成部分，是对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进行教育和矫治的重要保护处分措施。省级政府应当将专门教育发展和专门学校建设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县级以上地方政府成立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根据需要合理设置专门学校。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由教育、民政、财政、人社、公安、司法行政等单位，以及律师、社会工作者等人员组成。

虽然教育部门没有公布具体数字，但多名业内人士表示，新版《预防法》2021年6月1日施行以后，全国多地都在新建或改扩建专门学校。

实际上，这是在补长期欠账。根据最高检2022年10月底的一份报告，目前全国仅有100余所专门学校，“远不能满足需求，有的省一所未有，影响罪错未成年人接受有效教育矫治”。《检察日报》2022年7月的报道也披露，很多省份甚至是人口大省仅有一所专门学校。由于现有专门学校数量太少无法满足需求，导致需要接受专门教育的未成年人“无校可去”。

财新近期在北京、江西等地走访多所专门学校，了解到无论是体制机制，还是师资配备、招生办学，都存在不少障碍。办好专门教育依然面临巨大挑战。

一所新学校的办学路

2023年清明节前几天举行的出校活动，让阳光学校的老师们既紧张又期待。活动前，全校26名老师、14名教官和2名警察一起开会，商量详细的行进路线、安保方案，以及如何应对突发情况。有的老师担心学生逃跑：“如果很多学生一起跑怎么办？”直到活动结束后，学生们在中午时分一个不少都进了校门，老师们才长舒一口气。

阳光学校的建筑设计很有特点，教室与宿舍连通，每个班一间大宿舍，相邻的两个宿舍之间有一间小屋，小屋两侧各有一扇窗户和一扇门，分别对着学生宿舍，方便随时观察学生的情况。两名值班教官就住在小屋里，分别负责一个班。

除了语文、数学这些常规课程，阳光学校的特色是劳动教育。操场边有连片的菜地，每班认领一块，种有生菜、辣椒等等。院子一角还养了鸡鸭，每天有学生负责喂养。

阳光学校是吉安唯一一所公办专门学校。校长曹春来向财新介绍，学校2019年12月动工，用时一年完成基建，2021年2月开始招生，面向全市范围内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普通初中学生，从最初27名学生逐步发展到目前的160名学生，开设了七、八、九三个年级共6个班。阳光学校实行半军事化和寄宿制运作，管理体制上由吉安市、吉州区共建，以吉州区管理为主。

阳光学校短短几年的发展得到了同行认可。北京海淀寄读学校曾是中国第一所工读学校，被公认为专门教育领军者。在走访了阳光学校以后，海淀寄读学校校长肖建国说：“建校时间短，起步层次高。进来后让人感觉像一个学校。”

“让人感觉像一个学校”这是对一所新办的专门学校较高的评价了。业内人士表示，专门教育兼具教育与司法双重属性，实践中有不少专门学校都走向了“监狱化”，把学生一“关”了之。

事实上，阳光学校的办学难题一个接一个。首先是老师不愿来。阳光学校的老师都是从全市其他公立学校选调而来。学校所在的吉州区是吉安的中心城区，如果吉州区的普通学校向全市选调教师，一个岗位往往有上百人报名，而阳光学校首批计划选调约10名老师，报名者只有两三人，经过多轮选调才达到目前26人的教师规模。另外，学校配置的14名教官大多从退伍军人中招聘，两名驻校警察来自吉州公安分局。一些老师坦言，知道这里的孩子调皮难管，选择来工作也是出于现实考虑，如家属和孩子在市区工作、上学，主要是为了家庭团圆。

招生也不容易。最初家长和学生不知道什么是专门学校，有的学生担心在这里读书没有自由，也有家长表示，自己的孩子只是行为习惯不好，本质不坏，担心来了以后会“交叉感染”，被“坏孩子”带偏。

曹春来介绍，办学过程中，市委政法委主动作为，相关领导多次到学校与老师、学生面对面座谈，帮助解决问题。一开始招生由市委政法委牵头协调市教体局、各县（市、区）委政法委，将招生指标一一分解，并将招生完成情况纳入平安建设考核内容，这才招到孩子。随着各界对阳光学校的了解加深，学生慢慢多了起来。4月初财新到阳光学校走访时，在校门口遇到了主动来打听情况、想送孩子入学的家长，被告知名额已满。

学生多了，需求也多。阳光学校是寄宿制学校，每逢周末，只有表现良好且有家长来接的孩子才能回家，这意味着除去寒暑假，大部分学生几乎全天在校。相应的，老师在校工作时间也远超普通学校。从家庭状况来看，有近60名孩子是留守儿童或存在父母离异、家长一方去世情况，对于这部分缺少爱的孩子，需要老师付出更多陪伴和关爱。

“如果从孩子的一生来看，老师能做的很少，有时候深感无能为力。但你会觉得这些孩子很可怜，他们从家庭得到的爱太少了。在专门学校，他们的变化可能并不大，但为了追求更大的可能性，我们还是要给他们爱和陪伴。”

”一位曾在普通学校从教20年的专门学校老师感叹。

专门矫治教育如何办

看到篮球架下有一部无人看管的手机，想到自己一直没有手机，上初一的小泽（化名）顺手就拿走了它。

那是2021年2月的一天。事发不久，班主任联系了小泽父母，劝说他们带孩子去派出所。警察在交谈中发现，小泽之前还有多次偷窃行为，涉及财物折金额已经达到盗窃罪立案标准。经过与小泽父母沟通，警方和教育局决定将小泽送至赣州市第十一中学励志班接受专门矫治教育。

赣州十一中是江西省第一所专门学校，2014年9月开始招生办学。赣州十一中校长程懋伟介绍，2020年11月，学校在校区成立专门矫治教育的矫治区（励志班），接收由警方送来的涉嫌犯罪但未达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学生，目前励志班由5名警察和多名教官进行闭环管理。

程懋伟回忆，小泽是2021年3月被送来的，一开始他不觉得自己犯了多大错误，有很大抵触情绪。励志班的老师、教官和驻校警察为他制定了针对性的法治教育方案，让他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如果继续发展，会产生严重法律后果。同时，体育老师注意到个头高于同龄人的小泽在篮球上有一定天赋，便把他选入篮球队，训练后代表十一中参加区级青少年篮球比赛，并取得不错成绩。五个月的矫治过后，小泽离开励志班，转入赣州十一中专门教育班学习。



3月底，赣州市第十 中学学生在体育馆打完军体拳，正在列队集合准备离场。图：黄雨馨



透过赣州十中教师办公室的窗户，可以看到学生的上课情况。办公室位于两间教室之间，安装有两个隔音窗户分别对着两间教室。图：黄雨馨



赣州十 中学生的画作在学校 楼展出，许多学生首次接触美术创作。图：黄雨馨

2021年9月，小泽在专门教育班竞选上了班干部。随着班级管理团队持续的干预和辅导，他身上发生了许多变化。近一年时间过去，2022年7月，家长申请小泽回原校读初三，十一中与警方经过评估，同意小泽离校转回原校。

按照《预防法》确立的分级干预体系，“问题少年”首先被分为有不良行为和有严重不良行为两类。抽烟喝酒、多次旷课逃学、无故夜不归宿或离家出走、沉迷网络、参与赌博等都属于不良行为，以家庭、学校为主进行干预，公安机关和村（居）委会也有权制止，并督促家长履行职责。

严重不良行为按程度轻重，又分为两种，一种是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如结伙斗殴、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盗窃、抢夺公私财物、卖淫嫖娼，吸毒等；另一种则是实施了《刑法》规定的犯罪行为，因不满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不予刑事处罚的，属于最严重的一种。

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进入专门学校，采取“申请+强制”二元结构。新版《预防法》第43条 45条规定，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家长、学校无力管教或管教无效的，可以提出申请，经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评估同意后，由教育行政部门决定送入专门学校。此外，对于实施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情节恶劣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等，以及实施《刑法》规定的行为、因不满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不予刑事处罚的，无需家长申请，经评估同意，教育行政部门会同公安机关即可以决定送入专门学校。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都是送入专门学校，对于实施严重危害社会行为的未成年人和因年龄原因不负刑事责任的未成年人，采取的干预措施并不相同。从新版《预防法》来看，前者接受的是专门教育，后者接受的则是专门矫治

教育。关于后者，法律规定，省级政府应当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至少确定一所专门学校按照分校区、分班级等方式设置专门场所，实行闭环管理，进行专门矫治教育。教育行政部门则承担前者的专门教育工作，公安机关、司法行政部门负责后者的专门矫治教育工作。而小泽就是先在赣州十一中励志班接受了专门矫治教育，之后又在赣州十一中接受专门教育，并最终离开专门学校回到原中学。

“专门学校囊括了半机构化处遇措施与机构化处遇措施。”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少年司法与法治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宋英辉说，从干预措施的实施场所和对罪错未成年人权利自由的限制程度区分，可将干预措施由轻到重分级为社会化处遇措施、半机构化处遇措施、机构化处遇措施以及刑事处遇措施。半机构化处遇主要为专门教育措施，该措施虽有专门学校的参与，但仍需要未成年人父母和家庭的配合，不能使未成年人脱离社会支持体系。机构化处遇措施则是非刑处遇体系中具有收容和限制较长时间人身自由性质的措施。

宋英辉表示，长期以来，“收容教养”是法定的机构化处遇措施，但由于法律规定较为原则、适用程序不清、执行场所不明等问题而在实践中被虚置。2020年12月同步出台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和新版《预防法》，不再使用“收容教养”这个为人诟病的表达，而是创新性地建立了专门矫治教育制度。专门矫治教育制度由此成为分级干预体制中的重要一环。

财新了解到，无论是作为专门教育领军者的海淀寄读学校，还是新建不久的阳光学校，目前都没有划出专门场所开展闭环管理的专门矫治教育。赣州十一中是屈指可数的将专门教育与专门矫治教育结合的学校。程懋伟介绍说，赣州属于“摸着石头过河”，2020年率先成立了市级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最初这个委员会的办公室没有设在市委政法委，工作很难开展。“学生进不来，但社会又有需求，只能干着急。”程懋伟说，“为了推进平安建设，市委政法委将‘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接手，我校的专门矫治教育才迅速发展。”

赣州十一中将专门矫治教育班称为励志班，设在老校区实行闭环管理，接收涉罪但未达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学生。据介绍，除义务教育课程，励志班通过更为严格的军事管理及训练等方式规范学生行为，培养学生法纪意识。此外，励志班重视培养职业技能，邀请职业技术学院专业技能教师来校授课，帮助学生进入社会后有谋生的一技之长。

赣州十一中探索了两区流转机制，即专门教育区、专门矫治教育区的学生能够相互流转。对于专门教育区具有严重不良行为且屡教不改的学生，将其转至专门矫治教育区进行集中管理、重点矫治，以免其对其他学生带来负面影响，同时起到对其他学生警示教育作用；专门矫治教育区的学生若积极矫治，经过评估满足流转条件的，则流转至专门教育区。

障碍如何破除

国家出台了政策，法律上也有明确要求，但专门教育的发展依然面临不少障碍。

多名专门学校校长提到，收容教养退出历史舞台后，就新版《预防法》的具体实施而言，难在专门矫治教育该怎么办。新版《预防法》规定，县级以上地方政府成立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研究确定专门学校教学、管理相关工作。但据财新了解，许多地方政府迄今尚未设立这一委员会。

中国教育学会工读教育分会理事长王春生曾在山西太原一所专门学校担任校长多年。他认为，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的职能如何落实，是专门矫治教育成功运行的关键。“这个指导委员会涉及十几个部门，谁来召集这些部门开会？每送来一个学生，十几个部门就开一次会吗？个案的评估能及时完成吗？”

是否要将有严重不良行为的孩子送去专门学校，法条均要求由教育行政部门会同公安机关决定。王春生认为，是教育部门和公安机关职责共担还是一方主导，规定并不清晰。“专门学校在多地责任主体不一。实践中有些地方是公安主导，有的是政法委主导，有的是教育部门主导。但有些地方教育部门完全没有积极性，觉得管理罪错未成年人超出了他们的职责范围”。

宋英辉表示，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专门学校的主流观点是，其不仅承担普通教育职能，还有教育、矫治和挽救罪错未成年人、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培养合格公民的功能，因此尤其需要政法单位和教育部门的协调配合。

成都市第五十二中学开设的专门矫治教育闭环管理区于2021年动工修建，预计2023年9月投入使用。校长程鹏强介绍，专门矫治教育闭环管理区容纳规模为60名学生，男生两个班，女生一个班。学校组建了教师团队，研发了一学期900节矫治教育课程，设计了管理方案和流程。程鹏强坦言，现在急缺师资和闭环管理的警力，他正在想办法解决。

在吉安阳光学校，多名老师告诉财新，这里工作压力大、时间长，可以说每天都是超负荷运转，但是并没有加班补贴，工资也不如普通学校，而且在职称评定时还处于弱势。一位专门学校校长对财新表示，除了讲情怀和爱，也要通过相应的激励措施来留住老师，不能一味强调奉献而不求回报。

“我们深知学校老师的难处，教师职称设置和评定问题也十分突出。”吉安市吉州区委政法委和区教育局人士坦言，阳光学校的特殊性使得该校教师在职称评定中比较被动。他们希望在职称评定时有所倾斜，比例不参照普通完全中学进行设置，“但是协调各部门争取政策需要有依据，希望国家出台相关的文件做支持”。

程懋伟则提到，在教学方面，目前对专门教育、专门矫治教育的效果并无全国统一的评价体系，一个孩子收进来后，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从专门矫治教育转为专门教育、什么情况下可以从专门学校转回普通学校，各地做法也不一致。

多名校长提到，根据新版《预防法》，专门学校建设和专门教育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他们希望相关法规文件尽快出台，为办好专门教育提供具体指引。

“普通学校的孩子是从零到无限的发展，专门学校的孩子是从负开始，需要我们先帮助解决他们自身的问题，先归零，然后才能有无限的发展。”程鹏强说，“专门学校该如何办？老师、学校都想做好，只是很多时候不知道怎么做，这是在做探索无人区的工作。”

在肖建国眼中，一所专门学校要办好，有两个重要的前提条件，一是有高水平且充足的教师队伍，二是有良好的硬件设施。教师队伍是学校发展的基础，硬件设施则能够为学生们提供更多的可能性。在达到这两个条件基础上，再来谈招生、课程设置和优化等等。

肖建国回顾，他在海淀寄读学校初当校长那几年，也是用“看、管、压”等比较粗暴的方式对待学生，常常充当灭火队长的角色，忙于解决师生矛盾、家校矛盾。2004年，学校组织了办学思想大讨论，经过讨论发现认知存在问题。

“以前我们只看到这些孩子学习基础差、行为习惯差、经常违纪等问题，把他们视为‘洪水猛兽’。但我们没看到他们动手能力强、可塑性强、敢作敢为的优点。”肖建国说，引导教师建立积极正确的学生观，也是专门学校的基础性工作之一。师生关系改善后，学校开发了很多新课程，重视发展心理、科技教育，引入社工，让学生逐步实现自我管理。

中国教育学会工读分会副理事长卫宝弟说：“如果人生是跑道，那么对这些所谓的‘问题少年’而言，他们只是暂时跑进了弯道，暂时落后了，但弯道未尝不能超车。专门教育的概念在时代变革中，数次被修改、被重新诠释。专门教育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目标就是帮助这些暂时落后的孩子重新找到方向，鼓起对生活和学习勇气，让他们成为合格的公民。”

版面编辑：刘春辉

随笔 | “总得有人去擦亮星星”——第七届教育公益组织双年会 印象笔记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第17期 出版日期 2023年05月01日

在家庭教育缺位和学校教育失效的情况下，如果再没有这些可贵可爱的公益人排除万难发出的微光，他们如何成长为忠诚的员工、称职的父母、善良的公民？



2023年3月25日，第七届教育公益组织双年会，廖 发表演讲《乡村儿童面临的新挑战和新问题》。图：李梅

文 钱志龙
UNSCHOOL创始人

第七届教育公益组织双年会于2023年3月25日至28日举行。双年会由21世纪教育研究院和北京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共同发起，2009年召开了首届会议。本次会议的承办方，是湖南影响力最大的公益组织湖南弘慧教育发展基金会。大会不收门票，也不给酬劳，是公民自发聚会。要不是弘慧多年的经验，很难想象在一所普通的公立中学有限场地里，如何组织一场计划300人却来了800多人的盛会。

虽然“公益”是第一标签，但把大家聚在一起的更重要的理由，还是教育。出了挺多问题的教育，需要有人去操心，以达成我们希望看见的改变。

作为公益界的局外人，我有幸得到邀请。我就像一个小学生，瞪着好奇的眼睛，如饥似渴向所有资深的公益人学习。三天两夜，我甚至连觉都舍不得睡。每位小伙伴的分享都能戳到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产生深深的共情和共鸣。

公益不是什么

如果不参加双年会，我不会知道，中国有6000多万留守儿童，整个童年只有老人和手机为伴，学校的学习让他们提不起兴趣；如果不参加双年会，我不会知道，中国有1.4亿流动儿童（约占儿童总数的40%），虽身在城市，却难以享受与城市儿童平等的教育机会。

如果没有听到“新公民计划”的魏佳羽题为《让儿童和父母在一起》的分享，我不会知道，每年有近百万儿童必须在中考或高考前回到家乡，而就学需求和教师资源的错配问题并没有解决。更糟的是，他们在城市找到工作的机会很小，又几乎已经失去了回到家乡生活的可能。

疫情期间，让我们保持基本生活所需的，并不是985大学培养的考试机器，而是那些最辛苦而回报微薄的餐饮小妹和快递小哥。他们如森林里的苔藓，被高大茂盛的乔木灌木挡住了，一辈子见不到什么太阳。在家庭教育缺位和学校教育失效的情况下，如果再没有这些可贵可爱的公益人排除万难发出的微光，他们如何成为称职的父母、忠诚的员工、善良的公民？

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名誉理事长杨东平《新形势下教育公益的发展和定位》分享里，他提出了“向下、向新、向未来”三个方向。他也指出，即使可喜地出现了像“真爱梦想”和“美丽中国”这样的大型优秀机构，但小规模草根组织仍会作为主流形态长期存在。

童行书院创始人、曾获得雨果奖的科幻作家郝景芳，在开幕致辞里提出“公益不是什么”——不是让公益人损耗自身的牺牲；不是一次性的情怀释放；不是没有价值观的事物；不是单向的施舍和强加——简简单单四句话，是对

普通人最简明扼要的公益启蒙，也是对公益从业者的重要提醒。她还提出了“可持续的公益品”这个概念，为公益组织如何自己“造血”、提高对内容品质的追求、摆脱对捐赠的依赖提供了新的思路。

最让我记忆深刻的，是陕西纯山教育基金会秘书长廖瑾的演讲《乡村儿童面临的新挑战和新问题》：“考”出大山、改变命运的路径行不通了，还出现了“因教返贫”；沉迷“电子鸦片”，被困“信息茧房”，引发自然匮乏症和社交恐惧症；撤并村小、低龄寄宿的环境，让孩子暴露于“校园暴力”和“早发性行为”之中；人际关系、家庭关系、厌学成为18岁以下乡村青少年抑郁症的三大原因，涉及人数甚至超过30%；职校作为乡村教育的终点，职业教育的质量无法成为他们未来就业的保障。



四川达祖小学调研。图：《中国乡村教育发展报告（2021）》

好在这些问题被看到了。一幅绘制的教育公益生态图也让我看到，原来在乡村教育的每一处细节，都有那么多公益人在做着这么多了不起的事。那些一不小心就被宏大叙事手法忽略的一个个弱势儿童，被另一个群体默默关注着、暖暖托举着。

此时此刻，脑子里一直回响着谢尔·希尔弗斯坦那首公益人最喜欢的诗句——“总得有人去擦亮星星”。

教育创新的沃土

听了那么多场分享，我不但被教育公益的规模、持久、细微深深震撼，还惊喜地发现他们所使用的方法和工具竟如此新颖。

在以考试成绩为惟一尺度的学校里，我用尽全力，也很难说服校长、家长挤出时间，让孩子们体验可以让他们终身受用的“项目式学习”方法。但在乡村那些被遗忘的角落，基于真实兴趣的“研究式学习”、接触真实世界的“社会化学习”、了解并爱上自己家乡的“生活化学习”等等，回归教育本质的创新教育方法，却被发挥得淋漓尽致。

或许因为大学校门对于大多数乡村青少年来说太遥远，反倒“卷”不到他们；或许因为资源匮乏的地方更容易点燃“无中生有”的创新能力；或许因为公益教育本来就更关注一个个真实的人，而不是他们的成绩单。

这能给深陷应试泥潭的城市校长和家长们带来怎样的启发呢？

贵州盛华职业学院针对乡村大学生的真实现状和挑战，扎扎实实解决职技体系的就业问题，让即使盲童也能找到自己独一无二的价值。如果你也对这些不明觉厉的词汇感兴趣，或者我们一起去盛华探个究竟？

五所苦志育才学校的创办人之一龙平告诉我们，他们如何专拣最难的骨头啃，关注逃学、辍学、厌学现象最严重的失依儿童（事实孤儿），用“家校一体”“学生自治”“混龄住宿”等一系列大胆创新且卓有成效的行动，为这些少人心疼的孩子提供全免费寄宿教育，也给了他们一个安全、温暖且能看见希望的港湾。

上海春禾青少年发展中心深耕十几年，进化出了一整套“多点支撑，助力学生自主学习”的支教模式——尤其是研究性学习，和现在正在成为热词的项目式学习一样，基于学生真实感兴趣的课题展开深度研究，尽力唤醒孩子的学习热情，不但促成了学生的自主学习，也让老师从日复一日的机械化工作中走出来，消除职业倦怠，成为受学生喜欢的老师。

我每天都会一路小跑在各种平行分论坛间赶场，除了有太多真实的好奇和仰慕，也因为在这里，我吸进的每一口空气都是鲜甜的创新味道。赶场间隙，见缝插针逛一下双年会别开生面的“拉杆箱市集”，顿时被致朴公益支持的孩子们画的门神吸引住了。

“每个孩子都能得到适合自己生命成长的教育”，是名为“致朴”的公益机构的愿景，他们提倡的“以美育为核心价值，营造乡村儿童多元成长环境”的理念，早就名声在外了。儿童是致朴所有思考和行动的起点，也是终点。乡村不是弱势，是和城市不一样的风景，这里万物生长。



双年会演讲中展示的中国教育公益分布图谱。图：李梅

心和公益基金会的秘书长柚子主持的圆桌论坛别具一格。为了在有限时间里提高分享的效率和趣味性，他用行动示范了“翻转课堂”的创新听讲方式：分享人提前把PPT发给与会观众，但在分享中不能使用。面对面的宝贵时间全部用来讲走心的故事，回答观众提问。

“大儿童”的创始人江晨曦讲了一个故事：一个有明显感统失调的3岁女孩，只要听见稍微大一点的声音就会大哭不止。但没有人会评判她或嫌弃她，在大儿童的支持下，她慢慢学会了捂住耳朵，用深呼吸的方法对抗恐惧。她还学会了自信表达，以前别人抢走了她的玩具，她只会默默伤心，偷偷生气；但几个月后，同样事情发生时，她已经学会了用平静且坚定的语气说出“这是我的”“你不可以”。

晨曦的声音特别平静但超有力量，没有照片，大家都成功脑补了那个勇敢的小女孩，也理解了他们是如何通过长情的陪伴，在城中村实施低龄流动儿童的社会情感教育。

不以任何理由违背儿童天性

已经成立11年的“益微青年”，是西部阳光基金会孵化出来的公益机构。他们招募和培训大学生志愿者组织乡村夏令营，让缺少高质量陪伴的乡村儿童终生难忘；同时，使对未来迷茫的大学生找到人生意义，提高可迁移到未来工作中的真实能力。

我从一个普通的月捐人开始陪伴益微，到成为副理事长，表面看来是在捐出我的时间和金钱，其实是这些独立自信有担当的年轻人让我慢慢了解，什么是超越了慈善心的公益，什么是过程和结果都能被评估的有效援助，并不断用他们有趣而新颖的共创方式，搀扶着我这个中年大叔追赶时代进化的脚步。

去参观湖南中方县第一中学回来的伙伴分享，“攀行者”独创的PEER空间划分成三个板块：活动空间 用于举办多样的活动；学习空间 用于阅读和工作坊；公共空间 面向全校师生开放探讨公共社会议题。学生们可以自主参与共创，设计布置空间，发起社团活动。他们探讨的议题：“面对校园霸凌，你支持以暴制暴吗？”“你支持代孕合法化吗？”“人类是否有出售自己器官的自由？”“法律是为了惩罚还是为了正义？”.....

朱健刚教授可能是全场最让我产生共鸣的学者了。他在广州举办了民间教育机构合禾书院，为只想学习却不在意文凭的年轻人和成年人提供终身学习的教学平台，让平等的、有深度的、有不同意见的学术讨论可以持续发生。

几年未见，“巴别梦想家”创始人璐瑶瘦了很多，明明生着病，眼里却闪着光。这位从英国留学回来的北京姑娘，因为一个支教时种下的善念，一头扎进广西百色的巴别乡，一扎就是十几年。她不顾家人阻拦和别人冷嘲热

讽，用她全部的爱和有效的工具——组织参与式工作坊，举办乡村夏令营，带孩子去游学去拍纪录片，使他们体验劳动、了解世界、了解自己、服务社区，陪伴88名孩子慢慢长大，让这些情感和 Information 封闭的乡村儿童，成为自信且有担当的公民。如今，他们都长成了受人尊敬的模样。



“有灵且美”以用身体学习为核心理念，助力青春期女孩身心健康成长。

更让人动容的是，很多孩子出去后又回到了家乡，成为兼职或全职的公益人，而近3000个孩子又成为他们辛勤工作的受益人。现在，巴别梦想家的理事会和执行团队，全部由“出栏梦想家”——当年被支持过的孩子们担任。

我这里轻描淡写的句子，无法呈现璐瑶十几年遇到的挑战之万一，无法呈现她所投入的百种努力和坚持之万一，更无法呈现她所付出的巨大代价，以及她收获的无尽喜悦之万一。

欧阳晨曦2013年与好友郑清之发现，除了一些地区备受关注的贫困、饥饿乃至性侵等不幸，边缘地区女孩的青春期教育更是一片空白，于是，“有灵且美”（Bright & Beautiful）应运而生。这是国内首个致力于支持青春期女孩身心成长的教育公益机构，以“用身体学习”为核心理念，通过创造性艺术和多元化的成长仪式，助力乡镇地区10岁-18岁的女孩身心健康成长。

成立10年来，他们已经深度服务14省份的66所学校、超过5000名女孩，支持她们找到属于自己的美、自信与勇气。通过寓教于乐的活动，让即将或者刚经历月经初潮的女孩重新认识和接纳正在变化的身体；通过性教育及自我保护意识启蒙，更好地处理和同伴的关系，带着爱和勇敢的积极心态迎接长大。

我毫不怀疑，这些以创新的方式开展、不以任何理由违背儿童天性和教育规律的人本教育，只要能坚持，假以时日，一定会产生可喜的效果。就像一颗用心种下的种子，只要有阳光雨露，不拔苗助长，十年的时间，自然长成一棵茁壮的大树，开花结果，果子落到地上再长出新的树苗。这就是自然的规律，这就是成长的规律。

没有竞争，只有合作

在很多城市的学习场景里，孩子经常面对零和游戏的竞争；教师不敢停下刷题的脚步，因为排名让他们争先而恐后；校长不敢把枪口抬高5厘米，也只是小心翼翼承担着家长对竞争的恐惧。

但是，教育公益机构之间没有竞争，只有合作。仔细看双年会每一个主题的安排和衔接，尤其是最后关于支持网络的圆桌讨论，你就能感受到精心设计的背后，组织者之良苦用心。基金会在源头为支持公益机构争取更多的捐款，草根的公益组织在一线承载着孩子们最细微的需求。让我想起一首诗，“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

这些小微机构如深藏在山间的泉眼，各自浇灌着一方贫瘠的教育水土；又如涓涓细流，最后在某一个村寨汇成一池春水，构成了一个更大的社区，聚成一股更大的力量，滋养和改良一方的教育生态。很多公益组织不光横向搭建结构性议题网络，纵向也在县域推动协作事项的全面和高效。越来越多人意识到，社区是教育的第三空间，社区教育不仅仅是补充。这些感受，在听完21世纪教育研究院郭婷婷《教育公益领域发展研究报告》之后得到了确认。

在这场因疫情盼了5年才终于可以肉身相见的盛会上，每个人用温柔和坚定的态度，不抱怨，不批评，只是默默守望着自己相信的那一片田地，分享但不攀比各自的收成。会场日程结束，更真实的链接才开始。每人每天都有

不止一顿晚饭、一宵夜酒，互相倾听各自的悲欣，加持彼此的梦想。21世纪教育研究院发展总监老赵带着几分微醺，握着我的手语重心长的那番话，应该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发挥作用。

因为太多孩子在上学过程中失去了对学习的兴趣，让我痛心不已。两年前，我提出UN SCHOOL的概念。UN在英语里代表打开、拆掉的一个前缀，放在SCHOOL（学校）之前，蕴含着让学生走出校园的围墙，让教育在真实生活中发生的意思。认同这个教育理念的家长和老师，如今汇集成了一个UN SCHOOL终身共学社区，在学校的围墙外，探索未来教育的更多元的学习场景，创造不一样的学习体验，让真实而自由的学习随时随地发生。

双年会结束后，我特意在长沙多留了一整天，邀请从各地赶来参会的UN SCHOOL伙伴和刚认识的新朋友，一起复盘各自的学习收获，讨论如何让更多人了解并参与到公益事业中来。小组共学是UN SCHOOL最强调的学习方法之一，每个分身乏术的参会者分享不同分会场的内容，拼凑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课程全景。而分享的过程，更是内化的步骤，也帮助大家完成学习的闭环。

7年前，我一个不华丽的转身，离开已经不能自圆其说但积重难返的学校教育圈。在Aha社会创新学院顾远发起的群岛大会上，我接触到了创新教育的理念和很多有趣的做法，认识了一群有爱有梦的小微教育公益机构的创始人。常常有先见之明且善于启发的顾远，这次作为闭幕分享嘉宾，又给大家一个重要提醒：

“如果把组织类比为智能手机，我们并不缺软件（课程内容、教学手法、教学评估）的创新，我们最缺的是底层操作系统的更新，即组织系统的环境支持和人的意识变化。操作系统变化，教育才有可能持续发生变化。”

这恰恰也是UN SCHOOL眼下正在做的尝试和努力。在组织方式上，我们正小步慢跑探索着“青色组织”和DAO（去中心化），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言传和身教，改变家长和教师们对教育底层逻辑的理解。

也因为梁晓燕老师的鼓励，我把集合了我访学全球十国十校经历的视频节目《一个校长的出走》带到了双年会，希望捐赠给有需要的公益机构。很多与会者第一次在主会场的大屏幕上，看到那些在泥地上跳舞的光脚丫子，忍不住湿了眼眶。非洲教育公益人Mike Wamaya以芭蕾为工具，为肯尼亚贫民窟的孩子们建立自信自尊的做法，再次确认了两件事：第一，好的教育与豪华的设施、缜密的课程内容关系不大；第二，再贫瘠的土地也可以用爱浇灌出颜色不一样的野花。



本文作者（右）在双年会分享UN SCHOOL终身共学社区和视频节目《一个校长的出走》。图：雨燕

晚上，我在双年会独有的环节——每个人都有资格发起的“自由沙龙”环节，邀请到了40多位深耕乡村教育的公益伙伴们，一起观影讨论。我真心向大家求教如何才能更好使用这档视频节目，让乡村的孩子和老师一样可以看见世界，看见教育的更多可能，看到自己的更多可能。

二十大提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战略，需要一个与它匹配的非竞争的多元人才培养体制，而不是残酷且无效的淘汰机制。在人工智能步步紧逼的时代，教育改革的当务之急是改变评价方式。亦如田字格实验学校肖诗坚校长的三条明确建议：教师手下留情，少布置些作业；政府纸上留情，少些形式主义；家长嘴上留情，学会非暴力沟通。

我曾经明确反对“让乡村校长去向城市校长学习经验”。参加完双年会，我更加确定，倒不如让那些已经被“卷”到无暇思考教育本质问题的城市校长们，来乡村看看教育公益人是怎么做的。他们几十年如一日不忘初心的坚持，让我看到了教育本该具有的样子。□

专栏 | 15分钟城市？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第17期 出版日期 2023年05月01日

适中的体量和封闭密集的环境，对于深谙权术的管理层来说，是自成一格的家法试验地。居民常年浸泡在这种言行不一的环境里相爱相杀



它适中的体量、封闭密集的环境，对于深谙权术的厂区管理层们来说，就是自成一格的家法试验地。万众齐心被当作厂区凝聚力，每项业绩被视为战斗目标，内里则运行着一套别样机制。图：视觉中国

文 王梆
作家

不少动物园的观鸟区，不再把鸟禁锢在笼子里，而是织一张巨大的天网，罩住整片鸟林。游客盘旋于绿荫之间，耳畔是生生不息的百鸟交响乐团，脚下是斑驳的鸟粪和鸟影。攀至假山高处，树冠摇曳，仿佛伸手就可触摸到体温尚存的鸟巢。只要坚持不抬头、不仰望，就永远感受不到自由的大小其实就是笼子的大小。

为环保而设计的“15分钟城市”，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将人类的所有需要，都集中在步行或骑行15分钟即可抵达的范围内：上班地点离住宅区一步之遥，超市、酒吧、餐馆、健身房、医院、托儿所、幼儿园、小学和中学也全都近在咫尺；那种在堵塞、尾气中通勤的时光将一去不返，生活终于可以缩进水晶雪球而成为童话。更重要的是，在生活、工作、休闲一体化的同时，人类终于可以众志成城实现零排放！便利与道德，一石二鸟。

天网鸟园我没有住过，但“15分钟城市”的1.0版——即上世纪80年代的厂区，比如五一酱料厂或红星棉纺厂之类我是见识过的。那种大型厂区通常占地二三十平方公里，人口五六千到两三万不等。一边是高阔厂房，一边是密集的板楼宿舍，中间是集体活动中心，礼堂、食堂、篮球场、游泳池、卫生所、商店或小卖部、幼儿园、小学中学，一样不少。一家老小听着广场扩音器传来的激昂晨歌，起床漱口，捧着铝饭盒下楼去食堂排队买早餐；午休两小时，劳作了一上午的大人们，回到自家水泥格子里睡午觉，小孩则在厂区各种暗道里，拍纸片建沙堡你追我打……如果人类单纯满足于工作地点零距离和邻里生活完善，那么没有比厂区更理想的城建结构了。

吊诡的是，厂区结构不单提供便利，也是滋生控制的完美温床。1929年，当美国城市规划设计师科拉伦斯·佩里（Clarence Perry）以“邻里单元”（Neighbourhood Unit）为名画出厂区的雏形，这一模式很快就成为“冷战”时期苏联式城划的新宠。它适中的体量、封闭密集的环境，对于深谙权术的厂区管理层们来说，就是自成一格的家法试验地。万众齐心被当作厂区凝聚力，每项业绩被视为战斗目标，内里则运行着一套别样机制。居民们常年浸泡在这种言行不一的环境里，相爱相杀，像东德电影《窃听风暴》里的告密者一样，无时无刻不在打探着他人生活。秘密皆情报，情报里包含着众多人类不完美的证据，因此具有摧枯拉朽的价值。直到今天，我都记得厂区小卖部的样子看起来普通平常，亦有廉价而诱人的辣条和硬糖；每个前来打酱油的大人，无论男女，都有可能是雪莉·杰克逊短篇小说《邪恶的可能性》里的老阿德拉，一辈子足不出厂，每天以摄取传播情报为乐。

“15分钟城市”虽是厂区结构的升级版，为它叫好的也从苏派的城建规划者变成了行走于时代浪尖的环保主义者，但面临的其实是同样危险。首先，它必须建立在高度集中的人口密度之上，花园独立洋房势必成为淘汰品，一起淘汰的，还有人类渴望的各种微小自由；其次，它必须设立关卡，以防任何阻碍零碳排放的破坏行为，像频繁网购、跨区买菜、周末开车到城外玩耍，不满自家城区幼儿园、硬要将孩子送到别家幼儿园，并每天往返接送等等；再次，它必须依赖手动举报机制，人脸识别、数字ID都不充分，惟有如此，环保才能深入人心。

根据AI的计算结果，每天开车一小时，一年的碳排放量约为3613千克；一家四口都是食肉主义者的话，一年的碳排放量则与之相等。如果我们给频繁跨区玩耍或买菜的人送上罚单，那么是否也该给肉食者送上罚单呢？其他那些不够减碳生活的方式，比如使用非环保产品、网购、开车郊游、乘飞机周游世界等等，是否也应一律附上罚单

呢？如此一来，《窃听风暴》里的生活恐怕就不远了，人们互相监视，暗自举报，看谁家消耗了更多的二氧化碳，甚至不惜翻看对门的垃圾……

尽管“15分钟城市”具有以上危险，依然有不少决策者为其可能带来的环保业绩心动不已。比如牛津地方政府就提出，2024年要在市内分建6个试点，为了减少居民跨点出行的次数，每户只颁发3张免费通行证，有效期为100天。超过这个碳足迹，就得交每次35英镑的罚金；除了医务人员和特殊人士等，不在试点内工作居住、因各种需要必须进入试点的郊区人口，每车每年则只能享有25天免费通行。

此计划一出炉，就遭到牛津居民铺天盖地的抵制。感谢英国人不自由毋宁死的天性。再则，步行5分钟就能买到咖啡的人，与清晨驱车17英里赶到市中心卖咖啡的人，毕竟是两个阶级。阶级之间巨大的不平等，才是环保事业首要面对的问题，这是后话。□

版面编辑：刘春辉

艺术 | 《悲情城市》：那年以前，听不到也不能讲的故事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第17期 出版日期 2023年05月01日

这就是侯孝贤的电影，自由而乡土的方式。人情波动，人世复杂，一切都在氤氲的氛围中缓慢酝酿，自然生长。不言自明，往往胜过千言万语



《悲情城市》剧照。

文 朱珏瑾
影评人

今年是由侯孝贤执导、吴念真和朱天文编剧的电影《悲情城市》上映34周年。4K修复版的重映，为北京国际电影节带来了久违的热烈气氛，开票后6秒即售罄；在近日的香港国际电影节上，也吸引了众多观影者，见证了这部影片与香港大银幕的再度重逢。

“台湾新电影”往事

《悲情城市》首映时，也曾有过轰动的景象，它是上世纪80年代“台湾新电影”中难得一部获得过票房佳绩的作品。

现在一般将1982年由杨德昌、柯一正、陶德辰和张毅导演的四段式电影《光阴的故事》看作“台湾新电影”的起点。所谓“新”的风潮，衔接的是在时间与空间上都相邻不远的“香港新浪潮”。1983年，侯孝贤第一次与朱天文合作《小毕的故事》。没受过专业训练、亦无留学经验的他，那时反而是一群年轻导演中经验丰富的那一个。从1973年到李行导演的《心有千千结》做场记入行，他已在电影行业待了十年。可“新电影”本身意味着“决裂”，与模式化的爱情片、喜剧片决裂，也要与过去十年的经验决裂。

和许多创作者以自身故事创作处女作一样，侯孝贤开始把个人记忆融入电影当中。成长于高雄凤山镇，少年时代的他有打过架赌博、偷果子、爬墙逃票看电影等种种经历，直至后来服兵役。一个小镇青年切身体会过的贫瘠、迷茫，大把无所事事的自由时间，对城市的向往与胆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风柜来的人》与《童年往事》中，以一种诗意的方式被表达了出来。

不过，历史的走向决定了每个城市不同的命运，也决定了其中人的命运。回溯历史，在“香港电影新浪潮”的导演已基本进入商业电影市场，并迎来了港产片的繁荣时，“台湾新电影”则受限于原本就没有强大的工业体系可供依附，自始至终没有建立起商业上的成功。但从另一个层面看，也因为如此，艺术性才有机会得到保留。“新电影”的导演们，继续在岛屿上以真诚、质朴的手法创作，更得到朱天文、李远、黄春明等小说家为戏剧注入的纯文学意象。十年间，从《光阴的故事》到《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新电影”创造了一种让摄影机看见自己的叙事方式，也成为日后难以超越的美学体验。

1987年“解严”的到来，让尘封的历史议题有了被触碰的可能。1989年《悲情城市》上映，是一个新起点。所以，吴念真才会为电影写下这句文案：“在今天以前，这个故事，你听不到，也不能讲。”但它的出现，同时也是一种结束。像极了所有的少年成长之路，靠年轻与热情凝聚在一起的能量烧尽后，“新电影”人之间的理念分歧，随着1987年《“另一种电影”宣言》见报而彻底清晰。“光阴的故事”走向了它的完结篇。

该失去与不该失去的，都失去了

《悲情城市》的背景设定在1945年到1949年。历史的狭小窗口，收音机里传来外部的时势变迁，裹挟着根植于

传统社会的帮派斗争，变为滚滚巨浪。电影中的林氏家族，老父亲由布袋戏大师李天禄扮演，他自称“流氓”。四个儿子，老大文雄作为当地“角头”，经营着“小上海”酒家，在外面有个私生子；老二文龙原本行医，战时被召至南洋吕宋岛，生死未卜，除了妻子，全家人已经接受他已死于异乡；老三文良战后从上海返回，那时已经神志不清，后来与当地“上海佬”混在一起，又被密告为“汉奸”入狱，放出来后彻底疯癫；老四文清，8岁时从树上摔下来后丧失了听力，成年后独自在九份经营一间照相馆。

不同的族裔，混乱的语言，背后纠结着身份与情感的移位，错把他乡作故乡。有一幕，日本女孩静子离去前向宽美赠送和服，就像原节子在小津安二郎电影中无言的告别。无论观众或戏中人，此刻的心情都是复杂的。悲情，是爱与恨交织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生在这个时代，每个人都可怜。

也只有当宽美与文清面对面，悲情世界才有难得一刻的宁静。他们写在字条上的文字，像诗，也像对嘈杂声音按下的休止符。情感默默发酵，在他们与外部世界形成的距离中悄悄流动。许多个见面的场景无法用语言表达并非语言做不到，而是一经语言剖白就刻意了，原本似有若无的意味就被破坏掉了。

看二人几次见面。一群人谈天说地，抽烟喝酒吃粽子，只剩他俩在饭桌两个对角默默坐着，目光偶尔擦着目光而过；再见到时，宽美跑上前又停下来，紧紧攥着手中的帕子，尽力收回自己；结婚前最后一次相见，身后不远处，坐着已经彻底疯掉的文良，在大嚼供品，桌前则堆满了宽美才刚剥开的豆荚。新鲜的青绿色豆荚，映出她橘色的衣裙，也映出她滚烫的眼泪。古旧的心，纯真的爱。辛树芬扮演的宽美真美，惟有她在电影中说过自己“幸福”，并且还说过两次。从她脸上，我们看见的不是一个当代年轻女孩会有的神态。没有这张脸庞，悲剧便不会有让人心头一软的凄楚美感。短短五年电影生涯，辛树芬仅拍了五部电影，其中侯孝贤导演的占了四部——《童年往事》《恋恋风尘》《尼罗河女儿》和最后一部《悲情城市》。此后她也像电影中的人物，从大银幕上彻底消失。

剩下的是九份淡而远的山，静止仿如永恒的海。这些高而远的空镜视角，似菩萨俯瞰着芸芸众生。耳边响起日本电子乐团神思者（S.E.N.S）的配乐。简单有力的电子合成旋律，与不断重复的传统铃鼓声，形成了一种恢宏气势。晨昏夙夕，世界正发生着剧变，每个人的生活都被改变了，但最后又仿佛什么也没发生过。悲情图景如照片于水中显影：林家在当地风风火火，也终是细如浮萍，是可以被任意抹去的小人物。再次回到林家客厅，彩色玻璃后透出暗黄灯光，像众人离去后留下的余温。该失去的与不该失去的，他们最后都失去了。

在限制内的范围去表达

2001年，多次获得国际奖项的侯孝贤，在接受中国文学与华语电影研究学者白睿文（Michael Berry）采访时说：“创造一定要限制，没有限制，等于完全没有边界、没有出发点。你一定要清楚限制，知道你的限制在哪里，它们就成了你的有利条件。你可以发挥想象力，在限制内的范围去表达。”

回看最早的《风柜来的人》，面对害怕镜头的非职业演员，本就刻意离得远，想拍出“客观感觉”的摄影机只好被拉得更远，成就了日后标志性的长镜头。它拂去蒙太奇玩弄时间的魔法，还原了时间自然流逝的本来面目。15年后，1998年的《海上花》，由于找不到合适的外景而选择全内景拍摄，却在这困兽般的空间中，把一场又一场“吃老酒”的饭局，拍成了一幅长长的中国传统卷轴画。

《悲情城市》也一样。因为梁朝伟不会说闽南语和标准国语，只好让他在片中做了聋哑人，但语言的留白反而让这个人物有了另一种哀而无声的力量。现在已很难想象，假如文清具备正常的语言表达能力，还会如此让人印象深刻吗？文清的失语，原本是属于他个人的巨大遗憾，可在更大的时代遗憾中，在外界的混乱与震荡中，竟好像为他赢得了一小片宁静天地。是啊，这电影好像从来也没清静过。歌声，二胡声，脚步声，孩子的咿呀声，洗菜洗手炒菜做饭，骂不完的粗口，擦不完的地板桌面，烧不完的水，喝不完的茶。反正无论发生什么事，人生了死了消失了被捕了，茶壶杯子仍要端出来，饭仍要继续吃下去。朱天文说：“人一生就像大海上的浪花，随着海浪一波一波，但也不曾真正改变。大部分人想的是怎么活着，顺应潮流、顺应时势。”

这就是侯孝贤的电影，自由而乡土的方式。人情波动，人世复杂，一切都在氤氲的氛围中缓慢酝酿，自然生长。不言自明，往往胜过千言万语。□

版面编辑：刘春辉

梅厄·沙莱夫：解构以色列建国神话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第17期 出版日期 2023年05月01日

梅厄·沙莱夫（1948—2023）以色列作家



梅厄·沙莱夫(1948-2023)以色列作家

文 云也退
作家

2023年4月11日，以色列作家梅厄·沙莱夫（Meir Shalev）逝世，享年74岁。他是当今希伯来文学中最有声望的作家之一，曾获以色列最高文学奖布伦纳奖、以色列总理奖、以色列伯恩斯坦奖、美国犹太图书奖等诸多奖项。

1948年7月29日，沙莱夫出生在耶斯列谷地一个名叫拿哈拉（Nahalal）的聚居点。此前两个半月，以色列国刚刚宣布成立，随后就与周围的阿拉伯国家交战，到秋季终于停火，这个国家算是勉强站住了脚。从空中俯瞰，聚居点拿哈拉的造型布局很是特别，犹如一组嵌套的同心圆，整体看起来像轴承，又有些像太阳。拿哈拉的创始者都是来自欧洲的犹太人，所谓“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相信应该在这片土地上给犹太人建立一个国家。

沙莱夫在文学修养极好的父母的抚育下长大。他的母亲是一位文学教师，告诉儿子，要读小说就要读马克·吐温、狄更斯，还有19世纪后半期犹太世界的第一文豪肖勒姆·阿莱汉姆，那些不够一流的统统不必看。而他的父亲不仅是一位有名的诗人，还激励儿子自由读书，不必设限。沙莱夫14岁时，父亲给他一本纳博科夫的《洛丽塔》。一般大人会觉得这本小说题材“伤风败俗”，不敢让孩子接触，而沙莱夫的父亲则认定这是本杰作，他说：“念念看，书里的女主角跟你一样大。”

除了父母亲，沙莱夫的文学生涯还有一位重要的引路人，就是他的外婆。沙莱夫在许多作品里都写到过外婆，尤其是童书《我的俄国外婆和她的美国吸尘器》。外婆是个讲故事高手，沙莱夫从她那里听到了无数古老的传说、童话、民间轶闻，还有拿哈拉创始时的各种人与事。

作为第三代拿哈拉人，沙莱夫在上世纪60年代初随家人移居耶路撒冷，1966年服兵役，并经历了一年后的第二次中东战争。之后，他在希伯来大学获得艺术和心理学学位。二三十岁时，沙莱夫在电台、电视台做了很多节目，也有自己的脱口秀。可是用他的话讲，父母的熏陶，尤其是外婆的影响，在他心中铸下一个坚实的梦想。最终有一天，他辞掉所有工作，着手写一本小说。

沙莱夫一生共写了7本长篇小说、8本非虚构作品，还有14本儿童读物。不过，毫无疑问，他最重要的作品是1988年出版的首部小说《蓝山》（希伯来语版书名为“一个俄国故事”，“蓝山”是英译本用的书名，广为人知）。《蓝山》的故事发生地就设在拿哈拉，中心人物就是外婆那一代，在上世纪20年代来到当时的巴勒斯坦地区建立聚居点的犹太移民。“蓝山”则是指拿哈拉西北远处的迦密山。此山被记于旧约圣经，远看有点蓝色。书中的一位主角，千里迢迢从俄国来到巴勒斯坦，一边在土地上劳动，为聚居点工作，一边日日遥望着蓝山，期待他的老朋友也能从山那边过来加入他们。

这部小说取得了巨大成功，在以色列国内长期高居销量榜首，并被翻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30多种语言。沙莱夫打破了人们的刻板印象，写下了前辈定居者们的牢骚、私心、忧虑、不满：他们为自己不得不下地干活而自嘲，对艰苦的劳动环境怨声载道，总是按捺不住要讽刺那个虚无缥缈的建国前景；他们也一样要苦心经营家庭，操心子女的品行和婚恋；他们的确坚守着理想，可也正因此，他们觉得自己有资格批评各种世事，而且往往强势无情地嘲讽自己的坚守。“我们一起来，一起赎回土地，一起耕种，还会一起死，一起被葬成上镜的漂亮的一排。每一张老照片上，总有一排坐着一排站着……前面还有两个躺着，两肘撑着地，一脸动人的模样。四排里有三排最后离开了这个国家。每张照片里都有这么三排人，他们中既有英雄，也有狗熊。”

沙莱夫用幽默的风格，解构了在以色列官方叙事中堪称峥嵘岁月的建国神话，但又以灵动细腻之笔描绘了这片土地上的物产、鸟兽、农业和工业景观。没有一个读者会怀疑他对家乡、对国家的深厚感情。

沙莱夫之后的小说代表作还有《耶路撒冷之鸽》等。他的政治态度基本属于温和左派，不认同用激进的办法来寻求与巴勒斯坦人的和解共存，但强调每个人都要为现状负起责任。他基本不在小说里谈政治问题，不过在以色列最主要的报纸之一《最新消息》上，他开有一个专栏，在其中畅谈国内外的是非，尽情发表对政局的看法。

沙莱夫喜欢开一辆小皮卡在以色列的公路和土路上疾驰，卡车后面装着他的园艺工具。在这个国家，他几乎走遍了每一所学校，在无数个村庄和聚居点发表演讲，朗诵他的作品。尽管以色列盛产作家和艺术家，但沙莱夫的幽默感、个性、情趣仍是最突出的。

版面编辑：刘春辉